

日本陆军的轨迹

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支脉

〔日〕川田稔 著
韦平和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SAP)

〔日〕川田稔 著

韦平和 译

日本陆军的轨迹

(1931-1945)

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支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IP)数据

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
支脉 / (日)川田稔著；韦平和译。—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5.9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7-5097-7834-0

I. ①日… II. ①川… ②韦… III. ①陆军 -
军队史 - 日本 - 1931～1945 IV. ①E31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7131 号

· 阅读日本书系 ·

日本陆军的轨迹 (1931～1945)

——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支脉

著 者 / [日]川田稔

译 者 / 韦平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徐碧姗

责任编辑 / 徐碧姗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11.5 字 数：218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834-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3-9284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作者简介

川田 稔

1947年生，日本历史学者、政治学者。名古屋大学博士，专业为政治外交史、政治思想史。现为日本福祉大学教授、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如下。

『柳田国男の思想史的研究』（未来社、1985）

『原敬 転換期の構想——国際社会と日本』（未来社、1995）

『原敬と山県有朋——国家構想をめぐる外交と内政』（中公新書、1998）

『激動昭和と浜口雄幸』（吉川弘文館、2004）

『浜口雄幸と永田鉄山』（講談社、2009）

『満州事変と政党政治——軍部と政党の激闘』（講談社、2010）

『昭和陸軍の軌跡——永田鉄山の構想とその分岐』（中公新書、2011）

『戦前日本の安全保障』（講談社、2013）

『昭和陸軍全史 1 満州事変』（講談社、2014）

『昭和陸軍全史 2 日中戦争』（講談社、2014）

『昭和陸軍全史 3 太平洋戦争』（講談社、2015）

序幕 满洲事变

——昭和陆军的抬头 / 001

第一章 政党政治下的陆军

——宇垣军政与一夕会的形成 / 007

1. 二叶会和木曜会 / 009
2. 一夕会 / 020

第二章 从满洲事变到五一五事件

——陆军政变与政党政治的结束 / 029

1. 满洲事变前夕 / 031
2. 柳条湖事件与陆军中央 / 040
3. 犬养毅内阁的成立与荒木贞夫就任陆相 / 057

第三章 昭和陆军的构想

——永田铁山 / 071

1. 国家总动员论 / 073
2. 批判国际联盟与对华政策 / 081

第四章 陆军派系斗争

——皇道派与统制派 / 093

1. 陆军中央的派系对立 / 095
2. 军队青年将校与陆军手册 / 107
3. 派系斗争的激化与暗杀永田铁山 / 115

第五章 二二六事件前后的陆军与围绕大陆政策的斗争

——石原莞尔担任战争指导课课长时期 / 127

1. 华北分裂活动与二二六事件 / 129
2. 石原的对苏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转变 / 138
3. 卢沟桥事件与石原、武藤的分歧 / 161

第六章 日中战争的展开与东亚新秩序 / 175

1. 战争的扩大和战线的胶着 / 177
2. 近卫内阁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及反响 / 192

第七章 欧洲大战与日德意三国同盟

——武藤章出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 / 209

1. 《综合国策方案》的制定与建设
“大东亚新秩序” / 211
2. 对南方行使武力论与德英战争的走向 / 225

第八章 渐进的南进方针与德苏战争的冲击

——田中新一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 / 239

1. 从英美可分离到英美不可分离 / 241
2. 德苏战争与武藤、田中的分歧 / 255
3. 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与美国的对抗措施 / 274

第九章 日美谈判与对美开战 / 285

1. 继续谈判，还是决心开战？ / 287
2. 东条内阁的成立与走向日美开战的道路 / 306
3. 武藤和田中的世界战略与战争指导方针 / 318

尾声 太平洋战争

——日暮西山的昭和陆军 / 335

主要参考文献 / 345

后 记 / 360

序幕

满洲事变

——昭和陆军的抬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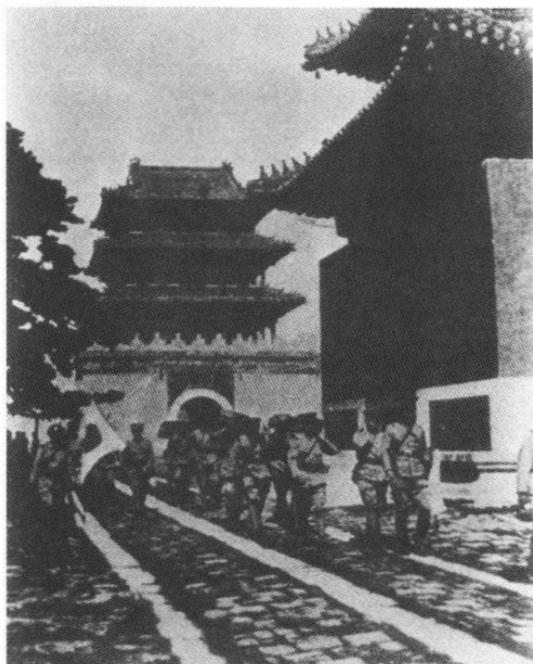


图1 满洲事变。关东军攻占奉天城（今沈阳）（读卖新闻社供图）

随着满洲事变^①的爆发，昭和^②陆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发动了满洲事变。关东军是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所谓“满洲”的日本军队，主要任务是守卫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及其沿线。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奉天（今沈阳）近郊炸毁了南满铁路，并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立即出动关东军。次日，日军占领了南满洲的主要城市。这是石原、板垣等人策划的谋略。

石原等人早就计划军事占领整个满洲，由此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关东军参谋和陆军中央的参谋一样，全部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精英军官，石原和板垣也是如此。

①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注

以下如无特别说明，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 “昭和”是日本天皇裕仁在位期间的年号，具体为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

在东京的陆军中央，陆军省的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课长冈村宁次，还有参谋本部的编制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欧美课课长渡久雄等人开始配合石原等人的行动，以“有利于关东军展开活动”（《冈村宁次日记》）。这个由永田铁山、石原莞尔为首的陆军中坚幕僚团体（一夕会）的成员还有：军事课中国班班长铃木贞一、作战课兵站班班长武藤章、教育总监部员田中新一等人（关于陆军中央的人事，参见第37页）。

最初，不仅当时的若槻礼次郎民政党内阁，南次郎陆相、金谷范三参谋总长等陆军高层也都坚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是，永田等中坚幕僚团体抗拒这个方针，支持关东军的行动。

永田、东条、石原、武藤、田中等人后来逐渐成为控制日本陆军的核心人物。比如，永田铁山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一职，成为所谓统制派的领袖，事实上领导了整个陆军。但是，他在陆军内部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派系争斗中被暗杀。

东条英机在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时担任陆军大臣，在太平洋战争开战时担任首相兼陆军大臣，后来在东京审判中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死刑。武藤章在缔结三国同盟和太平洋战争开战时，担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之后同样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死刑。田中新一在太平洋战争开战时，也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太平洋战争开战时，东条、武藤、田中三人掌控着陆军的实权，尤其是

田中，曾是对美开战的主导者，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唯独他没有作为战犯遭到起诉。其政治背景至今仍是一个谜。

石原莞尔在满洲事变后，先后担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实际上成为整个陆军的领军人物。但是，日中战争开战时，他主张不扩大战线，与主张扩大战线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陆军省军务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意见发生分歧而下台，不久便离开陆军。

在发动满洲事变后，关东军企图按照最初的计划控制整个满洲，并确定了建立“满洲国”的方针。当时，陆军中央的领导层试图阻止这一行动，而以永田为首的一夕会中坚幕僚团体支持关东军的计划，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斗。

但是，若槻内阁不久内部崩溃，在其后的犬养政友会内阁中，一夕会推举的荒木贞夫成为陆军大臣。继而，陆军领导层被全部更换，永田等一夕会派幕僚占据了陆军的要职。与此同时，关东军所采取的行动得到了陆军中央的全面支持。以一夕会团体为核心的势力掌握了陆军中央的实权，开始控制陆军。此后，陆军在政治上正式崛起。

永田等人认为，依靠以往的统帅权独立，无法实现国家总动员，应该在陆军中形成一个新的派阀，通过它对政治施加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企图让陆军作为一个

组织，通过陆军大臣向内阁施加影响，按照军方的想法控制国家政权。

在本书中，将满洲事变以后作为一个组织政治化了的陆军称为“昭和陆军”。虽然以往也曾有山县有朋以及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等陆军领导人作为个人试图掌握政治权力的先例，但是陆军作为一个组织试图控制政权，乃是一个新的动向。

那么，日军为何要发动满洲事变呢？还有，成为昭和陆军核心的永田和石原等人的一夕会团体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起源必须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大正中期。

第一章

政党政治下的陆军

——宇垣军政与一夕会的形成



图2 今德国著名温泉疗养地——巴登巴登

1. 二叶会和木曜会

1921年10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学生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三人相聚德国南部的温泉疗养地巴登巴登。当时，永田是驻瑞士武官。小畑是驻俄大使馆武官，但因不能入境而滞留在柏林。冈村则是从日本到欧洲出差三个月左右。他们都是37岁，同是陆军少佐，早先彼此就曾有过交流。

三人相约“消除派系，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体制”。他们约定为打倒当时掌控陆军实权的长州派和建立国家总动员的体制而共同奋斗。永田是长野县人，冈村是东京人，小畑是高知县人，三人都不是长州派。这是暗杀原敬首相之前的事。

原敬内阁的陆军大臣是长州的田中义一。但是，由于当时田中身体状况不佳，因此，由田中一派的山梨半造（神奈川县人）接任。此后，在高桥是清的政友会内阁和加藤友三郎内阁中，山梨半造都继续留任，陆军省处于田中派的掌控之下。而且，在此后山本权兵卫第二次组阁时（1923年），田中再次就任陆军大臣。另外，原敬内阁当时的参谋总长本是萨摩的上原勇作，但他受到长州派的统帅山县有朋的有力控制，在上原辞职（1923年）后，田

中派的河合操（大分县人）担任参谋总长。进而，在这一时期，长州派的人都身居要职，如陆军次官津野一辅、军务局局长菅野尚一、陆军省高级副官松木直亮等。在陆军内部，山县有朋以后的长州派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山县有朋死于1922年）。

永田、冈村、小畑等人回国后，从1923年左右开始，以陆军士官学校16期同学为主，加上志同道合的陆军幕僚，经常聚谈。1927年左右，他们将此聚会命名为“二叶会”，这是田中义一内阁成立前后的事。二叶会的成员包括15期到18期的学生，河本大作、山冈重厚、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山下奉文等陆军中央的中坚幕僚大约20人参加了二叶会。这些人后来在陆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永田、东条后来的情况，前文已经提及。

冈村宁次曾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等职，战争结束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小畑敏四郎作为参谋本部运输通信部部长，是皇道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在与统制派的派系斗争中失败而离开了陆军。山冈重厚也曾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但他属于皇道派，由于与小畑大体上同样的原因，最终被赶出陆军。

河本大作作为1928年暗杀张作霖事件的主谋而受到行政处分，被编入预备役后退役。板垣征四郎曾任陆军大臣，土肥原贤二曾任中国重要地区的特务机关长等

职，最终二人都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死刑。山下奉文作为第十四方面军的司令官，最终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样被处死。

二叶会继承了永田铁山等三人在巴登巴登的约定，其间，永田等人首先致力于打破长州派对军队人事安排的垄断。

在永田、小畑、东条、山冈等人担任陆军大学教官时，长州出生的学生被完全排除在入学者名单之外。在他们担任陆军大学教官的1922年到1926年连续三年中，陆军大学录取的学生没有一个是山口县籍的，而在此之前，平均每年会录取三到五名山口县的学生。比如，1923年，通过初试（笔试）的100名学生中，有17人是山口县的。但通过复试（面试）的50名学生中，山口县却没有一人。这应该是在面试中故意对分数进行了操作。这一时期（1922~1924年）的陆军大臣是山梨半造、田中义一、宇垣一成，宇垣虽然是冈山县人，但也被视为长州籍的田中之嫡系。

此后，永田等人也一直进行着对抗长州派的人事活动。

直至二叶会命名（1927年）前后，陆军大臣都一直由宇垣一成担任，而后由同为田中派的白川义则（爱媛县人）接任。白川也深受田中影响，所以被视为长州派的人。此外，宇垣连续担任了清浦奎吾内阁、加藤高

明三派内阁^①、加藤高明宪政会内阁、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宪政会内阁（1924～1927年）时期的陆军大臣，事实上成为继田中之后陆军中最有势力的实力派人物（白川义则仅在田中义一内阁时期担任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一职也如前文所述，在1923年由田中派的河合操（大分县人）担任，之后由田中和宇垣派的铃木庄六（新潟县人）接任（1926年）。他们也都被视为长州派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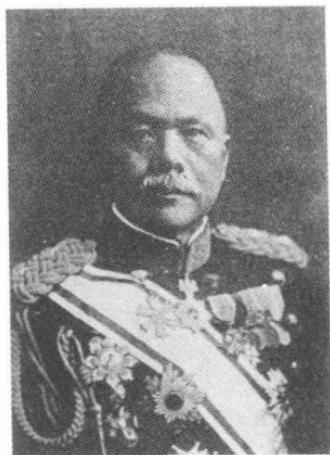
接下来，在永田领导下，开始推进三人在巴登巴登约定的“建立国家总动员的体制”。

在一战前后长达六年的时间中，永田一直旅居德国周边，对于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国家总动员的情况，他是陆军中最为精通的人。因此，永田从很早就开始从事与国家总动员体制相关的工作和演讲等活动。1926年4月，在若槻礼次郎宪政会内阁设立的“设置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中，永田被任命为陆军方面的干事（当时任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同年10月，陆军省成立“整備局”，永田成为第一任动员课课长。而第二任动员课课长则由永田的心腹东条英机担任。

进而，二叶会开始关注此前相聚巴登巴登时尚未充分意识到的满蒙问题。

^① 由宪政会、立宪政友会、革新俱乐部“护宪三派”联合成立的内阁。

图3
宇垣一成



在二叶会的讨论中，满蒙问题曾经多次成为话题，包括陆军中央对暗杀张作霖事件的应对、对二叶会成员河本大作的处理，等等。炸死张作霖事件发生于1928年6月4日，东北军阀张作霖在奉天（今沈阳）近郊被关东军炸死，事件的主谋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河本大作从1924年开始担任关东军参谋，二叶会开始关注满蒙问题或许是受到河本的影响。

本来，在二叶会中有很多熟悉中国情况的军人，他们被称作“支那通”，其中包括河本大作、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在他们的磁场作用下，二叶会开始集中关注中国，尤其是满蒙地区。

1927年11月，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的铃木贞一（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等少壮派军官效仿二叶会，成立了“木曜会”。木曜会成立的宗旨是，研究军事装备和国防方针等。木曜会的成员有18人左右，主要是铃木贞一、石原莞尔、根本博、村上启作、土桥勇逸等陆军士官学校21期至24期的学生。

木曜会的成员中还包括第16期的永田、冈村，还有第17期的东条。永田本人仅出席过两次聚会，但他的心腹东条曾经多次出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冈村也出席了四次，但小畑没有加入。

木曜会从1927年11月到1929年4月为止，总共举行了12次聚会，但最重要的一次是1928年3月1日在东京九段的陆军军官俱乐部“偕行社”举行的第五次

聚会。此次聚会大约发生在暗杀张作霖事件3个月之前。

这一天的参会人员共有9人，包括陆军省军事课课员东条英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铃木贞一、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根本博等人。除了东条英机是中佐之外，其他人为少佐或大尉，基本上都是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陆军中央的少壮派军官。永田、冈村当天没有出席。

这次聚会，首先由根本博做了题为“关于战争发生的原因”的报告，之后进行了讨论。讨论涉及很多方面，东条将聚会上大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并做了发言。发言主旨如下。

国家军队的备战要以对俄战争为主体，第一期目标以在满蒙地区确立完整的政治势力为宗旨。但需要考虑美国可能会在中途参战，做好防守准备。此间，对华战争的备战无须多少顾虑，仅以获取资源为目的。

也就是说，备战的重点针对俄国，当前的目标放在“在满蒙地区确立完整的政治势力”。此时，对华战争的备战不需要太多考虑，仅仅以“获取资源”为目的。这便是东条整理的聚会意见。

然后，东条对前面的发言做了补充，附加了两个理由：“一、未来的战争是生存战争。二、美国靠大陆足以及生存”。也就是说，未来的战争一般是为了国家生存

而发动的战争，而美国依靠南美大陆和北美大陆足以生存，所以不会正式对亚洲进行军事介入。他的补充便是这样的含义。

对于东条的这个发言，有人提出了疑问：“所谓的‘确立完整的政治势力’，是否意味着‘取得’？”对此，东条回答：“是。”不管形式如何，实质上日本设想的是将满蒙地区据为己有。

东条发言之后，进行了两三个问答，最后，作为最终结论，聚会约定了如下内容。

为了帝国自存，需要在满蒙地区确立完整的政治权力。为此，国家军队以对俄战争为主体，对华战争准备无须太大顾虑。但需要考虑美国有可能参与本次战争，做好防守准备。

这些内容，虽然在细节上有几处不同，比如“政治势力”改成了“政治权力”，但基本上都出自东条的发言。另外，还说明了对俄、中、美、英形势判断的“理由”。

日本为了“保证其生存”，需要在满蒙地区确立政治权力。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会与俄国的“海洋政策”发生冲突。

日本需要从中国获取的是对俄战争的“物资”。中国的兵力“不值一提”，用半年时间便可完成备战。另外，对于中国来说，满蒙地区乃“化外之地”，所以中

国不会“投入国力”一战。

而美国对于满蒙地区的需要并非“生存上的绝对要求”，因此美国不会为满蒙问题而倾国力发动对日本的战争。不过，从美国当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过来看，如果日俄间爆发战争，美国有可能会介入。因此，要尽量通过“政治策略”避免美国参战，但也需要考虑到美国的介入，做好“防守的准备”。

英国与满蒙问题有关，但是可以通过军事以外的方法解决，因此无须特别考虑准备对英作战。

基于这样的形势判断，会上商定了“在满蒙地区确立完整的政治权力”，即“占领”满蒙的方针。

这一决定在同年（1928年）12月6日的第八次聚会时再次得到确认，并被作为木曜会的“结论”。冈村也出席了此次聚会，并以此结论为前提，积极地做了发言。永田没有出席第五次聚会，也没有出席第八次聚会，但是堪称永田心腹的东条英机在第五次聚会上的发言乃是基于下文将要提到的永田的构想。另外，在第八次聚会中再次确认上述方针时，永田的盟友冈村也并未提出异议，由此可以看出，木曜会的这一方针实际上也得到了永田的认可。

于是，在陆军中央内部首次正式提出了占领满蒙的方针。

当时，围绕对华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种构想。

第一，是当时田中义一内阁所主张的方向，即满蒙

特殊地区论。这种构想承认长城以南的中国本土由国民政府统治，而至于满蒙地区，则支持处于日本影响下的军阀张作霖的势力，从而维持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益。

第二，是浜口雄幸任党首的在野党民政党的态度。其立场是，应该基本上承认国民政府统一包括满蒙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同国民政府建立友好关系。比如说，日本承认国民政府统一整个中国的主张，由此扩大与中国的经济交流。

第三，是暗杀张作霖时关东军领导层的方针，主张铲除张作霖，在满蒙地区建立一个由日本掌握实权的、独立的新政权。这就是所谓的“满蒙分离论”。但是，它的前提是中国继续对满蒙享受主权。

相对于这些构想，木曜会的满蒙占领论完全否定了中国在满蒙地区所享有的主权，乃是一个全新的方向。

许多人都认为，满洲事变是日本为了打开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困局而以由石原莞尔为首的关东军策划并实施的，但实际上早在 1929 年末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一年半以前，陆军中央的幕僚中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后来发展至满洲事变的占领满蒙方针。作为策划满洲事变的关东军方面的主谋而闻名的石原莞尔，虽然没有出席第五次聚会，但他是木曜会的成员。因此，可以说，策划满洲事变的核心原因并非世界经济危机，而是其他。对于石原莞尔等策划满洲事变的军人来

说，世界经济危机给了他们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去实施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

木曜会占领满蒙的方针，并不单纯是陆军中的这个小团体所考虑、仅其内部抱有的想法。这一方针还被以后的一夕会所继承。

此外，在第五次聚会的同时，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荒木贞夫，作战课课长小畑敏四郎）也正在草拟一份主张“在满蒙地区确立帝国政治权力”的文件。其内容与木曜会的结论基本相同。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在木曜会和参谋本部作战部之间存在某种合作。这恐怕是通过永田、冈村、东条与小畑的关系而形成的合作。

除第五次聚会和第八次聚会外，木曜会比较引人关注还有1929年1月17日举行的第十次聚会。永田、冈村、东条三人全部出席了此次聚会。会上做报告的人是陆军省军事课课员铃木宗作，他主张需要实现“统帅权的独立”，其内容并没有什么特点。

但是，当天讨论的“结论”是，首先，在“领导战争”方面，“想要以统帅之独立自由领导政治策略”“办不到”。然后，这样阐述道：军人控制国家政权，不如政治策略主动追随统帅，也就是说，需要行政当局自己追随“军人”，为此，就需要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大人物”。为了获得这样的大人物，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人物”。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为了整个国家活动的、公正的新派阀”，也就是说，必须在

陆军中建立一个新的派系。

这个结论就是说，不能通过统帅权的独立来控制国家政权，应该在陆军中建立一个新的派系，通过它对政治发挥影响力。

虽然当时没有留下每个人的发言记录，但引人注意的是，是在年龄、军衔均高于其他人的永田、冈村、东条三人全部出席的时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永田等人一直认为，不应该依靠统帅权的独立，而是应该以组织的形式推动陆军大臣，通过他对内阁施加影响力。

一般认为，统帅权的独立是导致昭和时期陆军鲁莽从事的原因。但是，实际上他们在统帅权的独立上反而是消极的，认为陆军需要作为一个组织积极介入国家政治。

2. 一夕会

1929年5月，木曜会与二叶会合并，成立了“一夕会”。这是大约满洲事变爆发前两年发生的事。一夕会的成员共有40名左右，成员包括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到第25期的学生，除了二叶会、木曜会的会员外，还有后来在陆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少壮军官武藤章、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人。

这里重新列举一下主要成员的名字：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河本大作、山冈重厚、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渡久雄、工藤义雄、山下奉文、桥本群、铃木贞一、石原莞尔、根本博、村上启作、土桥勇逸、铃木率道、牟田口廉也、武藤章、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这些人后来在昭和陆军中均名声大噪。

在一夕会的第一次聚会上，做出了三项决定：刷新陆军的人事；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拥立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銑十郎这三位非长州派的将级军官。首先是掌握陆军中央的要职。永田、小畑、冈村（均为45岁、陆军大佐）三人在一夕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中，永田是他们的核心人物。

一夕会成立时正值田中义一内阁的末期、浜口雄幸内阁成立前大约一个月。田中内阁的陆军大臣是白川义则（爱媛县人），浜口内阁的陆军大臣是宇垣一成（冈山县人）。前面已经提到，白川、宇垣都处于曾出任陆相的长州籍的田中义一影响之下，所以一直被视为继承长州派的人物。

在一夕会的决定中，首先，刷新陆军的人事意味着把一夕会的成员安插到陆军中央的要职，将田中、白川、宇垣等长州派的势力排挤出陆军中央。此外还包括在陆军中央的职位上推动自己领域的各上司相互合作，以实现一夕会制定的方针。

其次，在武力解决满洲问题上继承了二叶会、木曜会的主张。从一夕会成员的行动来看，木曜会占领满蒙的方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这一方向实际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其含意乃是否定中国在满蒙地区的主权。这直接导致了满洲事变的发生。比如，根据根本博的回忆，同年底，永田、东条、石原、铃木贞一、根本等人决定“以武力驱逐张学良”，并分别游说上司，在陆军内部酝酿了动武的气氛。

拥立荒木、真崎、林这三位非长州派的将级军官与排挤田中、白川、宇垣等人的势力有关。荒木、真崎、林这三人中，核心是佐贺县人真崎，荒木是和歌山县人（生于东京），林则来自石川县，但二人与真崎关系甚笃，并且通过真崎的关系，与宇都宫太郎、武藤信义等佐贺派关系密切。而佐贺派属于与长州派田中义一相对立的上原勇作的派系，尤其与田中、宇垣嫌隙颇深。

田中和上原曾经因1924年推选清浦奎吾内阁陆军大臣一事发生分歧。田中推举宇垣，而上原推举佐贺派的福田雅太郎（长崎人），最后，上原失败，宇垣当选陆军大臣。两年后（宇垣任陆军大臣期间），围绕接任参谋总长河合操的人选问题，上原和宇垣又产生了意见分歧。上原推举武藤信义（佐贺人），宇垣则推举自己一派的铃木庄六（新潟人），此次，同样上原落败，铃木庄六就任参谋总长。不过，在翌年1927年白川担任陆军大臣的时候，武藤（信义）在上原的支持下就任

教育总监一职，这是陆军的三大要职之一。

这样，真崎、荒木、林属于与田中、宇垣一派相对立的上原的佐贺派。也就是说，推举真崎等人意味着永田等人的一夕会站在反田中、宇垣的立场。

此外，1928年，长州籍实力派人物津野一辅去世，翌年，田中辞去首相一职后不久病死，在此过程中，宇垣开始正式形成自己的派系。津野一直被视为长州派内田中的继承人。宇垣与同期的铃木庄六、白川义则二人联手，从陆军中央的军官中把金谷范三、畑英太郎、南次郎、阿部信行、二宫治重、杉山元、建川美次、小矶国昭等人拉进自己的阵营，形成了宇垣派。他们都不是长州人，所以陆军的主流从长州派变成了宇垣派。此后，长州的菅野尚一和松木直亮等人一直没有就任要职。

一夕会是在津野死后宇垣派正式形成的背景下成立的，并且提出了刷新人事，由此可见，它也是对抗宇垣派的一项举措。

关于一夕会的核心人物永田和真崎的关系，现有五封永田写给真崎的书信，其中四封是一夕会成立之前寄出的。这四封信写于1928年底到1929年1月之间，主要内容是关于二叶会的山冈重厚、工藤义雄（均为一夕会成员）就任陆军中央课长职位的疏通工作。当时，真崎任弘前市的第八师团长。



图 4
永田铁山

永田在信中说，自己正在做各种工作，以便让山冈、工藤就任陆军省补任课长或者教育总监部第二课课长的职位，委托真崎帮助向陆军中央做疏通工作。此外，永田还告诉真崎：自己正在与人事局局长川岛义之、教育总监部本部长林铣十郎等人协商；在满洲已经得到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的帮助；等等。进而在信中阐述了自己的判断。他预料，田中、宇垣派会“策划”陆军省征募课课长的后任人选，需要采取对抗措施，以“遏止”这样的事态发生。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陆军的领导层〔田中、宇垣派〕心里”（〔 〕内为引者注，下同）。

川岛、林、秦这三人与真崎之间，关系虽有深浅之分，但都有联系。根据推测，永田与真崎等人关系比较密切。而且，真崎从1929年7月起担任东京的第一师团长，当时，永田是该师团步兵第三联队长，东条是该师团步兵第一联队长，三人似乎关系紧密。

在确定了上述一夕会的方针以后，永田等人首先正式着手谋求掌控陆军中央的要职。

一夕会成立三个月之后的1929年8月，冈村宁次得到了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课长的职位。补任课课长掌握着整个陆军佐官及以下级别人事大权。为了确保补任课课长一职，当时一夕会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目前不得而知，但恐怕一夕会的成员对各方面都做了工作。一夕会通过担任补任课课长的冈村宁次，正式开始掌握陆军

中央的各个职位。

1930年8月，永田铁山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军事课课长实质上对预算分配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不仅是军政部门，也是整个陆军中最为重要的、拥有实权的职位。此外，渡久雄就任参谋本部欧美课课长。

接着，满洲事变前的1931年8月，松村正员就任陆军省征募课课长，饭田贞固就任马政课课长，村上启作就任军事课高级课员，铃木贞一就任军事课中国班班长，东条英机就任参谋本部动员课课长，武藤章就任作战课兵站班班长，矶谷廉介就任教育总监部第二课课长。此外，一夕会推举的将级军官之一荒木贞夫就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这些都是一夕会在陆军中安插的成员。另外，当时真崎从第一师团长调任台湾军司令，林銑十郎从前一年的12月开始就任朝鲜驻屯军司令。

这样，一夕会成员几乎掌握了陆军中央全部主要实权职位。由此可见，一夕会利用冈村就任补任课课长一职的机会，迅速推动了人事的安排。可以说，他们在当时已经设想到，不久将要动用武力。

另外，1928年10月，石原莞尔就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翌年5月，板垣征四郎就任关东军高级参谋。虽然这些是冈村宁次就任补任课课长之前发生的事，但是当时一夕会成员加藤守雄担任补任课课员，应该是他做了工作。

1931年9月爆发满洲事变时，陆军中央以及关东军中的一夕会成员（包括二叶会、木曜会）的人员部署如下。由此可以看出，一夕会的少壮军官基本占据了各部门被视为主要实权职位的课长或者班长的职位。

陆军省

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高级课员村上启作，中国班^①班长铃木贞一，外交班班长土桥勇逸，编制班班长铃木宗作，课员下山琢磨

补任课：课长冈村宁次，高级课员七田一郎，课员北野宪造

征募课：课长松村正员

马政课：课长饭田贞固

动员课：课员沼田多稼藏

整備局：课员本乡义雄

参谋本部

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

庶务课：庶务班班长牟田口廉也

作战课：兵站班班长武藤章

欧美课：课长渡久雄

中国课^②：中国班班长根本博

运输课：课长草场辰巳

① 当时日语称“支那班”。

② 当时日语称“支那课”。

参谋本部：部员冈田资、清水规矩、石井正美、澄田来四郎

教育总监部

第二课：课长矶谷廉介

庶务课：课长工藤义雄

炮兵监部：部员冈部直三郎

教育总监部：部员田中新一

航空本部

第一课：课长小笠原数夫

内阁资源局

企划第二课：课长横山勇

关东军

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

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

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此外，在与上述相当的职位，还安插了在陆军大学担任教官的小畑敏四郎、铃木率道以及担任陆军兵器本厂附一职的富永恭次等人。一夕会正是以这样的阵容迎来了满洲事变。

第二章

从满洲事变到五一五事件

——陆军政变与政党政治的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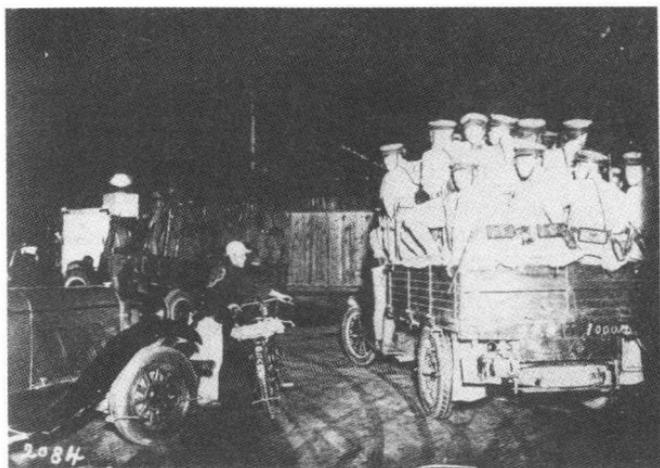


图5 五一五事件。军队戒备森严（读卖新闻社供图）

1. 满洲事变前夕

这样，一夕会继承木曜会占领满蒙的方针，确定了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但当时并没有规定实施这个方针的时间。但是，一夕会不久便开始付诸行动。

一夕会成立大约一年半后的1930年11月14日，币原喜重郎外相给包括陆军在内的相关机构发出了一份题为《关于满洲铁路问题事宜》的方针草案。当时，一夕会的永田铁山刚刚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渡久雄则刚刚就任参谋本部欧美课课长。此外，这一天正是浜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站遭到枪击身负重伤的当天。

该草案表明了对华友好的方针，内容包括：从“共存共荣”的观点，要谋求中方的“感情和睦”；为此，关于满铁的并行线路，应该“阻止”对满铁产生“致命的影响”，但对于其他的既设线路，则签署联络协议，“撤回”此前的“抗议”；而至于其他线路，反而要援助中方建设；等等。

日本政府在此之前，对中方已经建设的打虎山—通辽、吉林—海龙两线，及正在规划建设的洮南—通辽线等一直提出抗议，认为这些线路违反了日中之间禁止修筑满铁并行线的协议。这个方针草案意味着修改了抗议内容。例如，虽然不同意修筑洮南—通辽线，但针对打

虎山—通辽、吉林—海龙两线，则以签署联络协议为条件，决定撤回抗议。

此外，在方针草案中，还对作为满铁的培养线计划修筑的所谓“满蒙新五路”提出了友好的方针：洮索铁路（洮南—索伦）、延海铁路（延吉—海林）、吉五铁路（吉林—五常）这三条铁路“由中方自费修筑”；其他两条，即敦会铁路（敦化—朝鲜会宁）、长大铁路（长春—大赉），当前也基本上只是保留权利。“满蒙新五路”是在大约三年前的田中义一内阁时期，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威逼当时统治满洲的军阀张作霖向日本借款并签署《满铁承建协议》的一个建设计划。

对此，12月3日，陆军省方面做了答复，称将做部分修改后予以同意。但当时担任军务局局长的小矶国昭提出了如下意见：中方对满铁的政策乃是出于“政治立场”，像方针草案所言那样的“共存共荣”不可能实现，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让中方“放弃”对日本的“对抗竞争”；但是，“满洲的现状不允许等待实现这个大方针”，因此，作为“应急之策”，将对外务省的草案做部分修改后予以同意。

也就是说，他认为，外务省制定的日中之间共存共荣的方针不可能实现，基本上对外务省的友好姿态表示了反对。因此，同意其作为权宜之计。

值得指出的是，币原外相的这个提案，实际上对于陆军来说，包含着重要的内容。在“满蒙新五路”中，

上述的洮索铁路、延海铁路、吉五铁路并不包含在田中内阁时期外务省的计划方案之内，它的修筑乃是出于陆军方面的强烈要求，因为陆军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准备和俄国打仗。而币原的方案是，这三条铁路全部由中方自费修筑，其他两条铁路也仅仅是保留权利。

陆军想要通过签订《满铁承建协议》修筑铁路，从而将这些铁路置于日本掌控之下，因此对于陆军来说，币原外相的方案根本不能接受。所以，陆军方面的同意确实是一个“权宜”的答复，至少陆军的中坚幕僚已经对民政党内部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不再指望了。当时，这件事情的主管部门是军务局军事课，负责人正是永田铁山。

1931年3月，参谋本部情报部草拟了一份报告《昭和六年年度形势判断》，主张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这份报告在4月获得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正式批准，并通知到关东军等各个相关机构。

同年6月，为了讨论这份报告的对策方案，成立了所谓的五课长会议，决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针大纲》。其中，包含了暗示一年后可能在满蒙行使武力的内容。五课长会议由永田铁山（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冈村宁次（补任课课长）、山肋正隆（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渡久雄（欧美课课长）、重藤千秋（中国课课长）五人组成。

此后，从8月开始，取代山肋担任编制动员课课长

的东条英机加入会议，还有今村均（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矶谷廉介（教育总监部第二课课长）也新加入了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在七位课长中，永田、冈村、渡、东条、矶谷五人是一夕会的成员，这一会议（七课长会议）强烈地反映了一夕会的意向。

满洲事变爆发之后，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等人支持内阁不扩大方针的时候，七课长会议也违抗上级的指令，呼应关东军板垣等人的行动，使陆军中央支持他们。

同年（1931年）4月13日，由于浜口雄幸首相健康状况恶化，民政党浜口雄幸内阁宣布总辞职，次日，民政党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成立。随之，陆相由宇垣一成变为南次郎。金谷范三留任参谋总长。南、金谷二人均为宇垣派，此外，杉山元担任陆军次官，二宫治重担任参谋次长，小矶国昭任军务局局长，建川美次担任情报部部长，所以，宇垣派占据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几乎所有的要职。

《昭和六年度^①形势判断》是在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的领导下，由欧美课课长渡久雄、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国班班长根本博等情报部的核心成员拟定而成。除了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外，它又提出了需要解决满洲问题和三个策略方

① 即1931年度。

案。第一阶段，是在中国主权下建立亲日独立政权的方案；第二阶段，是建设独立国家的方案；第三阶段，是占领满蒙的方案。

在这些核心成员中，渡、根本、武藤三人是一夕会成员，这些形势判断应该以某种形式反映了一夕会的意向。

为了讨论这份《形势判断》的对策方案，于6月11日开始召开五课长会议。这个会议于6月19日拟定了对满蒙方针的草案。在这份五课长会议草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讨论，最终形成了《满洲问题解决方针大纲》，主要内容如下：为了缓和张学良政权在满洲的排日方针，陆军省将努力与外务省开展合作，但是，如果排日行动进一步发展，最终将“不得已采取军事行动”；为了解决满洲问题，需要得到国内外的理解，为此，要在“大约一年内，即在来年春天前”争取广泛的理解，同时努力让关东军高层“在未来的一年中隐忍自重”，并避免卷入排日纠纷。

也就是说，实质上，《大纲》决定了准备一年后在满蒙行使武力。

这个方针得到了陆军省、参谋本部首脑的批准，并传达到了关东军。此时，可以说，南、金谷等陆军中央的首脑也同意在满洲略微行使武力。不过，正如后面阐述的那样，对于宇垣派的陆军首脑来说，这完全是为了确保既得权益，因此只是想要行使有限的武力，与永田

等人的一夕会方向并不相同。但是，实际上没有等到一年之后，大约三个月后的9月中旬，便发生了柳条湖事件。

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课长守岛伍郎曾经与五课长会议的多名成员进行过交流，他后来对《大纲》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关于在满洲的军事行动，想要获得国际上的理解，实际上一两年是做不到的，尽管如此，为了让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同意行使武力，他们写了一篇乍看似乎非常稳妥的作文。这种见解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

在这个《大纲》获得批准以后，以永田为首的五课长会议于同年7月拟定了军队司令官及师团长会议上的陆军大臣训示方案。方案中也提到了满蒙问题：满蒙地区与帝国生存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但是近来这一地区的形势对帝国日趋不利，使事态越来越严重，实为遗憾。8月，陆军大臣训示颁布后，受到了各报纸以及执政党民政党等的强烈谴责，认为这个部分故意让满蒙问题重大化。

另一方面，关东军的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对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和占领整个满洲，早已蓄谋已久。在世界经济危机前的1929年6月，石原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1年5月，撰写了一篇《满蒙问题私见》的文章，文中认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就是“将满蒙变为我之领土”，应该“通过谋略创造机会，由军部主导，强行推动国家”。

石原、板垣等人根据这些文章，正式着手筹划在柳条湖实施谋略，发动战争，并决定9月下旬采取行动。石原、板垣等人与永田、冈村等一夕会核心成员进行了密切合作。当时，永田针对关东军策划的谋略曾发言称：“既然现场〔关东军〕说必须今年秋天，那就应该听从现场的意见”。

其间，发生了所谓的“三月事件”。当时正值《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草拟。这个事件是计划发动政变，建立以宇垣陆军大臣为首的军事政权，但最终没有得到宇垣的同意，以未遂告终。它是以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人为中心的佐官一级陆军中央军官和民间右翼大川周明等人密谋策划的。一般认为，参谋次长二宫治重、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也曾经赞同这个计划。当时，浜口首相遇刺后，币原喜重郎外相临时代理首相一职，但由于他在答辩中失言，国会发生了混乱。而这也是此次政变计划的背景。但是，3月10日，浜口首相带病出席了国会会议，国会混乱由此暂时平息下来。

政变计划也传达到了永田军事课课长和冈村补任课长，但根据冈村的日记，他们从一开始就“劝告其慎重”，“一开始便判断陆军最高首脑不会同意，并进行了劝导”。

不过，据说，当时永田拟定了一份所谓的政变计划书，称为《永田笔记》，后来在陆军内部成为问题。这

个《永田笔记》，是由于小矶军务局局长听取大川所说的计划方案后，责令永田研究一下计划的前后一贯性而拟定的，根据小矶的证词，当时永田做了这样的答复：“如此暴行断然不可。但是，既然局长命令研究一下计划的前后一贯性，虽非所好，亦应研究。不过，我明确表示绝对反对这样的方案。”

另一方面，7月上旬，在中国吉林长春北面的万宝山发生了一起事件。侨居在这里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发生了纠纷，日本领事馆警察与中国保安队在干预这场纠纷时发生冲突，最终发展为朝鲜的排华暴动和中国激烈的排日谴责。这就是万宝山事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发生了中村大尉事件。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井杉延太郎预备役曹长等人在满洲西北部的兴安岭一带进行军事地志勘查活动，其间失踪，后来得知，6月下旬被当地的中国士兵处死。这类事通常都不会马上公布，但8月17日消息解禁，各大报纸一齐报道了这个事件。此前，各大报纸都批评陆军大臣煽动对满洲的危机感，此时许多报纸都表明了对华强硬的姿态。

另外，政友会首席总务森恪于8月31日在政党幕僚等人参加的聚会上，做了主张“发动国力”的满蒙视察报告。进而，《东京朝日新闻》也于9月8日刊登了一篇社论，希望“团结合作，发动国策”。

同一时期，在8月的人事调动中，今村均陆军省征

募课课长就任作战课课长。这是参谋本部最重要的实权职位。这一调动是永田军事课课长的安排。今村希望调到部队，永田直接说服他就任作战课课长。虽然今村不是一夕会成员，但是，二人同在军务局担任课课长，今村受到永田的赏识。今村就任作战课课后，成为七课长会议的成员之一，还加入了后来统制派的前身——永田团体。

今村调任作战课课长时，担任部长的建川（从情报部部长调任）交给了他一份上述的《满洲问题解决方针大纲》，并指示他按照此大纲，在8月内完成作战的具体方案。当时，建川还附带说，政策上的具体方案将让军事课课长永田来拟定。如后述那样，发生柳条湖事件时，虽然建川似乎考虑关东军从9月27日开始行动，但从这里他把拟定具体方案的期限定在8月底来看，当时他赞同9月下旬在满洲开始行动的计划。

上面已经说过，石原、板垣等人本来计划9月下旬实施他们的谋略，但9月上旬外务省接到了奉天领事馆的消息，称关东军少壮军官正在酝酿在满洲挑起事端。9月11日，昭和天皇向陆军大臣南次郎询问了军纪情况。这是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意见，他当时担心陆军的动向。另外，9月14日，张学良对中村大尉事件表示了遗憾之意，并表示希望和平解决。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举办的省部首脑会议考虑到天皇的意向，命令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赴满洲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建川于次日经

北九州赴满洲。据说，此时建川自己以为关东军将在27日行使武力。

关东军的石原、板垣等人，接到桥本欣五郎关于陆军中央动向的消息后，急忙将行动时间提前到了9月18日夜晚。

2. 柳条湖事件与陆军中央

就在建川抵达奉天数小时后，9月18日夜10点20分左右，日军炸毁了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满洲事变由此爆发。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立即炮轰北大营，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则开始进攻奉天城。19日凌晨1点多，关东军又向各部队发出了进攻命令，同时要求朝鲜驻屯军也前来支援。至19日早晨，日军攻陷了北大营和奉天城，同日占领长春、奉天、营口、安东等满铁沿线相关的18个南满的主要城市。

19日凌晨1点多，东京的陆军中央接到奉天的第一封电报，电报称“暴戾的中国军队”“炸毁了满铁铁路”，两国部队发生了冲突。接着，凌晨2点，又接到了第二封电报，称中国军队“炸毁”满铁铁路，目前正在交战。之后，电报接踵而至。

上午7点，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了联合首脑会议，协商满洲事变的对策。出席人员包括陆军省的次官

杉山元、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以及参谋本部的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部长梅津美治郎、作战课课长今村均（代替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情报部部长桥本虎之助，此外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按照今村的说法，永田实质上是局长待遇，即使在这样的局部级以上的会议，也特别被允许出席，小矶和建川都对永田高看一眼。

在此次会议上，小矶军务局局长发言称：“关东军此次行动完全恰当”，全体对此没有异议，并决定向内阁会议提议增派兵力。会议决定，由今村均率领作战课制定增派方案，由永田率领军事课准备向内阁会议提交的方案。会议没有对满洲发生的事件内容进行任何调查和核实，便立即同意全面出动关东军，并决定增派兵力。从动作如此迅速可以看出，在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这一级别上，至少主要人员已经预料到，不论发生的日期是否是9月18日，不久（大概9月27日左右）将要在满洲爆发事变。

上午8点半，陆军省接到了朝鲜驻屯军司令官林銑十郎的报告。报告称，已经命令飞行队二中队赶赴增援关东军，并且正在准备让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平壤）向奉天方面出动。但是，决定向海外派兵，不仅需要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批准，还需要内阁的批准，然后，必须天皇批准并下达奉诏命令。另外，必须在内阁会议上批准相关的经费支出。

因此，参谋本部认为朝鲜驻屯军不宜擅自行动，指示部队暂缓行动，同时打算让内阁会议批准往满洲越境派兵。

但是，上午10点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币原喜重郎外相向南次郎陆相出示了一份奉天领事馆发来的电文，这份电文暗示，柳条湖事件是关东军按照计划发动的。这样，南次郎陆相无法再提议增援关东军，最终会议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同日上午，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荒木贞夫教育总监部本部长三人在陆军省会合，就以本次事件“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动机”的方针达成一致。这里所说的解决满蒙问题，意思是“完全确保条约上的既得权益”，并不涉及军事占领整个满洲。此时，以宇垣派为核心的陆军高层与永田等人的一夕会不同，他们把保障条约上的既得权益作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重点。

金谷参谋总长听取了南次郎陆相有关三人同意不扩大方针的报告后，向内部表示，“有必要立即对事件进行处理，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是，作战课课长今村均提出了反对恢复原来状态的意见，称“箭已离弦，不得不发”。下午，作战课拟定了《满洲时局善后对策》，得到了参谋本部首脑会议（次长、部长级）的批准。

这份善后对策认为，“断然不可”“让军队恢复原状”，应该维持现状。如果内阁不批准，陆相就该辞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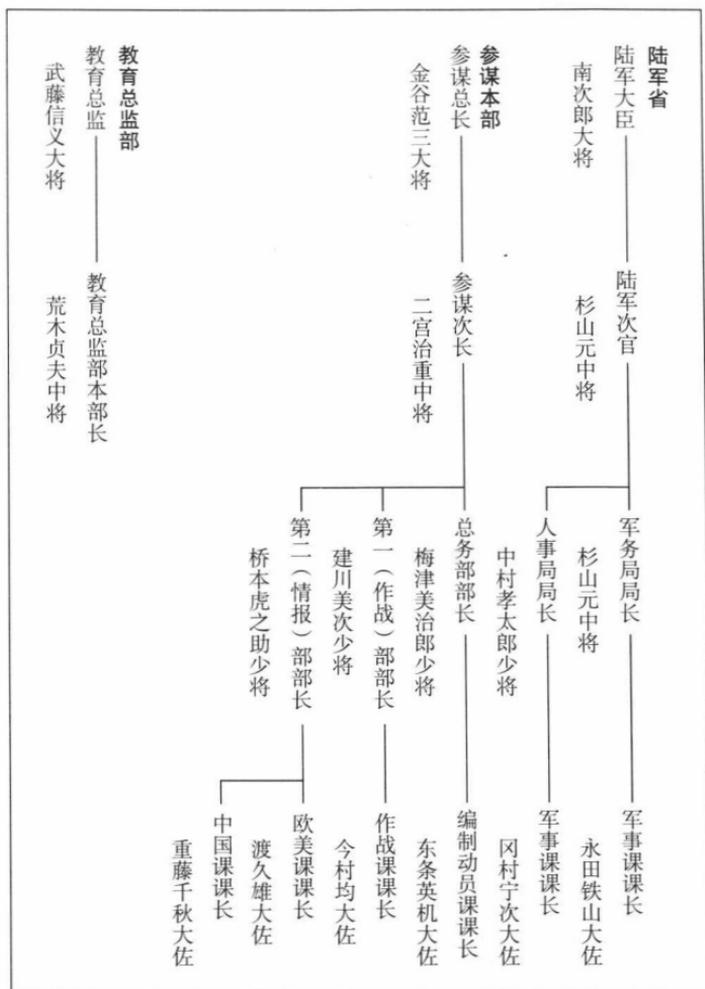


图6 柳条湖事件时的陆军中央

即使因此“政府瓦解”，也“丝毫不必担心”。进而，《对策》认为，此时陆军大臣应该以“最后的决心”向内阁会议提出，逼迫中方解决有关满蒙的各种问题。

9月20日上午10点，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荒木贞夫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这三大部门首脑确认了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为此“即使政府垮台也毫不在意”的方针，并拒绝恢复原状。

另外，以永田为首的军事课根据上述作战课拟定的《满洲时局善后对策》，制定了如下“时局对策”，并得到了三长官会议（南次郎陆相、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武藤信义教育总监）的批准，其内容是：没有必要反对“努力不扩大事态的内阁会议决定”，但是，它与军队的行动应当另当别论，军队为了完成任务，应该审时度势，“见机行事”，其行动不受中央的“拘束”；只要不消除满蒙问题的“根本祸根”，“断然不可让军队恢复原状”；出动关东军是出于“发动帝国自卫权”，应该以“最后的决心”迫使内阁一并解决满蒙的各种问题。

9月21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对于一并解决满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就关东军的态势，主张维持现状和主张恢复原状的各占半数。另外，关于从朝鲜驻屯军增兵的问题，若槻首相同意陆相的意见，但其他内阁成员都表示反对，会议最终没有做出任何具体决定。

关东军中的石原、板垣等人从一开始便企图军事占

领整个满洲，但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拥有兵力大约 40 万人，而关东军的兵力为 1 万多人，要占领整个满洲，无论如何需要兵力增援。因此，石原等人策划 20 日由特务机关在满铁沿线之外的吉林制造混乱，21 日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让第二师团主力进攻吉林。然后，以满铁沿线兵力薄弱为由，要求朝鲜驻屯军前来增援。对于满铁沿线以外的地区，关东军在条约上不拥有驻兵权，因此，这样的出兵是一种越权行为。

担任朝鲜驻屯军司令的林銑十郎擅自命令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越境，部队于下午 1 点越过边境，进入满洲。

参谋本部接到这个消息后，决定由总长单独上奏天皇，以便让天皇直接批准派兵。当日下午 5 点多，金谷范三参谋总长秘密向南次郎陆相透露后，入宫参见天皇。但是，上奏之前，他接到了参谋本部的电话，让其停止请求派兵之事，后来，按照担任裕仁天皇武官长的奈良武次的建议，金谷仅仅报告了擅自越境的事实。

这个电话是因为以永田为首的军事课强硬反对。永田等人的反对理由有二：其一，“需要支出经费的增兵，不经内阁会议批准，而仅由统帅系统直接上奏，极为不妥。”其二，不与军务局局长、军事课课长商量，仅仅得到陆相的理解，这样的直接上奏意味着“对局长、课长的不信任”。

这件事有以下几点引人注目。

关于第一个问题，今村作战课长认为，参谋总长拥

有这种单独上奏权，是日本的特色。但永田认为，未经内阁的批准，而仅由统帅系统派兵，不能接受。

这是因为，永田考虑，没有内阁的支持，满洲事变会失去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且经费得不到保证，最后很可能会失败。如后所述，这是因为永田虽一直考虑通过陆相控制内阁（包括陆相以辞职恫吓的方法），但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向海外派兵的经费支出必须有内阁的决定，没有财政上的保证不可能长期出兵。

尽管如此，已经得到陆相同意的参谋总长的上奏内容，仅仅因为陆军省一名课长及其课员的意见，而且是在进宫参见的时候发生更改，这种事对于本来等级秩序严格的陆军组织来说，通常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这里也说明永田在当时的陆军中央具有强大的发言权。刚才提到的永田出席部局长会议，还有今村按照永田的意向就任作战课课长，也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不仅是因为陆军省赏识永田作为一名军事官僚的能力，更重要的，乃是因为一夕会这一中坚幕僚团体具有的影响力。

关于第二点，一般来看，参谋总长和陆相一致同意决定的事情，无论下级意见如何，可以视为陆军的组织决定。然而，永田却认为，这必须经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部长、局长、课长之间讨论。虽然这可以解释为单纯是从实际业务的角度提出的要求，但也可以说，这是主张陆军首脑的行动必须通过中坚幕僚层这一渠道。可

以认为，这是以永田为首的一夕会的想法，即想要通过中坚幕僚控制陆军高层。

当天夜晚，陆军内部讨论了如何应对次日将要召开的内阁会议。他们得到了情报，内阁和民政党把朝鲜驻屯军司令林銑十郎擅自发出的越境命令视为“干犯大权”，因此，有可能在内阁会议上成为问题，需要协商对策。经过讨论，最终约定，如果内阁会议上被视为“干犯大权”，陆相和参谋总长便宣布辞职。

然而，次日召开内阁会议之前，小矶军务局局长请求若槻首相理解朝鲜驻屯军的行动时，若槻表示了认可的态度，说：“既已出动，岂非无奈？”

在上午的内阁会议上，对于朝鲜驻屯军的擅自出兵，既没有内阁成员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表示赞成。而且，既已出动，内阁成员便全体承认了这个事实。既然承认了这个事实，便支出所需的经费。内阁会议做出这样的决定后，由若槻首相把结果上奏给了天皇（出兵吉林也置之不问）。

那么，为什么若槻首相认可朝鲜驻屯军进入满洲呢？这是为了避免因南次郎陆相辞职而造成内阁总辞职。因为他预料，当时陆军中央一致要求批准派遣朝鲜驻屯军，如果陆相辞职，将难以觅到后任陆相适任者。

若槻根本不想在事变爆发后事态紧急的情况下，提出内阁总辞职。这是因为，如果政权瓦解，事态进一步扩大，那么，势必将根本破坏滨口内阁、若槻内阁两届

民政党内阁的外交政策。

此后，由陆相、参谋总长向天皇上奏了向满洲派遣朝鲜驻屯军部队的事，得到了天皇的批准。至此，朝鲜驻屯军的擅自出兵，通过事后批准而成为正式的派兵。但是，币原外相后来在内阁会议上，对主张维持关东军现状的南次郎陆相仍然反驳说：“最终应该恢复原状”。虽然若槻和币原基本同意支出经费，但仍然一直努力控制陆军，想要实现撤军。

在此期间，上述七课长会议连日聚会，有意识地让形势向“有利于关东军展开活动”的方向发展。

而关东军以9月21日甘粕正彦等人在哈尔滨制造的爆炸事件为由，22日要求出兵哈尔滨，保护日本侨民。但是，陆军中央没有批准。这是因为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接受了内阁会议“不扩大事态”的决定，而二宫治重参谋次长、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等宇垣派首脑也警惕苏联介入，对出兵北满持慎重态度。

同日，若槻首相上奏了应对发生爆炸事件的哈尔滨和间岛（今延吉市）事态的方针，危急时，将采取撤侨措施，而不是在当地实行保护。

9月23日，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荒木贞夫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小矶国昭军务局局长进行会谈时，决定了把关东军占领范围从满铁沿线向两侧大幅度扩大的方案。但是，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对此强硬表示反对，拒绝批准。这是因为内阁已经制

定了“不扩大”的方针。

接着，南次郎陆相按照内阁的意见，向杉山元次官等人说明了“将全部兵力撤回〔满铁〕附属地以内”的方针。9月24日，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不顾今村均作战课课长、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等人的反对意见，命令除吉林外，“从满铁外侧占领地点撤回部队”，同时对关东军也下达了撤回附属地以内的命令。

另外，内阁当天发表了《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声明中称，由于一部分中国军队炸毁了满铁铁路，并攻击日本方面的守备队，因此日军反击，排除了危险原因；并声明在确认日本侨民安全之后，将撤退到满铁附属地以内。

9月26日，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不顾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等人的反对，下达了从吉林撤退的命令。但是，这些撤军命令在当地并没有得到实施，最终不了了之。不过，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的这种姿态——虽然两者本来属于宇垣一派，尊重内阁的决定——都未必是出于自己的政策信念，而是夹在内阁和中坚幕僚层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9月28日，关东军再次试探出兵哈尔滨，但陆军中央考虑到内阁的方针，没有同意出兵。

另外，在9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若槻首相要求一律不得干预满洲建立新政权。南次郎陆相也表示同意。会后，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指示各部长，“完全不要



图7
南次郎

干预这种〔建立新政权的〕运动”。同时，南次郎陆相也给关东军发了电报，“严格禁止”干预建立新政权的运动。

这是为了阻止关东军建立新政权的活动。关东军按照9月22日制定的《满蒙问题解决策案》，已经开始为建立独立政权而活动。

石原、板垣等人最初计划“占领满蒙”，但是，在与9月18日来满洲的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会谈时，石原等人占领满蒙的主张与建川美次建立独立政权的主张（在中国主权下）发生了分歧。9月20日，建川美次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重申“建立独立政权是日本的国策”。9月22日，受此影响，关东军着重“实质上取得效果”，制定了大致以建立独立政权为内容的《满蒙问题解决策案》，并报给了陆军中央。

《满蒙问题解决策案》的内容是：针对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东三省以及热河省在内的地区，建立一个以宣统皇帝为首的独立政权（中国政权），由日本掌控国防、外交、交通、通信等部门。

此外，当时建川美次对向长春以北的北满派兵也持反对意见，而石原等人从一开始就考虑武力制压整个满洲。

但是，9月21日建川美次离开满洲后，关东军再次开始推动建立独立国家。10月2日，石原、板垣等人拟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案》，主张“把满蒙作为一个

独立国家，置于我保护之下”，并相互约定，如果政府不接受这个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将临时脱离日本国籍，全力以赴实现目标”。

另一方面，在陆军中央，9月25日永田等人召开了七课长会议。会议违背南次郎陆相和金谷参谋总长的指示，起草了一份包括建立满蒙新政权在内的《时局对策案》。另外，建议将中国班班长根本博等人派往满洲以实行这一方案。但是，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对此勃然大怒，立刻让中止派遣活动。

但是，七课长会议继续按照《时局对策案》的方向进行讨论，9月30日完成最终方案，称为《关于解决满洲事变的方针》。这个方案的要点是，建立“独立政权”，以便将满蒙地区从中国本土“在政治上分离”，而“帝国从背后操控这个政权”，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日中之间的问题。

这一方案中其他引人注目的内容是，由于将建立一个独立政权，预料其将与中国本土政权之间产生相当长期的纠纷。为了改善关系，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需要清除华北地区的张学良势力。为此，要利用华北的反蒋势力和旧北洋军阀势力。第二，支持国民党反蒋派建立的广东政府，策划瓦解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第三，通过日本的善意支持，在华北和华中建立政权，缓和对满蒙新政权的抗争态度。

这就意味着，永田为首的七课长会议判断，满蒙新

政权与蒋介石国民政府难以共存。

永田为首的七课长会议，不顾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不干预新政权运动”的指示，强行推动建立新政权。可以想象，七课长会议的这种行动背后有一夕会派中坚幕僚团体的支持。另外，建川美次等宇垣派的部分人也支持建立独立的新政权。

中国方面，满洲事变爆发当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 13 万人开赴北平（今北京），蒋介石为了“讨伐”共军，离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正在南昌前线亲自指挥。接着，长江流域由于大雨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洪水，受灾人数将近 6000 万人。

张学良早已下令自己在东北的军队慎重对待日军的挑衅，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爆发满洲事变之后，他仍然禁止抵抗日军，命令在满洲的部队不扩大战斗。蒋介石也企图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因此他支持张学良的方针，9 月 21 日向国际联盟提起诉讼。

9 月 22 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受理了中方的诉讼，将之列为一个正式议题。最后，包括日本在内，全会一致批准了要求日中双方不扩大事态和两军撤退的通告。未加入国际联盟的美国对此也表示支持。英国于前一天在世界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宣告脱离金本位制，此时正忙于善后对策。而美国在胡佛担任总统的共和党政权下，由国务卿亨利·史汀生主导，决定竭力支持遏制日本军部、努力不扩大事态的若槻首相和币原外

相这一阵线。

24日，日本政府发表“不扩大声明”，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谦吉表示日本将逐步撤军。中方要求理事会派遣调查团，但日方主张由日中直接谈判，中方的要求没有被接受（当时，日本是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3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不扩大事件的决议后，开始休会两周，而对日本撤军并没有特别规定期限。

但是，到了10月，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0月1日，南次郎陆相在内阁会议上发言称：“如果现在撤军，日本将会陷入非常困难的立场”，阐述了反对撤军的意见。当时，币原外相表示：“应该在撤军以后开始谈判”。对此，南次郎陆相主张：“在问题解决之前，绝不应该撤军”。进而，10月5日，南次郎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满洲的独立〔建立新政权〕，由政府决定”。12日，他又表示对满洲的新政权表面上不加干涉，但肯定了从背后操纵的态度。

也就是说，从原来的“从满铁沿线撤军，不干预新政权”的态度，转变为拒绝撤军、同意操纵新政权。而追随南次郎的金谷范三也持同样的看法。

10月8日，南次郎陆相、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武藤章教育总监组成的三长官会议制定了《时局处理方案》，决定与新政权谈判，根本解决满蒙问题。这个方案依据9月30日七课长会议拟定的《关于解决满洲事

变的方针》，决定表面上避免干预新政权建立，而背后提供帮助。次日，《时局处理方案》被提交给若槻首相。

如上所述，南次郎和金谷范三有关撤军和不干预新政权的言论，并非出自自己的政策信念，而是按照内阁的决定而发表的，因此，他们的态度本来就摇摆不定。所以，他们没有向关东军下达撤军命令，而且，在要求陆军内部不干预满洲新政权的指示在七课长会议上实际被无视的情况下，受到一夕会派中坚幕僚的强大压力，他们最终转变了态度。

10月8日，关东军未经陆军中央批准，便轰炸了锦州。当时，被赶出奉天的张学良政权把政府临时设置在位于辽宁省西部的锦州。这次轰炸违背了日本政府此前不扩大事态、逐步撤军的承诺，震动了若槻内阁和国际社会，而这正是石原等人的关东军目的所在。

在南次郎陆相转变态度的同时，若槻内阁的方针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与朝鲜驻屯军擅自越境时一样，这是为了避免一直对内阁持合作态度的南次郎辞去陆相一职。

轰炸锦州的第二天，若槻内阁拒绝了国民政府提出的在10月14日前撤军的要求。12日，若槻内阁向中方做了答复：日中之间就铁路问题、经营权等达成一定协议后，日本将撤军到满铁附属地以内。这是对撤军附加了一个新的条件。在此之前，若槻内阁一直要求日

中之间直接谈判，但对于撤军本身，则表示除了保障日本侨民的安全以外，并不附加特别的条件。

另外，10月中旬（16日以前），日本内阁就在满洲建立新政权达成了一致意见：不允许公开援助，但是，“如果是背后进行，则是事不得已”。也就是说，尽管是背后，但是容许干预满蒙新政权，在态度上发生了转变。

进而，10月26日，内阁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声明称，如果把部队全部撤回满铁附属地以内，将会进一步恶化事态。声明彻底改变了此前的撤军方针，表示了承认既成事实的态度。

另外，同一时期，内阁宣布，张学良政权作为东三省的政权已经没有意义，应该促进“发展中方的地方治安维持机构”，从而提出了促进建立满蒙新政权的方针。

此时，若槻内阁从根本上转变了此前的方针，事实上采取了容许日军军事占领南满和建立新政权的态度。不过，若槻等人的目的是，避免南次郎陆相辞职，恢复与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的合作，从而阻止关东军进一步的鲁莽行动。这是因为，内阁控制关东军，绝对需要南次郎和金谷范三的合作。

另外，他们考虑，从国际关系上来看，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在当前事态平息之前，国际联盟和美国除了官方的谴责之外，实际上可能是接受的。从对《国际联盟盟约》和《九国公约》的应对来看，这也应该是一个底线。

3. 犬养毅内阁的成立与 荒木贞夫就任陆相

但是，若槻内阁和南次郎陆相、金谷参谋总长受关东军和永田为首的中坚幕僚层牵制的事态到此为止。

到了11月，关东军企图进攻北满的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但陆军中央高层担心与苏联发生冲突，因而启动了“临时参谋总长委任命令（临参委命）”阻止这项行动，试图强化对关东军行动的控制。若槻内阁也考虑到国际影响，竭力要求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制止关东军的行动。所谓“临时参谋总长委任命令”，指的是经天皇许可，参谋总长能够直接指挥和命令本来接受天皇统率的驻外军队司令官的一种权限，它是为了强化对关东军等驻外机构控制的一项措施。

通过这个方法，南次郎陆相、金谷范三参谋总长阻止了关东军长期占领齐齐哈尔的企图，进而制止了关东军对张学良政权所在的锦州发动进攻的计划。锦州位于京奉铁路的沿线，它牵涉到英国权益。对于关东军进攻锦州的计划，若槻内阁也曾经强烈要求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阻止这项行动。

实际上，此时，在与以往不同的程度上，陆军中央高层与一夕会派中坚幕僚层之间公开发生了意见分歧。

在陆军中央内部，不仅南次郎陆相和金谷参谋总长，而且宇垣派的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小矶国昭军务局局长、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等人也从对苏关系和对英关系出发，反对占领齐齐哈尔和进攻锦州。这些陆军首脑人物表明了强硬态度，甚至不惜更换关东军司令官以下的主要幕僚。由于陆军中央高层坚定的态度，关东军无奈放弃了占领齐齐哈尔和进攻锦州的计划。另外，南次郎、金谷范三为首的陆军中央高层对在满蒙地区建立独立国家也持批评态度，不同意关东军的方针。若槻内阁也表示，绝对不允许在满蒙地区建立独立国家。

但是，以永田为首的一夕会派的中央幕僚层对关东军的行动基本上表示支持，他们从最初就考虑事实统治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另外，他们认为，张学良政权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应该同意进攻锦州。而且，他们也同意在满蒙地区建立独立国家。

在军事占领南满（锦州地区除外）和建立新政权之前，永田、冈村等一夕会派的中央幕僚把建川美次、小矶国昭等的宇垣派强硬人物拉入自己的阵营，最终控制了南次郎和金谷范三，也控制了事态的发展。但是，在占领齐齐哈尔、进攻锦州的问题上，以及建立独立国家的问题上，没有能够让陆军高层听从他们的意见。另外，关东军也取消了这些行动。

但是，其后，如后所述，若槻内阁宣布总辞职。一

夕会拥立的荒木贞夫就任犬养毅内阁的陆相后，开始实施占领齐齐哈尔和占领锦州的计划。另外，南次郎担任陆相时的宇垣派陆军首脑人物也基本上被扫除出局。

在此期间，发生了所谓的十月事件。

担任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的桥本欣五郎等人策划以“樱会”的成员为主，从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动员兵力，于10月下旬发动政变，建立以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事政权。但是，计划事先败露。10月17日，桥本等主谋被宪兵队保护拘留，政变流产。

当时永田铁山军事课课长、东条英机编制动员课课长、渡久雄欧美课课长以及担任陆军大学教官的小畑敏四郎等一夕会核心成员纷纷进行活动，以阻止政变。当时，永田发言称：“不要除掉他们，利用他们吓唬一下内阁，对我们有利”。接到报告的陆军高层决定将桥本等主谋关禁闭，并于10月17日凌晨采取了行动。

樱会是1930年10月以桥本欣五郎等参谋本部第二部的少壮军官为核心，再加上部队军官成立的团体，其核心成员的目标是，通过政变改造国家。他们也参与了三月事件。根本博、武藤章等一部分一夕会成员也是樱会的成员，根本博在十月事件中被关禁闭。另外，冈村等一夕会的领导成员，此时也谈到了有必要“改造国家”。不过，对于十月事件有关人员的处分也只是“严重反省”等轻微处分。

这次十月事件作为一次军队的政变未遂事件，对政

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上述《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等若槻内阁转变政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0月底，在民政党中地位仅次于若槻首相，而且因职务原因从警视厅获取了十月事件等情报的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向若槻首相提交了与政友会组成联合内阁的提案，开始了所谓的联合内阁运动。关于安达如何考虑与军队的关系，有不同的议论，但是，当时担任政友会总裁的犬养毅曾经有过这样的发言：“必须着手从陆军的根本组织进行改变。如果那样，单纯依靠政友会，将无能为力。无论如何，必须组成一个联合政权。”最初，若槻似乎对安达的意见表示赞同，但由于井上准之助藏相、币原外相等内阁成员的强烈反对，他开始反对组成联合内阁的提案。安达对此表示不满，拒绝出席内阁会议，最终迫使若槻内阁于12月11日宣布总辞职。对于在若槻内阁和南次郎陆相下停止行动的关东军以及以永田为首的一夕会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时机（关于当时安达令人费解的行动，参见拙著《满洲事变与政党政治》）。

1931年12月13日，经元老西园寺等人奏荐，犬养毅政友会内阁成立。一夕会拥立的三将官之一、当时担任教育总监部部长的荒木贞夫进入内阁，成为陆军大臣。当时，永田给政友会的实权人物小川平吉写了这样一封书信：

关于陆相候补一事，紧急相告……长老可能推荐阿部中将……至少会被列为候补之一，但该中将稳定不住现在的陆军……现在，该人绝对不胜任。荒木中将、林（铣十郎）中将，乃众望所归。此类动静，森恪先生也应当有所了解（……最近，阿部大热，乃宇垣大将活动的结果，部内正感愤慨）。[……为省略内容。下同]

信的宗旨是，排斥宇垣推荐的前陆军次官阿部信行，推举荒木贞夫或者林铣十郎。小川平吉在致犬养毅的信中，以一名身居陆军要职、极其公平的某大佐的意见为名，转达了永田的这个意见，并称自己也认为荒木贞夫最为胜任。

针对政友会，不仅通过基于一夕会关系的永田、小川平吉渠道，而且通过铃木贞一对党内的实权人物森恪做了工作。铃木后来这样回忆：

陆相的推荐大体上集中于一个人，而且从陆军中推选，这是惯例。但是，从当时陆军高层的氛围来看，当时的形势是将会推荐别的人物，而非荒木贞夫。铃木贞一和森恪希望荒木贞夫成为陆相。因此，他们通过森恪对犬养毅做工作，让犬养毅对陆军提出这样的要求：“陆军推选陆相时，不要集中于一个人，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推选两个或者三个人，由总理大臣从中挑选”。这样，陆军推举了多

个候补人选，犬养毅从中挑选了荒木。森恪对挑选荒木担任陆相，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当时，推荐陆相候选人的陆军三长官会议由南次郎陆相、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武藤章教育总监三人组成。南次郎和金谷范三推选宇垣派的阿部，而武藤章与真崎甚三郎同属于佐贺派，推选了荒木贞夫。因此，如果将陆相候选人集中于一个人，很可能阿部当选陆相。因此，以永田为首的一夕会通过森恪、小川平吉做工作，首先让犬养毅提出推荐多个陆相候选人的要求，然后从中任命荒木贞夫为陆相。

实际上，组阁前一天晚上，陆军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组成以民政党为主的内阁和联合内阁，则南次郎陆相继续留任；如果组成政友会单独内阁，则推选荒木贞夫或者阿部信行。犬养毅首相最初希望南次郎陆相能够留任，但南次郎谢绝了，并推举了阿部和荒木二人，最终犬养毅任命荒木贞夫担任陆相。

也就是说，永田为首的一夕会让陆军高层正式推荐阿部信行和荒木贞夫，然后通过对政友会做政治工作，最终实现了荒木贞夫就任陆相的目的。所以，荒木贞夫就任陆相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荒木贞夫就任首相后，让皇族的闲院宫载仁亲王出任参谋总长，并于翌年（1932年）1月，任命当时的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为参谋次长。此后，真崎甚三郎

图 8
荒木贞夫



便掌握了参谋本部的实权。而真崎也是一夕会推举的三将官之一。

2月，荒木、真崎二人强行更换了任职只有半年的作战课课长今村均，让小畑敏四郎接任，又任命了山冈重厚担任军务局局长。4月，永田就任情报部部长，山下奉文就任军事课课长。另外，小畑就任作战课课长仅两个月之后，便调任运输通信部部长，而作战课课长的职务则由铃木率道接任。这些人全部是一夕会成员。而且，宇垣派的杉山元、二宫治重、建川美次、小矶国昭等人被赶出了陆军中央，宇垣派全部被排除出陆军中央的要职。这样，陆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内部政变。

另一方面，荒木贞夫就任陆相后，早在前一年12月23日，就拟定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协商的第一个方案《时局处理要纲案》。该方案决定：“满蒙地区（包括北满）目前作为一个从中国本部政权分离并独立的政权所统治控制的范围，以后将逐渐诱导其变为帝国保护的国家”。这样，陆军中央正式把在满蒙建立独立国家列为具体的计划。这是日本满蒙政策的一个巨大变化：从建立中国主权下的新政权，转变为建立独立国家。另外，对于中国本土，要求杜绝排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同时扶植反张学良、反蒋介石势力，以期推翻国民党政权。另外，必要时断然出兵，以保护重要地区的日本侨民。

1932年1月6日，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相关课

长共同制定了三省协商方案（陆军方面为永田军事课课长）。这一方案以陆军《时局处理要纲案》的满蒙政策方针为基础，确定了当前将满蒙置于独立政权之下，“逐渐诱导，使其具有国家之形式”的方针。接着，3月12日，犬养内阁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决定“鉴于满蒙地区已经成为从中国本部政权分离的独立政权所统治控制的范围这一现状，应当诱导使其逐渐具有国家之实质”。这样，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获得了内阁的正式批准。而在此之前的3月1日，在关东军的主导下，以前黑龙江省省长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成立“满洲国”。

另外，同年8月，永田对石原说：“我们的方针是将满洲逐渐变为自己的领土”，这与石原建立独立国家的主张产生了分歧。永田似乎仍然没有放弃占领满蒙的主张。

而荒木贞夫陆相和真崎甚三郎担任参谋次长的陆军中央，按照关东军的要求，在前一年（1931年）12月17日、27日，从日本本土和朝鲜向满洲增派了兵力。自12月28日起，用大约两个师团的兵力对锦州发动了进攻，并于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另外，1月28日，关东军经参谋本部批准，开始对哈尔滨发动进攻，并于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另外，齐齐哈尔也从前一年12月15日起被日军长期占领。至此，日军基本上已经将满洲的主要城市置于统治之下。此时，柳条湖事件

发生仅4个半月。

其间，1月28日，在上海发生了日中两军爆发冲突的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众所周知，这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受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委托，为了转移列国对满洲的注意而策划的谋略。5月5日，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国际联盟对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轰炸锦州表明了强硬态度。首先，16日，决定邀请美国作为观察员参加国际联盟理事会。24日，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决议案，要求日本立即开始撤军，并在11月16日之前完成撤军。在表决时，只有日本反对，13票对1票，多数赞成，但由于原则上必须全会一致，所以决议没有正式成立。

但是，12月10日，也就是若槻内阁总辞职的前一天，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派遣调查团，开展实地调查。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从欧洲出发，29日抵达日本。另外，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月7日发表了所谓的“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主义），宣布关于满洲的形势，不承认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和《巴黎非战公约》的一切事态。

在这样的形势下，“满洲国”宣布成立，并且，随着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满洲事变告一段落。

关于满洲事变，通常有人认为是关东军强行推动陆

军中央实施的军事行动。但是，从以上情况来看，与其说是关东军强行推动的，不如说是陆军中央的一夕会派中坚幕僚团体与之呼应，推动陆军高层发动的。因此，可以说，满洲事变是以石原、板垣为首的关东军与陆军中央以永田、冈村、东条等一夕会派中坚幕僚团体相互合作的结果。

犬养毅内阁通过的《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基本同意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但是，出于对国际社会的考虑，对正式承认“满洲国”持消极态度。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国内发生了五一五事件。1932年5月15日，三上卓、古贺清志等海军青年军官以及陆军士官候补生、“爱乡塾”学生等人袭击了首相官邸、警视厅等地，杀害了犬养毅首相。

5月22日，经元老西园寺等人奏荐，曾任朝鲜总督的斋藤实（海军大将、预备役）被任命为首相，并组阁。此后，到1945年战败为止，一直没有恢复政党内阁，政党政治的时代由此告终。

荒木贞夫留任斋藤内阁的陆相，同一时期林銑十郎担任教育总监。参谋本部则由真崎甚三郎次长掌握实权。这样，一夕会推举的荒木贞夫、林銑十郎、真崎甚三郎实际上占据了陆军高层的所有职位。

这中间，5月17日永田与原田熊雄、近卫文麿、木户幸一等西园寺的亲信交谈时，阐述了以下想法。就在大约一个月之前的4月11日，永田就任参谋本部情

报部部长（陆军少将）。

现在的政党政治绝对应该排斥。如果让政党组
成单独内阁，恐怕会无人就任陆军大臣，结果将会
陷入难以组阁的情况。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永田暗示了强烈反对政党政治
的态度和通过陆相的去留控制内阁的意图。

此外，一夕会的小畑敏四郎、铃木贞一也向原田熊
雄等西园寺的亲信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对西
园寺的判断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它作为
在陆军内有影响力的中坚幕僚的意向，对西园寺来说，
应该具有不可轻视的政治意义。

9月15日，刚刚成立的斋藤实内阁签署“日满议
定书”，正式承认“满洲国”。

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后发行的《外交时报》
10月刊上，刊登了一篇永田撰写的题为“满蒙问题感
怀之一端”的文章，其中有如下论述：事变是在多年
“极端惨无人道的排日侮日”的形势下，对于“暴戾的
辽宁军阀〔张学良〕的挑衅”，不得已挥舞的“破邪显
正之利刃”；以“东洋盟主”自任的日本“为保障生
存，贯彻福利均分的主张，有何惧哉？”

这可以说是永田等人当时对满洲事变正式的定位。

1932年10月2日，国际联盟发表了《李顿报告
书》，指出不能承认日军的行动和“满洲国”。斋藤内

阁早在8月27日已经制定了视情况不惜退出国际联盟的方针。1933年2月14日，国际联盟十九人委员会接受委托对《李顿报告书》进行审议，决定了报告方案：采纳《李顿报告书》；不承认“满洲国”。拿到报告方案的斋藤内阁做出了内阁会议决定：如果国联大会通过这个报告方案，将退出国际联盟。

陆军中央也主张，满洲事变是日本行使自卫权，建立“满洲国”是由于中国内部的分裂运动，如果日方的主张得不到承认，退出国际联盟也是无奈之举。

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十九人委员会的报告和劝告日本撤军的方案。以松冈洋右为首的日本代表团立即退场，并于3月27日正式通告退出国际联盟。

不过，“满洲国”在形式上变成不仅是东三省，还包括内蒙古东部的热河省（长城以北）。但是，热河省实际上仍然处于张学良势力的控制之下，因此，关东军试图把这里也编入“满洲国”。

陆军中央同意关东军把热河编入“满洲国”的方针，但最初出于国际舆论的考虑，没有批准军事进攻。但后来，在关东军的强烈要求下，决定进攻热河。

2月17日，斋藤内阁按照陆军的要求，批准对热河省发动进攻。24日，国际联盟通过《劝告撤军方案》（基于事前的内阁会议决定，日本事实上已经确定退出国联），次日，关东军便正式对热河发动了进攻。3月4

日，关东军占领省会承德，10 日前后到达长城线。

另一方面，当时担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一系列谋略活动，试图在当地策动反蒋介石势力发动政变，呼应热河的战役，并在当地建立亲日“满”的政权。作为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的永田负责这种工作，也与这些谋略活动有关，把建立反蒋政权的有关活动资金交给了板垣。当时，永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说：“蒋介石要视为我们的敌人”，虽然不宣扬打倒国民党，但“凡是不符合日本根本要求的主义和党派，唯有〔从华北〕铲除”。但是，这次策划活动最终宣告失败，未能建立反蒋政权。

4 月 10 日，关东军突破长城防线，进攻河北省境内，但不久撤退。5 月 3 日，关东军再次越过长城，入侵河北省境内，向北京、天津方向发动进攻。此时，真崎甚三郎参谋次长向京津等地的陆军各机构传达了《北支那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其中包括让当时的华北政权屈服于日军的指示。该方案中，为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满洲国”的稳定统治，同意板垣等人企图在京津地区建立亲“日满”政权的谋略工作。

此后，关东军继续进攻，到 5 月下旬，已经逼近北京（北平），距北京仅有几十公里。5 月 25 日，中方终于向日本提出停战要求，并于 5 月 31 日缔结塘沽停战协定，规定了在河北省东部设立非武装地带等内容。

通常，将这一段时期称为满洲事变时期。

第三章

昭和陆军的构想

——永田铁山



图9 永田铁山（讲谈社供图）

1. 国家总动员论

那么，陆军的一夕会派中坚幕僚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发动了满洲事变呢？其背后有什么样的构想？下面，我们以一夕会派中坚幕僚的核心人物，并作为主导满洲事变以后日本陆军的人物之一而闻名的永田铁山的构想为中心，进行深入的研究。

永田出生于长野县諏访市，陆军大学毕业后被派驻欧洲，尤其是德国周边，进行军事调查等工作，除一战期间回国外，前后大约六年时间。“巴登巴登聚会”后，先后领导二叶会、木曜会、一夕会，并担任陆军省整备局首任动员课课长，在满洲事变时期，就任军务局军事课课长。军事课课长是陆军实务中最为重要的职位。后来，又历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一直身居陆军要职。1935年8月，在担任军务局局长期间，在办公室被刺杀。翌年，发生二二六事件，两年后爆发日中战争。

那么，永田有什么样的构想呢？

驻欧洲期间，永田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受到巨大震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年7月至1918年11月，长达将近四年半时间。其间不仅投入了庞大的人员和物资，耗费了巨额的战争费用，而且带来

了规模空前的牺牲和破坏，阵亡人数达到 900 万，负伤人数达到 2000 万。在此次大战中，坦克、飞机等机械化兵器正式登场，与人相比，机械在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了不仅需要动员兵力，而且需要对兵器工业、机械制造工业以及支撑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实施总动员，倾举国之力的一场国家总体战。

另外，当时日本已经预料到，今后近代工业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总体战，同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由于各国势力范围的交错和合作关系，将变为长期的世界战争。

永田认识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由于坦克和飞机等“新兵器”的出现和大规模使用，转变成机械战；由于通信和交通工具的革新，战争规模飞跃性地扩大；需要支撑以上这些的庞大军需物资。由于这些变化，战争已经成为不仅要在陆海军，而且要在“国家社会的各方面”进行战争动员，亦即进行“国家总动员”的国家总体战。

而且，永田认为，今后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由于势力范围的错综复杂和国家间同盟合作等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将会引发世界大战。因此，永田主张，为了将来，有必要做好国家总体战的准备。

永田说，像以往一样单纯依靠常备军和战时军队动

员计划来构成战时武力及仅仅运用它，将达不到“现代国防的目的”。必须进一步整合能够“转变成战争力量”的“人力、物力、有形、无形的一切要素”，并组织地充分运用。因此，没有这样的“国家总动员”准备计划，将不可能实现需要发挥“最大国家战争力量”的现代国防。也就是说，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美的总动员经验的研究，他认为，不仅需要战时的军队动员计划，而且必须平时进行国家总动员的准备和计划。

永田进一步指出，作为这种国家总动员在平时的准备工作，需要进行资源调查、短缺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制定总动员计划等工作。尤其是需要重视短缺资源的保障，也就是重视确保面向战时的资源自给体制问题。

我们分析一下永田这种国家总动员论的几个引人注目的地方。

国家总动员的具体内容，由国民动员、产业动员、财政动员、精神动员等组成。首先，国民动员，是指为了适应军队的需要和战时国民生活的需要，而统一控制、调整和有效地配置人员。他还指出，必要时采用“强制劳役制度”，通过“国家强制权”强制从事劳务。另一方面，他还提到，为了利用女性劳动力需要设立托儿所，等等。

产业动员，是指为了制造和分配兵器等军需品以及必要的民需品，有计划地配置生产设备、物资、资源。

与之相关，永田还主张统一工业产品标准，以便在战争动员时能够统一使用；应该推进生产和流通组织的大规模化，以适应大量军需品生产的需要，等等。在永田看来，产业组织的大规模化和现代化不仅有利于国家总动员，而且还可以提高平时的工业生产力，增强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永田对当时的中学和青年训练所中进行的所谓军事训练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国家总动员准备之一”。

1925年宇垣一成担任陆相（加藤高明组成的护宪三派内阁）时期，陆军进行了裁军，减少4个师团，并引入了配备现役军官进行学校军事训练（初中以上）的制度。翌年，设置了对学校学生以外的一般青少年进行军事训练的青年训练所。与此同时，服役年限分别缩短为一年和一年半。

关于这种“青少年训练”，永田认为，其目的不是“国民总武装”，而是以“不问平时战时，培养具有能够对国家做出充分贡献之精神和体力的人才”为宗旨。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单纯的军事动员，而是为了国家总动员做准备。它是为了不仅给军队，而且“给所有方面输送比以往更加优秀的人才”。另外，由于减轻了军队教育上的负担，陆军也能够缩短服役年限，从而实现了“国民舆论呼吁减轻兵役负担”的要求。所以，永田对实施青少年训练和缩短服役年限持肯定态度，有意推动

这项工作。

另外，永田还主张设置“国防院”，作为平时的国家总动员中央管理事务机构，任用大臣级的人物为院长，下设主管国民动员、产业动员及其他总动员工作的部门，工作人员则分别任命文官和陆海军中胜任的人员。

1927年，在田中义一内阁下，成立了这种国家总动员准备机构，称为内阁资源局。资源局从陆军和海军中给各课抽调工作人员。从第三年起，开始每年制定《国家总动员计划》。不过，这个资源局是为了应对法国通过《总动员法》、意大利制定《国家总动员令》、美国国会提出《国家总动员法》等欧美动向而设置的。

如上所述，永田阐述了有关国家总动员的观点，除此之外，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吸取了什么样的军事教训呢？下面，我们结合国家总体战的问题再看一看。

首先，他说，必须做好思想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争与以往不同，往往是“长期持久”的战争。因此，他说：“仅凭武力决定战争胜负已经变成昔日的梦想，当今战争的胜败越来越有待经济角逐”。他指出，现代战争很可能是长期的持久战，因此，经济力量将很大程度上决定胜败。

正因如此，即使中国、俄国这样当前被认为软弱无能的国家，由于它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如果得到其他国家技术和经济上的“援助”，就能够逐渐发挥出巨

大的“交战能力”。而且，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必须预料到随处都会产生敌人。因而，永田主张，不能像以前那样，局限于各个邻国的情况和假想敌国的观念，而必须预料到“有时会以世界任何强国为敌”，并做好准备。

也就是说，以往日本陆军一直主要以俄国为假想敌，但今后不应该局限于这样的观念。这也暗示了，在存在同盟和合作关系（也包括日本）的前提下，例如，随着国际关系和战局的发展变化，不仅俄国，而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强国也有可能成为敌方。因此，需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准备。不特定假想敌国，反过来说，就意味着合作关系中的行动自由。这一点，与后述宇垣一成的构想相比，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这样，如果设想与世界强国之间发生一场长期的持久战，在永田看来，日本帝国版图内的国防资源极其贫乏，必须在尽可能“靠近帝国领地的地方”确保这种资源。为了确保和供应日本缺乏的资源，永田想到的是包括满蒙在内的中国大陆的资源，但这一点与他对中国的主张有关，因此我们将在后面阐述。

其次，永田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坦克、飞机、大口径远程火炮、毒气等新兵器、新军事技术的出现，“物质的威力”有了飞跃性的增加，适应这种趋势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些新兵器具有极其强大的破坏力。对于这种威力，如果仍然采用以往的兵

器，无论接受过多么充分训练的优秀官兵，也完全无法对抗。因此，必须改进装备，采用新兵器，改变它对应的军事编制，大量配置有力的武器，从而“提升对军队物质威力的利用”。

永田认识到了大战中向兵器机械化和机械战的转变，并认识到国防上必须应对这种趋势。另外，他指出的这些问题包含了对日军传统的肉搏战主义、精神主义的批评。

但是，永田考虑，要实现这种军备机械化和现代化，需要开发、制造它们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力。尤其是为了供应坦克、飞机、各种火炮及其炮弹等大型的军需品，可想而知“需要多大的工业生产力”。所有的工业都可以转变为生产军需品。因此，一般来说，“工业发达与否，在国防上有着重大的关系”。他很重视大量生产机械化兵器和军需物资的必要性。

那么，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日本的现状如何呢？

首先，从飞机、坦克等最新精锐武器保有量来看，据永田称，一战结束时，飞机方面，法国拥有 3200 架，英国拥有 2000 架，德国拥有 2650 架，而日本拥有大约 100 架。日本与欧洲各国的差距是 20 倍至 30 倍。日本航空界整体的现状也处于“与列强相比几乎不值一提的落后”状况，永田说，确实“遗憾至极”。坦克方面，即使在 1932 年初，美国也有 1000 辆，法国 1500 辆，苏联有 500 辆，而日本仅有 40 辆，与欧美相比有着明

显的差距。

关于工业生产力，永田参加的临时军事调查委员小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工业生产力做了比较。根据比较，在钢材需求量上，日本为87万吨，美国为2840万吨（日本的32.6倍），德国为1450万吨（16.7倍），英国为495万吨（5.7倍），法国为404万吨（4.6倍）。永田当然也知道这个数据。

永田由此认识到，与欧美列强相比，日本的工业生产力有着极大的差距。他认为，工业力“贫弱”的现状对发动国家总体战的能力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增强工业生产力，促进科学技术”，努力发展国防上重要的工业生产，尤其是“机械工业”。而且，为此必须通过活跃以“国际分工”为前提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增强工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而“增进国富”。

但是，另一方面，永田认为，在向战时过渡的过程中，必须确立国防资源的“自给自足”体制。尤其对于缺乏天然资源的日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确保日本所短缺的原料资源。生发出重视确保原料资源的观点，是因为据他分析，德国之所以能够坚持长达4年半的战争乃是由于它占领了协约国方面的重要油田、煤田、铁矿产地，确保了这些资源，而且，德国之所以战败，也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所需资源的自给体制。

永田由此认为，关于国防需要的各种资源，国内有

的要努力保护，而国内缺乏的要采取办法对外“确保能够永久或暂时供我使用”。这一点在国防上是一个紧要的问题。而且，从纯国防的角度来看，国防资源的“自给自足是理想”的状态。

永田还认为，平时为了发展工业生产力，必须与欧美和各个邻国进行国际经济和技术交流，因此在外交上永田主张国际合作。这是永田在某一时期之前，一直不反对与采取国际合作路线的政党政治保持合作的宇垣军事政权的原因之一。不过，这是政策上、职务上的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在内心一贯对与长州派联系密切的宇垣保持对抗的态度。

但是，如果预测的战争事态实际发生，就必须采取国家总体战所需物质资源“自给自足”体制，尤其是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日本缺乏的原料资源。这是永田的基本态度。

根据以上的认识，永田的基本主张是：如果今后发生正式的战争，必须“做好举国抗战的思想准备”，这就要求实行“国家总动员”。

2. 批判国际联盟与对华政策

原敬、浜口雄幸等当时有代表性的政党政治家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如果在发达国家之间爆发战

争，将会成为国家总体战，需要发达的工业生产力和庞大的资源。

但是，他们认为，从财政、经济、资源的现状来看，如果爆发下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将会陷入极其困难的状况。因此，他们积极评价主要是为了防止下一次世界大战而创立的国际联盟的防止战争功能，并重视它的作用。尤其是浜口认为，必须通过国际联盟和补充其功能的、有关维持和平的多重多层条约网络（关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的《九国公约》及《华盛顿海军条约》《非战公约》《伦敦海军条约》等），制止近代工业国家之间的战争乃至世界大战，而且也能够制止战争。这些人都站在制止战争的立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们尊重由这些条约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并希望由此稳定东亚和太平洋的国际关系。

对此，永田认为，今后也仍然不能防止近代工业国之间发生战争，因此，下次世界大战也将难以避免。他站在战争不可避免的立场。

首先，一战后实际的欧洲形势，在永田看来，战争的原因仍未消除。德国并不是因为军事上彻底失败，而是为了防止国家灭亡、期待将来重整旗鼓而求和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保存了“国家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实力”，留下了“巨大的仇恨”而迎来和平。德国的“军国主义”“向外发展主义”等是民族固有的，或者是基于新兴国家之境遇的，而且英国、美国的“自

由主义”“和平主义”也完全是他们“基于本国利益的主张和态度”。因此，这些国家将来仍然会不可避免地长期角逐和争斗，欧洲“爆发纷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永田对一战后欧洲形势的看法。

如后所述，永田当时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可以说，他当时已经预料到下一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会从欧洲开始，而其根源乃是德国。

另外，关于国际联盟的有效性，永田也持否定的看法。永田也认识到，国际联盟是一个基于“欧洲大战可怕的灾难”的教训，为了防止战争、维持世界和平而创立的组织。联盟的一个宗旨是，把国际社会从可以说是由“力量”统治的世界改变为由“法律”统治的世界。这一点作为理念，可以说是一个试图改变国际社会的原则，把规范性引入国际关系的一个尝试。永田对联盟的认识是，它是具有这样意义的一种组织。他并不像近卫文麿、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那样，认为联盟是欧美列强统治世界的一个体系。但是，在永田看来，问题在于，联盟所规定的“实行手段”到底能否实现它所标榜的理念。

以往的国际公法、和平条约完全缺乏使之具有权威的制裁手段，即“力量”。与之相比，国际联盟以通过“法治”“维持和平”为基本原则，而且允许拥护法律的人行使“力量”。因此，联盟允许以“协同的力量”作为制裁手段，这一点与以往的国际公法、和平条约等

相比，可以说，是“推进了一步”。

但是，永田认为，尽管如此，这种“力量”并不具有能够以崇高的权威强制加盟各国执行国际联盟决定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是超越国家的“超国家力量”。国际联盟没有“规定国际武力”，并不具有足以让发生纠纷的国家“改变”其主张的权威。因此，国际联盟所能够行使的防止战争的手段在实效性和效果上非常值得怀疑。只能说，这种不具有超国家权威的国际联盟“无法完全保证”世界维持和平。

所以，不仅列国之间发生纠纷的根源并没有通过前次世界大战得以消除，而且，倘若再次发生这样的纠纷时，关于和平解决的手段和方法也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现在的和平不如视为“长期停战”，才是比较有保障的观察。这就是永田下的结论。

永田进一步研究了19世纪以后日、美、英、俄、德、法、意等9个“世界列强”的对外战争，产生了可以称为“战争波动论”的独特认识。这就是，19世纪以后，从整个世界来观察，战争与和平一直是有波动地发生，列强各国的战争间隔时间平均为大约12年，战争持续时间大约为1年零8个月。不论长短如何，他设想战争波动性地发生具有某种周期性和历史规律性。因此，他认为，今后也完全有可能波动性地发生列强之间的战争。

当然，永田并不是积极地想要发动战争，而是站在

喜爱和平、期望实现永远和平的立场。但是，永田认为，即使创建了国际联盟，也不可能实现这个理想，无法阻止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形势下，列国之间再次发生战争以及波动性地发生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永田认识到，“未来的战争将容易引发世界大战，其灾难将会超乎想象”，因此必须竭力避免战争。而且，“胜利者的胜利无论如何比不上付出的牺牲”。尽管如此，由于上述原因，他认为，列国之间再次发生战争和下一次世界大战仍将不可避免。

所以，永田判断，下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正如前面所述，它很大可能起源于德国。这种看法成为在此以后永田构想的基本背景。虽然人们不太了解这一点，却不能轻视。它对后述武藤章、田中新一等统制派军官也产生了影响。

另外，永田认为，如果发生世界大战，那么，日本在列国权益错综复杂的中国大陆有着生死攸关的利益，势必会卷入这场战争。因此，日本也必须做好国家总动员的准备和计划，以备下一次世界大战。

如果发生了需要实行国家总动员的事态，那么，将要求国家实现各种军需资源“自给自足”的体制。但是，在永田看来，帝国版图内的国防资源极其贫乏，处于“重要国防资源无法自给的可悲处境”，因此，必须在本国领土的附近确保必要的资源。永田强烈地意识

到，能够供应日本短缺资源的地方便是包括满蒙在内的中国大陆。

永田研究了日本缺乏的主要军需资源中尤其与中国资源关系密切的部分，并列出了《主要军需短缺资源与中国资源关系一览表》（1929年）。在该一览表中，列出了铁矿石、铁、钢、铅、锡、锌、锑、汞、铝、镁、煤炭、石油、盐、羊毛、牛皮、棉花、马匹共17种重要的军需生产原料，并分别记述了帝国内生产概况，“满蒙”“华北”“华中”各地区可利用的概算量以及各种资源供求情况的“观察”。值得一提的是，这17个品种几乎网罗了当时被认为重要的所有军需资源。

在一览表中，关于铁矿石是这样记述的：日本本土出产7万吨，朝鲜出产35万吨，从中国等国进口一百几十万吨；虽然满蒙产额不大，但蕴藏量颇为丰富，华北有相当大的产量，华中也颇为丰富。因此，作为观察，他认为，“必须从资源丰富且近邻的中国获得这种资源”。

另外，煤炭方面，据他观察，虽然帝国内出产三千几百万吨，但缺乏优质煤。满蒙、华北、华中的产量都相当大，优质煤以华北居多。“战时缺少的部分基本上只靠满蒙和华北便可补充。部分优质煤需要从华中获得”。

这样，他对17个品种都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不足的军需资源几乎都可以从满蒙和华北、华中保障供

应，另外，作为观察，他认为需要从这里获取资源（不过，关于石油没有做出充分的预测）。而且，关于这张一览表，他附加了如下暗示性的说明。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便会感到，鉴于帝国资源的现状，关于官民一致应走的道路，我国对满蒙的态度等，在不言不语之间会给予吾人某种暗示。

也就是说，对于永田来说，考虑中国问题基本上都是立足于保障国防资源，满蒙和华北、华中作为资源的供应地受到重视。尤其是，满蒙事实上是日本特殊权益的集聚地，也是许多重要资源的供应地，作为进入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桥头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20世纪20年代陆军主流的宇垣一成，当时与永田一样，也主张为了应对未来发生的长期国家总体战，必须实现军队的机械化和实行国家总动员。但是，作为基本战略，他的观点是应该以华盛顿体系为前提，完全避免与美英两国发生冲突，而主要考虑与苏联的战争，构筑一个不包括中国本土在内，由日本、朝鲜、满蒙、东西伯利亚组成的自给自足圈。这从资源上来说，仍然不能建立一个严密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体制，短缺的军需物资则设想将来从美英等国进口。因此，关于中国本土，他的想法是，应该与美英合作，谋求发展经济。这是因为，英美两国在中国本土都有强烈的利益关切。另外，他设想，如果将来发生下一次世界

大战，日本理所当然要与美英两国开展合作。

但是，在永田看来，如果这样做，发生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将不能保持国防上“独自的立场”。如果以从美英两国进口军需资源作为前提，那么，将会受其制约，合作关系也失去了选择的余地，只能站在美英一边。如果在合作关系上事先无可选择，那么将无法确保“国防自主权”和决定国防方针的行动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从国防观点来看，便是丧失了决定国策的自主独立性。这一点是永田对宇垣最感觉有隔阂并排斥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先天地拒绝与美英两国合作，而是出于想要确保完全自由地选择敌对和合作关系的目的。这种观点也为以武藤章为首的统制派军官所继承。

与宇垣的态度不同，永田同时考虑到了与美英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因而，设想构建一个包括中国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在内的自给圈。

那么，为了确保能够获取这些中国资源，考虑了什么样的具体方法呢？如果日中关系稳定，双方建立某种合作或者同盟的关系，那么，即使在战时得到必要的资源供应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永田判断，在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和排日态度下，实际上这是难以做到的。

因此，关于这一点，永田认为，应该制定策略，尽可能在平时想方设法确保获取中国的资源。如果迫

不得已，必须采取将中国“强行据为己（日本）有”的方法。也就是说，他设想，需要时通过军事手段等一定的强制力量，确保中国的资源，即构建包括满蒙、华北、华中在内的自给圈。因此，“国防线的延长将会超过由固有领土乃至〔现在的〕政治势力范围算出的长度”。

而且，永田认为，在中国排日的背景下，政党政治采取的英美合作路线将会弱化日本的国防力量。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在满蒙获得的权益，今后将由于美英等国的压力而被削弱。进而，由于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和《海军条约》，日本在中国大陆的行动受到了很大制约，亦将导致与美英相比日本国防力量的下降。这已经激化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外交”产生的排日侮日情绪，加强了张学良领导的奉天军阀的反日态度，并危及在确保日本自给资源上具有桥头堡意义的满蒙的日本既得权益。因此，永田判断，在确保战时军需资源总体自给上，凭借通常的外交谈判方法，日本也将会越来越陷入困境。

可以说，从这里，确保中国大陆资源具体方法的方向自然地呈现了出来。对永田而言，就是满洲事变，还有此后的华北分裂活动（后述）。

这种方向不仅与政党政治的对华政策，而且与宇垣的政治构想都不相同，它有可能与一战后帝国主义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尤其是规定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和门户开

放的《九国公约》发生严峻的紧张冲突。

前面提到的木曜会的“占领满蒙方针”也受到了永田这种构想的强烈影响。不过，东条在木曜会上的发言把准备对俄战争作为占领满蒙的理由。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木曜会的成员容易接受占领满蒙的主张，因为木曜会的成员习惯了以俄国为假想敌的传统观念。关东军方面策划满洲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当时也有占领满蒙，进而通过确保中国本土资源建立自给体制的明确计划，但主要内容都在永田构想的框架之内。

此外，永田对政党政治、宇垣的主要批判，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都在于他们国防上固定不变的美英合作路线（永田这样认为）。而且，对于国内的政治体制问题，永田也反对政党政治的方向，主张“纯正公明而有力的军部”从国家总动员论的观点出发，积极介入政治，即由军部掌控政权。

永田说，为了达到“近代国防的目的”，需要举国一致。这就必须“铲除”政治、经济、社会中的许多缺陷。为此，需要采取“非常的措施”，但仅仅依靠以往的政治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纯正公明而有力的军部”通过适当的方法“督促为政者”，乃是当前不可或缺的大事。

永田的这种构想成为满洲事变以后日本陆军的主导思想。后来，在陆军手册《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

提倡》中，又进一步展开了他的想法。但在任军务局局长期间，永田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派系斗争中惨遭杀害。

下面，包括这种事态的展开在内，我们看一看满洲事变后陆军的行动。

第四章

陆军派系斗争

——皇道派与统制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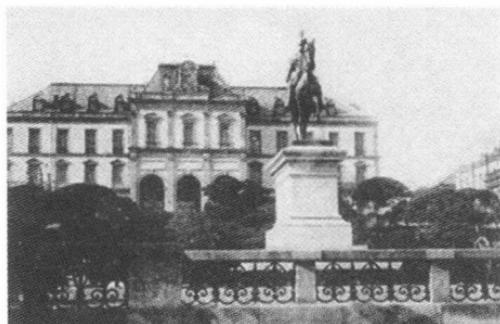


图 10 上为参谋本部，下为陆军省

1. 陆军中央的派系对立

日中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之前的1933年四五月左右，一夕会内部，自巴登巴登相聚之后一直结为盟友的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在政策上的分歧公开化了。以此为机，陆军中央开始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派系斗争。

当时陆军省的核心人物，包括陆军省方面，陆相荒木贞夫、陆军次官柳川平助、军务局局长山冈重厚、军事课课长山下奉文；参谋本部方面，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作战部部长古庄干郎、情报部部长永田铁山、运输通信部部长小畑敏四郎、作战课课长铃木率道等人。一夕会成员几乎占据了负责实务的部局长及以下的全部要职。但是，这个布阵并不意味着单一一夕会派幕僚进入了这些部门。

真崎、柳川是佐贺派，小畑、山冈、山下是土佐派，佐贺和土佐两派原先就有接触。荒木由于与真崎关系密切，因而与佐贺派的人脉有联系。而铃木率道（广岛人）也被视为小畑的嫡系。这样，以真崎、荒木为核心，佐贺和土佐两派占据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大多数主要职位（古庄作战部部长属于基本没有政治性的业务型军事官僚）。此外，还有与佐贺派关系深厚的松浦淳六郎陆军省人事局局长、秦真次宪兵司令官、香椎浩平

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均为福冈人）等。这些人形成了所谓的皇道派。

另外，陆军省军政中枢系统的柳川平助陆军次官、山冈重厚军务局局长、山下奉文军事课课长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就任过军政方面的职务，因而无视业务上的人事惯例。这些也是后来一夕会派幕僚内部和少壮幕僚中产生对皇道派不满的原因之一。

起初，永田为首的一夕会企图与陆军的主流宇垣派相对抗，拥立非宇垣派的荒木、真崎等人掌握陆军的实权，并考虑按照与宇垣派不同的方向，做好国家总体战的准备。然而，荒木就任陆相、真崎就任参谋次长后，真崎、荒木反而利用一夕会内部永田与小畑的个人分歧，一举拉拢了一夕会中的土佐派（小畑、山下、山冈等）和佐贺派（牟田口廉也、土桥勇逸等），把他们推上了实权职位，形成了皇道派。

由此，一夕会产生了裂痕，以永田为首的一夕会主流难以控制真崎、荒木等人，最终，皇道派掌握了领导权。不过，真崎等人也深知，如果一夕会完全分裂，将会削弱自己的根基，因此，此后他们也避免完全疏远永田等人。

另外，在永田的手下，聚集了东条英机、武藤章、富永恭次、池田纯久、影佐祯昭、四方谅二、片仓衷、真田穰一郎、西浦进、堀场一雄、服部卓四郎、永井八津次、辻政信等中坚少壮派的陆军中央幕僚。他们形成

了所谓的统制派。

这样，这个时期的分歧，发展成后来皇道派和与统制派之间正式的派系斗争，而这也影响到了菅波三郎等军队青年将校国家改造团体的活动。

那么，这个时期永田和小畑在政策上的分歧到底是什么呢？

主要是围绕对苏战略的问题。当时，由小畑组织编写的陆军正式文件中有下面这样的记述：

当前日本的对满国策具有崇高的目的和高尚的理想，但不能否认，在“客观本质”上就是“大和民族统治满蒙”。从苏联来看，日本的政治策略就是破坏苏联的远东政策，尤其是日本对北满的经营，因而给苏联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带来极大愤怒。这是事实。

而苏联之所以没有进行反攻，是因为苏联国内的整体实力还不允许。另外，在对外方面，苏联与列国的关系也比较严峻。因此，随着国力不断恢复以及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等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将会抓住良机，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尤其是，由于苏联根据“世界革命”理论制定的远东政策，以及由于其地理和国际因素而向东面的远洋发展的志向，苏联必将对日本采取积极的反抗措施。

也就是说，苏联对日本统治满蒙感到威胁和愤怒，一旦具备本国国力恢复、英美的对日感情恶化等条件，它势必会抓住机会，向日本发动反攻。

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小畑认为，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有必要在具备这样的条件之前，对苏联发动攻击，消灭苏联在远东的军队。而且，他打算在1936年前后对苏开战。也就是说，要在苏联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充实国力之前，打击远东的苏联军队。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1933年开始的。

对此，永田认为，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的数年内，苏联不会完成备战，因此不宜把对苏开战的时间预先设定在1936年前后。也就是说，从苏联国内的情况、工业发展的情况等来看，不应该认为苏联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就会马上具有战争能力。只有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经过几年之后，才会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另外，现在的国际形势对于日本不利，迅速建设“满洲国”才是当务之急。在国内形势方面，政治、经济、社会也存在许多问题，表面上举国一致，但实际上不宜发动“赌国运的大战”。因此，即使下决心发动对苏战争，也应该在“满洲国”的经营取得进展、国内情况得到改善，并协调好国际关系之后开始实施。

这不仅仅是永田的意见，同时也是以永田为首的参谋本部情报部和与永田关系比较接近的幕僚们（统制派）的认识。另一方面，同样地，小畑也与关系密切的

荒木陆相以及与之比较接近的幕僚们（皇道派）持相同见解。小畑与荒木都曾经当过驻俄武官，后来，荒木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时，小畑担任作战课课长辅助他的工作，因此二人关系密切。

在1933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召开的陆军省、参谋本部（简称“省部”）联合首脑会议上，小畑与永田在对苏战略上的意见分歧开始公开化。该省部首脑会议是为了统一陆军意见，在制定今后政府方针的五相会议（斋藤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之前召开的会议。会上，围绕小畑和永田不同的对苏战略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在出席会议的省部幕僚们中，永田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荒木陆相支持关系一直密切的小畑的意见，最终，陆军高层根据小畑的意见，决定了准备对苏战争的方针。

然而，在五相会议上，荒木陆相准备对苏战争的方针及其扩张军备的主张遭到了高桥是清藏相和广田弘毅外相的反对。

小畑与永田有关对苏战略的意见分歧，还影响到了同一时期前后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以及北满铁路^①收购问题的处理。

日苏建立邦交的翌年1926年苏联提议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日苏两国之间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

^① 即中东铁路的长春以北段。

谈判。满洲事变爆发后的1932年，苏联再次向日本提议，之后，斋藤实内阁开始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以永田为首的参谋本部情报部（统制派的武藤章担任直属情报部部长的综合班班长）对签订条约持积极态度，认为“应该立即答应”。但是，陆军内部的主流荒木、真崎、小畑、铃木贞一等对苏强硬派表示反对，最终没有采纳永田等人的意见。

外务省也有人强烈主张应该推动与苏联签约，同时考虑到与苏联疏远的美英两国，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因此得罪荒木贞夫等陆军核心人物。结果，斋藤实内阁一边以改善日苏关系为基本方针，一边由于同样的判断和陆军的压力，而没有推动签订条约。接着，1932年12月，向苏联做出了谢绝签订条约的正式答复，这个问题告一段落。

日苏没有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于陆军后来的对华战略也成为很大的制约因素。这是因为，为了防备苏联，日本需要在苏满边境保持部署相当的兵力，因而，在翌年的热河战役等战斗中无法投入充足的兵力，一直未能保证足够的军事压力，不得不依靠谋略。

另一方面，关于北满铁路问题，1933年4月，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卡拉罕提出了一份正式提案，内容是关于出售苏联管理的中东铁路北满段。日本外务省决定了由“满洲国”收购的基本方针，并开始与陆军交涉。

当时，陆军以小畑（担任参谋本部运输通信部部

长)为中心,荒木陆相、铃木率道(作战课课长)等人提出了如下反对意见:1936年、1937年左右之前,日本将完成占领贝加尔湖周边地区,届时北满铁路自然成为囊中之物,因此,现在没有必要收购;而且,如果收购,会在资金上对正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有利。对此,永田情报部部长的意见是“应该由日本和满洲收购”。

后来,斋藤内阁按照外务省方案的路线,在内阁会议上决定由“满洲国”收购,开始与苏联进行具体的收购谈判。但是,两国在收购价格等方面一直互不让步,直到1935年3月谈判才达成协议,苏联把北满铁路卖给了“满洲国”。

这样,在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北满铁路的收购问题上,永田和小畑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永田赞成,小畑反对。

那么,两者的对华战略是什么样的呢?小畑等人认为,应该促使中国政府转变对日政策,谋求稳定日中经济关系,进而,以让中国设定范围广大的亲日地区为基本方针,利用中国的分裂倾向,促进培养亲日分子,建立亲日分子的组织。这种战略沿袭了陆军以往的方针。如果只是这样,则与后述的永田等人的方针并无多大不同。

但是,与永田等人比较,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小畑等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

他们认为，中国的排外运动，只要没有列国之间的合作，今后将会愈加激烈。尤其是关于满蒙问题的排日运动，在列强（英美两国）承认日本的远东政策之前，不仅不会缓和，而且今后还会愈演愈烈。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呼吁“爱国”是获取民心的一种有效手段，欧洲大战后的世界思潮之一“民族独立意识”在中国民众中也不断深入人心。因此，对日本的抗争意识今后明显会变得越来越强。

因此，解决对华问题，“不是要视日本对中国本土的政策如何，而是要视日本与列强关系的协调如何”。如果没有这种协调，而一味地“急于或者致力于操纵中国本土政权”，这样的行动将不会取得任何效果，即使对中国“行使武力”，最终也只会“消耗国力”。

也就是说，日本要解决对华问题，必须与列强各国协调，否则，即使用武力介入中国本土，也只是消耗国力。

因此，小畑等人的方针是：在对华政策上，对于中国本土，应该与对满政策采取不同的方针，一边与欧美列强合作，一边维持其稳定，主要把它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贸易市场。也就是说，在列强的经济利益错综复杂的中国本土地区，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通商和投资市场，与欧美各国开展合作。因此，在军事和政治策略上，应该采取不介入的姿态。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小畑等人对正式介入中国本土还比较慎重。

对此，永田等人的方针是：让中国政府放弃以往的政策，引导它转向与日本共存共荣的方向；如果抗日排日进一步激化，应该予以坚决排斥和打击。这种方针与陆军以往的政策没有多大不同。

但是，在与对华政策有关的问题上引人注意的是，永田等人认为，如果与苏联发生战争，将不会以简单的“一击”和“消灭远东军队”便可结束战事，而将是一场“赌国运的大战”。也就是说，永田判断，对苏联的战争将是需要实行国家总动员的国家总体战。虽然永田对于小畑等人 1936 年前后对苏开战的意见表示反对，但他自己也认为，可能迟早会发生对苏战争或者世界大战。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1933 年）的 1 月，在欧洲方面，主张打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和重整军备的纳粹党掌控了政权，由此点燃了欧洲纷争的导火索，而这正是永田所担心的。它不久便发展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另外，当时苏联已经结束了十月革命后的混乱状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军需生产方面的工业生产力远远超过十月革命以前，而且正要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另外，从当时驻留满洲、朝鲜的日军与远东苏军的装备状况来看，截至 1933 年，飞机方面，日军为 130 架，苏军为 350 架；坦克方面，日军为 100 辆，苏军为 300 辆。此后，两者的差距迅速扩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永田认为，今后近代工业国家之间的战争有可能成为旷日持久的国家总体战，需要“做好举国抗战的思想准备”，因而必须实行国家总动员。这种国家总动员不仅需要动员生产兵器的全部工业生产力，同时，必须确保短缺的原料资源。因此，他认为，必须在本国领土附近确保必要的资源。

作为这种短缺资源的供应地，他考虑的是包括满蒙在内的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中国问题基本上是从确保国防资源的观点来考虑，尤其是满蒙和华北地区、华中地区，作为这种供应地而受到重视。因此，为了有可能成为“赌国运的大战”的对苏战争或者世界大战，当然需要“做好举国抗战的思想准备”，实行国家总动员。这就不仅需要满蒙地区，而且需要华北和华中地区的资源。

从这些方面来看，与对正式介入中国本土持慎重态度的小畑等人相比，永田等人从确保资源的观点出发，抱有介入中国本土的企图。

此外，永田认为，中国的反日“策动”背后有美国海军力量的支持。即使为了实施对华政策，日本也必须在对美国的海军力量上，“绝对获得国防自主权”。因此，他主张，在以往的条约中，美国的比例一直占优势，“绝对不能接受”。所以，虽然他和小畑等人同样认为中国的反日运动与美英等国的动向有关，但与小畑等人主张在中国问题上与美英等国“协调”相比，可

以说，永田的姿态更加强硬。

不过，由于以前以奉天为据点希望收复失地的张学良手下的国民党原东北军的扰乱活动，当时“满洲国”靠近长城的地区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小畑等人也有时主张军事介入京津等华北地区，以除掉张学良势力。这也是出于想要稳定“满洲国”后方，以便发动对苏战争的考虑。但是，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是短期的，从上述的判断来看，他们基本上对正式介入中国本土仍持慎重的态度。

另外，如果像永田等人那样，从发动长期的国家总体战的观点出发，认为日本需要确保中国本土的资源，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要求日本正式地、积极地对中国本土开展某种形式的工作。实际上，这个时期以永田为首的参谋本部情报部已经渐进而周密地在华北进行政治活动，策划建立反蒋介石、反国民党的政权。

永田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之后，如后述那样，陆军中央便开始实施武力威吓，通过政治活动和谋略，策动华北分裂（将华北变为势力范围）。

那么，与这种对苏、对华政策问题相关，两者在对美英政策方面有何异同呢？

首先，在对美政策方面，永田等人认为，必须排斥美国通过经济力量对远东实行的控制。但是，海军担心，如果日本废除《伦敦海军条约》，将会“爆发日美战争”。而永田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如果废除条

约，即使美国的对日感情会极度恶化，美国也不至于决心对日开战。因此，日美之间的问题可以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也就是说，在永田看来，美国在亚洲没有生死攸关的利益，日本与美国之间可能会有不可妥协的对立，但是，日美间的问题可以政治解决。这种对美国的认识也为武藤章等永田嫡系的统制派幕僚所继承。

这个时期被称为“1936年前后的国际危机”。1936年前后，《伦敦海军条约》和《华盛顿海军条约》这两个海军裁军条约面临修订，而日本海军已经在主张日美必战的以加藤宽治为首的舰队派主导下，决定废除这两个条约。另外，同一时期，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开始生效。随着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生效，不仅要考虑帕劳、塞班等南洋群岛托管地的收回问题，还要考虑国际联盟和美国的对日制裁措施，所以，日本开始谈论日美战争的可能性。

虽然小畑等人也主张，如果美国干涉日本的大陆政策，应该坚决排斥，但他们的基本方针是“谋求两国友好邦交”。

在这些方面，两者在对美政策上，不论细节如何，其基本方针可以说没有多大不同。

其次是对英政策。两者都想当前利用英国的野心及其国际处境，努力让其置于纠纷之外。总之，可以说，两者在对美英问题上，都基本上按照政治解决的原则，而且设想这是可能的。

以上就是 1933 年前后小畑等皇道派与永田等统制派在政策上的分歧。

2. 军队青年将校与陆军手册

除了在陆军中央发生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之外，这一时期在分配到各部队的军队青年军官之间也形成了旨在改造国家的政治团体。这种团体与一夕会等中坚幕僚层的行动是分开的，最早形成于满洲事变前后。它的核心成员有菅波三郎、大岸赖好、末松太平、大藏荣一、村中孝次、安藤辉三、矶部浅一、栗原安秀、香田清贞等人。

这些人在满洲事变前的 1931 年 8 月，举行了名为“乡诗会”的聚会，此后，以思想家北一辉的弟子西田税（原陆军少尉）为核心，正式开始活动。它与同年的十月事件也有部分关系。所谓乡诗会，是旨在改造国家的陆海军将校团体与民间团体联合组织的一个聚会，在东京青山的日本青年馆举行。陆军方面，有菅波、大岸等人；海军方面，有藤井齐、三上卓等人；民间方面，有西田、井上日召、橘孝三郎等人，会上商定互相合作。当时的成员在翌年发动了血盟团事件（接连暗杀原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财阀的最高领导团琢磨）、五一五事件（暗杀犬养毅首相）。

五一五事件后的同年11月，在位于东京九段的偕行社举行了由土桥勇逸、武藤章、池田纯久、片仓衷等陆军中央的一夕会派中坚幕僚与村中、大藏、矶部等军队青年将校团体成员参加的聚会。

会上，陆军中央的幕僚主张：“军政掌握者以外的人员绝对不应该干预政治工作”。对此，军队军官反驳说：“陆军中央打算镇压我们的运动吗？”中央的幕僚回答：“是的。”聚会最终不欢而散。

菅波、村中、安藤等军队将校组成的国家改造团体常常也被称为皇道派青年将校。但是，它成立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本来与荒木、真崎、小畑等陆军中央的皇道派有所不同。它似乎与皇道派有密切的关系，但作为集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组织。

永田对于这个军队青年将校的改造国家团体，抱有这样的想法：

近年来，军队青年将校国家改造运动有相当的扩大，它扰乱了军队的秩序，给军部的国家改革造成了困难。虽然不能否认他们改造国家的目标，但这种横向结合的活动，在军纪上绝不能容许。但是，如果按照军纪军规，对之进行强行处理，会迫使他们的秘密活动过激化。为了处理这种事态，陆军高层必须制定国家改革的具体方案，通过合法的手段领导政府，实现国家改造。另外，需要在军内

设置制定具体方案的研究机构。

这样，永田对于军队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采取了不能容许的态度，认为它扰乱军队秩序，反而妨碍了军队改造国家。

永田在就任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的1930年8月之前大约两年半时间，曾经担任步兵第三联队队长，与属于该联队的安藤辉三、菅波三郎等人互相认识。而且，这个时候，对安藤、菅波等人怀有好感。但是，五一五事件前后，他开始怀疑他们参与了各种恐怖行动以及与皇道派有关的政变计划，而且从保持军队秩序的观点出发，对他们的横向活动也持否定态度。从五一五事件前后开始，永田多次对军队青年将校组成的国家改造团体的行动采取阻止的态度，而军队青年将校国家改造团体对以永田为首的统制派的感情也逐渐恶化。

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的1933年8月，永田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调任第一师团步兵第一旅团长。翌年3月，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

这一年的1月，荒木陆相称病辞职，时任教育总监的林銑十郎成为陆相。林銑十郎对荒木、真崎的做法心怀不满，同时永田派中坚少壮幕僚对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因而，他把与这二人保持距离的永田任命为军务局局长。另外，教育总监则由从参谋次长退任后担任军事参议官的真崎甚三郎就任。

7月初，斋藤实内阁因所谓的“帝人事件”（围绕帝国人绢所持股票的买卖发生的政界丑闻）宣布总辞职，接着海军出身的冈田启介组阁。但林銑十郎仍然留任陆相。

10月，广为人知的陆军手册《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正式出版发行。它是由永田军务局局长指示，统制派成员、陆军省军事课课员池田纯久等人在矢次一夫、大藏公望等国策研究会成员的协助下拟定草案后，经永田审查和批准之后发表的。而且，永田对部下起草的重要文件都要亲自进行彻底修改。据推测，包括他担任军事课课长、情报部部长的时期在内，永田管辖的部、局的文件，只要是经过永田批准的内容，也都是他自己的意见。

手册的内容是，主张朝着“综合统制国家的全部力量”的方向，强化国防国策，具体就是扩充军备、实施经济统制、确保资源等。这些可以说是以往永田观点的延伸。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永田的观点相比，可以看到一个变化。那就是，他的主张从“国家总动员国防观”已经向“近代国防观”转变。

前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应对国家总体战的要求，为了实现战时人力、物力资源的国家总动员，必须在平时做好准备和计划。这种想法与以往永田的构想几乎一样。

但是，这本手册认识到，由于近年来国际联盟暴露出它的“软弱无力”，已经形成“阵营对立”的状况，因此世界已经进入“国际争霸战时代”。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平时的生存竞争”，正在转向日常的“经济战”。“国际生存竞争”处于白热化状态。如果在“平时状态”不“统制国家的全部力量”，将成为“国际竞争本身的落伍者”。从这种认识出发，后者（“近代国防观”）认为，平时也需要“统制国家的全部力量”，也就是实行一种国家总动员性质的国家统制。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统制的逻辑不仅要在战时贯彻，而且要贯彻到平时，“国防”的观念也包括国家“平时的生存竞争这种战争”，要求不论战时、平时，都作为一个制度性的工作。这是不可轻视的一点。

如前所述，永田曾经认为，为了国家总动员而实行的国家统制是为了战时而做的一项工作，平时需要为此而做准备和计划。但是，这个时候，却要求不仅战时，而且在平时也对国家全部力量实施统制，亦即通过国家统制实施国家总动员。

这个主张就是，不仅战时，平时也实行国家统制。这是该文件的一个特点所在。可以说，其背后反映了经过满洲事变、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等一系列事件，在国际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政治发言权不断增大的永田等陆军核心人物实行国家统制的意志。

作为日常“经济战”的具体内容，例如，它认识

到，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日本的贸易受到欧美列强的压迫，有可能被赶出中国等市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行“经济和贸易统制”，进而谋求确保中国市场和获得新市场，另外，不能放松“应对经济封锁的各种准备”。因此，这种“非常时局”仅凭“强调合作的外交活动”将无法解决，有时需要准备“诉诸武力，作为破邪显正的手段”。

另外，这个文件关于对美、对华政策以及相关问題，提出了如下有趣的见解。

在将于来年举行的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日本绝对需要获得“国防自主权”，绝不能同意像以往那样被强制接受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海军力量的消长”不仅关系到对美关系，而且事关对华政策的成败。美国企图保持对日本占有绝对优势的海军，是为了坚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即“门户开放主义”。而中国也借助美国的力量，经常采取排日政策。据说，中国国内的英美派企图“夺回满洲”，正在策划削弱日本在东亚的政治地位。

因此，这种“策动”的消长取决于日本海军力量是否会被美国海军力量压倒。所以，日本的主张在此次海军裁军会议上能否得到实现，将成为决定今后中国对日动向的一个指针。

也就是说，海军裁军与日本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即使从压制以美国海军力量为背景的中国排日运动的观点来看，在修订裁军条约时，也不能认可像以往那样按照美国占优势的比例签订条约。因此，文件主张采取强硬姿态，不惜谈判破裂。

永田早已认为，中国的“排日侮日”是由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引起的，而其背景就是美英通过海军裁军等有意压制日本。基于同样的观点，他也认为，为了压制中国的排日运动，需要拥有能够对抗美国的强大海军力量。因此，对抗美国海军力量，并不是出于对美战争的现实可能性，而是着眼于对华强硬姿态，即压制中国的排日运动。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永田等人判断，目前与美国之间的问题不至于发展到战争，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永田等人看来，日本与奉行“革命外交”、实行排日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关系不可协调。因此，他们考虑，通过建立一个取代它的亲日政权——能够接受日本确保资源、市场的要求，从而实现“日中提携”的目标。

至于对苏政策，从苏联的“挑衅态度和习惯性的不守信用”来看，不知道何时会发生需要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的事态。为了防备苏联，扩充陆军军备和空军是当务之急。不过，对于对苏战争，他们持慎重态度，认为“应当极力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态。

此外，作为增强国防国策的一环，这个文件提出了如下主张：解决农村负担过重、佃耕等问题，实施“匡救农山渔村”；改变目前“贫富不均”“贫困”“失业”等日趋严重的经济结构，实现“国民大众生活稳定”；等等。这些成为当时日本最大的无产政党——社会大众党总书记麻生久及其同仁龟井贯一郎（社会大众党国际部部长）等人高度评价这个文件的原因之一。

以菅波为首的军队青年将校国家改造团体，由于这部分的内容，也积极评价这本手册，并且开始活动，要求必须以此教育下士官兵，开展全国性活动。但是，永田表示不容许这类活动，坚决反对他们独自横向活动。此外，真崎对这份文件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认为手册是“国家社会主义思想”。

上述手册的主张也影响到了国内政治体制的问题。即使从平时“综合统制”“国家全部力量”的观点来看，也需要军部积极介入政治、由军部掌控政权。

另外，永田等人为了落实手册的内容，以陆军的要求为名，提议冈田内阁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综合制定根本国策的机构。最终，内阁成立了内阁审议会和内阁调查局，后者作为负责前者的调查和实际业务的一个组织。这个内阁调查局以统制经济主义作为其基本方针，后来成为赞同陆军国家统制论的新官僚的据点。

永田等人考虑的政治介入方式是：在陆军省内设立一个负责综合审议军事以至全面国策的机构，由这个机

构起草具体的政策，然后通过（包括恫吓）陆军大臣，迫使内阁执行他们的政策。他们希望，内阁审议会和内阁调查局成为接受陆军政策的机构。

进而，如前所述，永田等人认为军备机械化和扩充空军战力是当务之急，因而强化了大幅度增加军费和增发公债的要求。

3. 派系斗争的激化与暗杀永田铁山

1935年，天皇机关论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同年2月，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天皇机关说在贵族院遭到大肆指责，3月众议院也全场一致通过了反对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决议。以右翼、国家主义团体和在乡军人会为核心，开展了国体明征运动。4月，真崎甚三郎陆军教育总监向全军通报了“天皇机关说违反国体”的训词。国体明征运动认为冈田内阁支持天皇机关论，因而开始向推翻冈田内阁的方向发展。冈田内阁迫于运动的压力，于8月3日发表了反对天皇机关论的第一次“国体明征声明”。

这一次国体明征运动的背景中，有陆军中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派系斗争。

在此之前的1933年6月，真崎甚三郎晋级为陆军大将，同时从参谋次长（中将职位）一职退任，成为

军事参议官。植田谦吉（参谋本部直属原第九师团长）就任参谋次长。

虽然植田就任参谋次长是闲院宫参谋总长直接提出的意见，但其背后，有宇垣派的南次郎、金谷范三、铃木庄六等的活动。同年1月，南次郎与金谷范三等入商量后，向闲院宫提议排除希望留任的真崎甚三郎，任命植田为下一任参谋次长。2月，闲院宫也按照南次郎等人的要求，决定由植田就任参谋次长。实际上，南次郎、铃木庄六、植田谦吉、闲院宫，还有辅佐闲院宫、担任“别当”一职的稻垣三郎等人全部是骑兵出身，在这个系统彼此都有联系。因此，南次郎等人的工作奏效，成功地把真崎赶出了参谋本部。植田不是政治色彩很强的人物，但是通过骑兵系统，与南次郎等宇垣派有一定的联系。另外，在真崎从参谋次长退任的最大原因——晋升大将这一点上，南次郎等人对闲院宫做了工作，后者的意见也起了作用。

这样，真崎等三位将军把持陆军三个首长职位的局面便发生了变化，缺了真崎这一角，而变成了荒木贞夫担任陆相、林銑十郎担任教育总监。

1934年1月，荒木陆相以患流感为由提出辞职。荒木贞夫在斋藤实内阁中，在对苏政策、预算要求等方面备受高桥是清藏相等实力派阁僚的压制，而且逐渐失去了陆军中央幕僚层的支持，这是他辞职的背景。后任陆相由林銑十郎教育总监就任，真崎取代林銑十郎成为教

图 11
真崎甚三郎



育总监。

对于林铕十郎就任陆相，闲院宫参谋总长的意见占有不小的比重，其背后则有南次郎等人的活动。南次郎等人注意到了林铕十郎被荒木、真崎疏远的迹象，企图利用这一点接近林铕十郎。

林铕十郎就任陆相后，3月便将永田铁山由第一步兵旅团长调任为军务局局长。早在就任陆相之前，林铕十郎就曾经透露出“永田少将可以担任将来的军务局局长”的意见，所以这个任命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当然，其背后也有东条英机等永田派幕僚的推波助澜。

但是，4月，林铕十郎由于弟弟贪污并被求刑而提交了辞呈。有人试图乘此机会让荒木或真崎就任陆相，而永田对一些重臣和内阁做工作，竭力让林铕十郎留任。

永田一边与植田参谋次长合作，一边向元老西园寺的亲信原田熊雄、斋藤实首相、冈田启介前海军大臣等稳健派重臣做工作，并推动闲院宫参谋总长，最终，林铕十郎留任陆相。南次郎也希望林铕十郎留任。真崎也认为，林铕十郎留任比宇垣派的阿部或者南次郎就任陆相更加有利。

此后，在8月的人事调动中，林铕十郎陆相更换了皇道派的柳川平助陆军次官、秦真次宪兵司令官、山下奉文军事课课长，任命业务型的桥本虎之助担任陆军次官，参谋次长则由杉山元担任——虽然此人是宇垣派，

但是政治色彩不浓。这个时候的人事方案都是以永田军务局局长为核心拟定的。但是，真崎对他的方案做了修改，因此，从永田等人来看，结果不够彻底。不过，秦真次、柳川平助是真崎嫡系的皇道派最重要的成员，永田和东条在林銑十郎就任陆相后便开始主张更换他们，实现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当时，南次郎也对林銑十郎做了各种工作，以削弱皇道派的势力。

1935年3月，林銑十郎和永田等人调出了皇道派的松浦淳六郎，任命业务型的今井清就任人事局局长。同一时期，冈村宁次被任命为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而皇道派的小畑敏四郎从陆军大学干事升为陆军大学校长，依然不在陆军中央的要职上。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桥本次官、今井人事局局长是业务型幕僚，但对皇道派、宇垣和南次郎派统治陆军都有批判情绪。

这个时候，统制派以担任军务局局长的永田为核心，企图通过操纵林銑十郎陆相与以真崎为首的皇道派相对抗，确保他们在陆军中的权力。虽然林銑十郎来自石川县，但由于与真崎个人关系密切，而成为一夕会推戴的三将军之一，最终登上了陆相的宝座，而实际并不拥有自己的势力基础。因此，他要与真崎保持距离，就不得不依靠与之对立的永田等人。另外，他在人事安排上，也受到永田为首的统制派有力的影响。

然而，虽然永田等人以非皇道派一夕会团体为背景，在陆军中央的中坚幕僚层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

是，即使职位最高的永田也只是局长级别。因此，对于林銑十郎陆相来说，为了对抗身居陆军要职的真崎教育总监等皇道派，需要获得陆军三首长之一闲院宫参谋总长的支持，不得不接受其背后的南次郎等人的主张。因此，他后来暂且接受了南次郎起用小矶等人的方案。不过，由于以往的关系，林銑十郎对与真崎完全决裂一直犹豫不决，因而采取了派系中立的姿态：把统制派的东条英机安排到久留米，使其远离中央；把南次郎一派的小野寺长治郎陆军主计总监变为预备役，等等。但是，陆军的人事仍然以永田等统制派为轴心。

同样，永田也认为，为了与以真崎为首的皇道派对抗，不仅需要与林銑十郎合作，而且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南次郎等人合作。因此，如后所述，他提议起用南次郎推荐的建川次郎。然而，永田本来持反宇垣的态度，一直警惕南次郎背后的宇垣的举动，主张“绝对不让宇垣进入政界”，“宇垣大将最好还是早点回朝鲜”（当时，宇垣为朝鲜总督）。因此，他考虑不能让南次郎、阿部等宇垣和南次郎一派的核心人物重新进入陆军高层。林銑十郎也持同样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陆军中有影响的政治团体主要包括统制派（永田为首）、皇道派（真崎为首）、宇垣和南次郎派（南次郎为首）这三个派系，他们相互争夺陆军的实权。其他的业务型军官没有组成横向的团体，只能行使各自职位固有的权限，除非与这三个派

系合作（哪怕是临时的），才能拥有政治发言权。所谓的业务型，虽然类型不同，但是林銑十郎也同样属于这一类。

在这段时间，林銑十郎陆相的人事调动方案常常遭到真崎教育总监的修改，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人事构想。因此，他决心在8月的陆军定期人事调动上罢免真崎，把皇道派从要职上全部排除。当然，在它的背后，有永田的强硬意见。

真崎早已看出，林銑十郎是永田的“傀儡”，“永田是陆军各种阴谋的核心”，认为“他〔永田〕是各种策动的根源”，一直对永田保持警惕。

永田的意见是，要肃清皇道派的实权人物，包括更换真崎教育总监或者将其编入预备役，同时将秦真次第二师团长和香椎浩平第六师团长编入预备役；更换山冈重厚陆军省整備局局长、小藤惠补任课课长（土佐人）、牟田口廉也参谋本部庶务课课长（佐贺人）、铃木率道作战课课长；等等。另外，任命南次郎一派的建川美次为参谋次长，任命永田的心腹东条英机为整備局局长，同时调出小畑陆军大学校长，让尽管是南次郎一派但属于业务型的梅津美治郎接任。进而，他主张起用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工藤义雄、松村正员、小笠原数夫、饭田贞固、渡久雄等接近永田的非皇道派一夕会成员。永田直接向林銑十郎表达了这个意见。

另一方面，南次郎向林銑十郎提出了如下建议：将秦真次编入预备役，同时起用自己一派的建川美次为参谋次长，起用小矶国昭为航空本部长。

7月10日，林銑十郎陆相与桥本陆军次官、今井人事局局长、永田军务局局长一起汇总了将级人事方案，征求真崎的意见。方案的主要部分是：要求真崎教育总监主动辞职，担任军事参议官，此外，将秦真次第二师团长编入预备役，起用小矶为航空本部长。

真崎拒绝了这个方案。

12日、15日，林銑十郎陆相、闲院宫参谋总长、真崎教育总监召开了三长官会议。会上，林銑十郎以陆军内部大部分人认为真崎是“党阀的首脑”为由，逼迫其辞职。15日，闲院宫也劝真崎主动辞职。但真崎均予以拒绝。于是，林銑十郎陆相单独上奏更换真崎，当天便罢免了真崎的教育总监职务，任命其为军事参议官，同时任命与他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的渡边錠太郎为教育总监。渡边是一位政治色彩淡薄的武夫型军人，博识而刚直，当时任军事参议官，但对真崎为首的皇道派持批判态度。

17日，包括真崎、渡边在内，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会上，荒木主张不应当罢免真崎，进而指责林銑十郎背后的永田参与了三月事件。真崎以此为辅垫，抛出所谓的永田政变计划书，以此发难。但是，在渡边的支持下，林銑十郎在会议上摆脱了困境。当天渡边支持

林銑十郎的举动，成为渡边后来在二二六事件中遭到袭击的一个原因。

此后，在8月1日的定期人事调动中，将秦真次编入了预备役，并更换了小藤惠补任课课长、铃木率道作战课课长等人。当时，来自佐贺的、被视为皇道派的土桥勇逸军事课高级课员也被更换，由统制派的武藤章接任他的职位。众所周知，在二二六事件后包括开除皇道派和宇垣派高官在内的肃军人事以及广田弘毅内阁组阁时，武藤章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起用小矶为航空本部长则暂缓实施，宇垣和南次郎派没有能够恢复在陆军中央中的要职。南次郎本人在前一年12月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离开了陆军中央。

林銑十郎陆相罢免真崎一事，立刻由各种匿名信传播开来，变得人人皆知。这些匿名信认为，罢免真崎的幕后人物是永田军务局局长。8月12日，对此愤愤不平的相泽三郎中佐（属于台湾步兵第一联队）在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办公室刺杀了永田。相泽与大岸、末松等国家改造派军队青年将校交往密切，另外，他与真崎也有私交。而且，永田早已被皇道派和国家改造派军队青年将校视为一系列压迫皇道派事件的核心人物。相泽与他们持同样的看法。

刚才已经提到，永田为了对抗政党政治，从国家总动员的观点出发，主张军部积极介入政治、军部控制政权。

永田认为，军部控制政权首先需要“确立军队的统制和团结”，并需要明确“陆军中央的维新决心”，“渐进而且合法地”实行“维新”。但是，军队青年将校的“横向结党行为”“不合法的革新思想”阻碍了军队的统制工作。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决心从陆军中央肃清真崎为首的皇道派，因为他们与军队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永田一直反对军队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另外，他严厉批评这些人是“北一辉、西田税一派所谓职业革命家的掌中之物”。

这个时期，永田依靠非皇道派一夕会势力，在林銑十郎陆相的支持下，事实上掌握了陆军省的实权，对参谋本部的中坚幕僚层也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皇道派和国家改造派幕僚也认识到这一点，把他视为他们敌对势力的核心。可以说，这是接近事实的。在这个意义上，相泽的判断没有什么错误，失去永田让陆军中枢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以永田为首的统制派与菅波等人的国家改造派军队幕僚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险恶的状态，而在1934年11月的所谓士官学校事件中，两者变得势不两立。士官学校事件，是以国家改造派军队青年将校的核心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正在策划政变为由，把他们与士官学校的学生一起逮捕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属于统制派的士官学校中队长辻政信、参谋本部成员片仓衷对揭发一事发挥了主导作用。

事件发生后，村中、矶部遭到停职，但两人以事件纯属捏造为由，以诬告罪对辻政信、片仓衷提起诉讼。翌年7月，他们发表批判永田等统制派的《关于肃军的意见书》，8月被免职。由此，国家改造派军队青年将校对永田等统制派更加怒不可遏，而恰好此时，与他们联系密切的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被永田等人罢免，于是，他们便瞄准了被视为统制派核心人物的永田铁山。

这个时期，菅波、大岸为首的军队青年将校团体已经与真崎为首的皇道派开始合作。两派在对华政策等方面基本一致，但是，菅波、大岸等人由于受到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影响，纳入了土地改革、所有权限制等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这种国家社会主义是真崎为首的皇道派所厌恶的。虽然两派有这种政策上的差异，但在与统制派和宇垣派的对抗上，相互都需要开展政治上的合作。

刚才说到的国体明征运动，对于被罢免教育总监职务的真崎来说，是企图通过倒阁，让林銑十郎陆相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永田等统制派下台，从而一举达到在势力上反败为胜的目的。但是，经过真崎被解除教育总监的职务、永田被暗杀，继而10月15日冈田内阁发表第二次“国体明征声明”，在陆军中央的压力下，运动势头急速减弱，不久便告平息。真崎的尝试归于失败。

第五章

二二六事件前后的陆军

与围绕大陆政策的斗争

——石原莞尔担任战争指导课课长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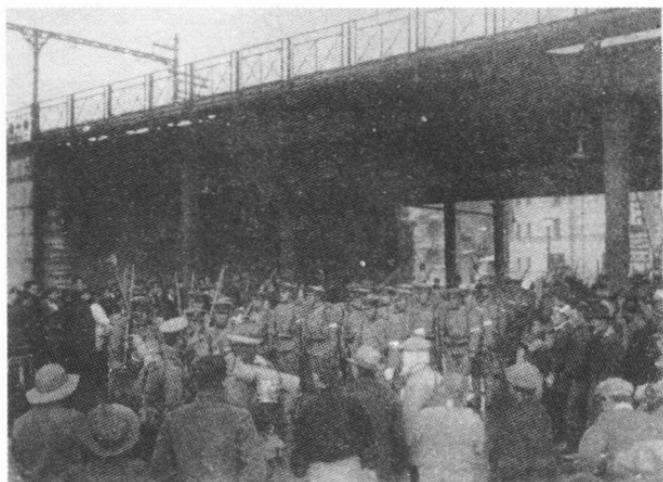


图 12 二二六事件。从地方进京的镇压部队（读卖新闻社供图）

1. 华北分裂活动与二二六事件

1933年5月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以后，在斋藤实内阁、冈田启介内閣下，日中关系一直比较稳定。由于国际联盟和美国没有对日本采取具体的制裁行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也开始改变方针，采取对日和解的路线。

然而，到1935年，在中国驻屯军^①（天津）、关东军的主导下，日军开始了企图把华北地区变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所谓华北分裂活动。同年5月，在天津日本租界发生了亲日派报社社长被暗杀的事件以及日中两军之间的小规模战斗。虽然当时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但当地的日军以此为由，向中方要求国民党各机构撤出华北东北部。6月，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日军把国民党势力赶出了华北东北部的河北省、察哈尔省。

谈判期间（6月初），正在当地视察的永田军务局局长给本国的桥本虎之助陆军次官发电称，“箭已离弦”，陆军中央也应该给予支持。另外，同一时期，永田批准把一部分关东军集中到满洲西部的锦州附近等地，对中方施加军事压力。与永田关系密切的矶谷廉介驻华大使馆武官也在同一时期表示，即使行使“一定的

^① 日语称“支那驻屯軍”，此处按中方惯称翻译。

武力”，也应该“整肃华北”。值得一提的是，“何梅协定”规定国民党势力撤出河北省，而它的草案乃是在永田军务局局长的指挥下，由片仓衷（属于军务局）起草的。

此前热河战役的时候，永田就同意板垣等人在长城以南的天津等地开展建立亲日“满”政权的谋略活动，他早就主张“凡是不符合日本根本要求的主义和党派，唯有〔从华北〕铲除”。而且，他认为国民党的“革命外交”本质上是排日的。另外，对于此后冈田内阁时期广田弘毅外相采取对华绥靖政策（“和睦外交”），他也持反对态度，认为“大张旗鼓宣传的日中亲善之类，可视为风马牛不相及。事宜进时，则进”。

进而，同年8月6日，桥本陆军次官向关东军、驻屯军等发出了《对北支那政策》的通知。通知内容包括：将河北省、察哈尔省、山东省、山西省、绥远省“华北五省”变为不受“南京政权政令”影响的“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消除华北地区的“一切反满抗日策动”，日“满”两国之间实现“经济文化融合和合作”；等等。

这个通知指示实现华北五省“自治”，让其脱离南京政府。也就是说，它指示了分裂华北的活动。其目的在于，稳定“满洲国”的后方，同时形成由日本、满洲、华北组成的经济圈，获得华北五省的资源和市场，将其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份《对北支那政策》和陆军次官发出的通知文件，现存的资料称为《关于对北支那政策事宜》。这份资料显示，这两个文件由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起草，并由林銑十郎陆军大臣批准，主管课员为武藤章、片仓衷。作为主管局长，这些文件也经过了永田铁山盖章批准。当时，武藤、片仓二人都属于统制派，受到永田的强烈影响。因此，文件的内容应该也代表永田的想法，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永田构想——确保资源和市场，准备国家总体战和国际经济战争——的延伸。[这份指示分裂华北活动的《对北支那政策》的起草人是武藤章（当时任军事课高级课员），这成为后述日中战争初期石原与武藤发生分歧的伏笔。]

另外，以永田为首的军务局不久设立了国策公司“兴中公司”，企图通过它推进华北的经济开发。此外，永田的盟友、当时担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的冈村宁次当时也认为，“不应该让中国统一”。有些人认为当时永田等陆军中央反对分裂华北活动，这是不准确的。

不过，当时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企图在华北建立“自治”的“独立政权”，企图直接实现极具侵略性的政策。因此，《对北支那政策》中表明的永田等人的分裂华北方针——形成“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虽然方向相同，但相对而言更为慎重和渐进。这也许是它照顾到了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始分裂华北活动之前的同年3

月，纳粹德国宣布重整军备，背弃《凡尔赛和约》，着手急剧扩张军备，由此导致了欧洲凡尔赛体系破裂，德国周边的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欧洲动荡的形势让人觉得时刻有可能发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那样的军事纠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不是单纯的未来假设，而是越来越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永田当然也看到了这样的国际形势。永田等陆军中央在这个时候开始分裂华北活动，也许与这种欧洲形势不无关系。正如前述那样，永田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起于德国，从欧洲开始爆发。由于德国背弃《凡尔赛和约》和正式重整军备，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考虑到不久的将来发生大战的可能性，永田开始意识到，为了应对将来的国家总体战，确保资源已经成为现实的要求。

永田考虑，为了将来的国家总体战，不仅需要满蒙，而且还需要华北、华中的资源。因此，继满蒙之后，把华北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已经成为下一个课题。这是因为，从国民政府的排日姿态来看，他认为依靠通常的办法不可能确保稳定的资源。但是，在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以后，出于国际形势的考虑，永田对把华北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然而，随着德国宣布再整军备，下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可以说，永田已经开始将其作为一种现实的要求来

考虑确保资源的必要性。

实际上，四年后，德国便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另外，同年7月，永田强烈主张更换真崎教育总监，让林銑十郎强行罢免真崎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欧洲形势越来越紧迫。同年3月之前，柳川平助（陆军次官）、山冈重厚（军务局局长）、山下奉文（军事课课长）、松浦淳六郎（人事局局长）、秦真次（宪兵司令官）等皇道派的主要成员已经被调离重要职位。陆军中央中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胜负已定，仅从派系斗争上来看，并不需要那么急于强行处理真崎，因为他们也可以采取逐渐孤立真崎、事实上让他失去势力的方法。

然而，我们可以推测，纳粹德国宣布重整军备后，欧洲形势变得紧迫起来，这样的形势使得永田急于建立陆军的内部统制，以构建国家总动员体制。但是，《对北支那政策》通知发出大约一周后的8月12日，永田便在陆军省办公时惨遭杀害。

此后，日本开始正式推动华北分裂活动。11月，在河北省东部建立了亲日的“冀东防共委员会”（委员长：殷汝耕），次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了所谓的“冀东政权”。这样，在华北的一部分地区诞生了事实上处于日本操纵下的“独立政权”。另外，同年12月，日方提出要求后，与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成

立了跨河北省和察哈尔两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作为日中之间的缓冲地带。

接着，1936年1月，冈田启介内阁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企图让整个华北五省实现自治的《第一次北支处理要纲》。但是，由于南京中央政府的抵抗以及没有获得中方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合作等原因，进一步分裂华北的华北“自治”活动没有能够轻易推进。

另一方面，在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局长时期，陆军中有势力的政治团体包括以永田为首的统制派、以真崎为首的皇道派、以南次郎为首的宇垣派三大派系。永田铁山遭到暗杀后，皇道派基本上被赶出了陆军中央，宇垣派也没有能够在陆军中央东山再起。虽然统制派失去永田铁山，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在中坚幕僚中，还有武藤章、影佐祯昭、池田纯久、片仓衷、真田穰一郎等有影响力的成员。另外，冈村宁次（当时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矶谷廉介（翌年任军务局局长）、渡久雄（翌年任情报部部长）等非皇道派一夕会成员，虽然未必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活动，但是却与宇垣派、皇道派保持距离，相对接近统制派。

永田铁山被暗杀的翌年，1936年冬天，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安藤辉三、栗原安秀等军队青年将校国家改造团体的一部分成员率领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的大约1500名士兵发动了武装暴动，企图通过政变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他们杀害了内务大臣

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但是，最终政变失败，军队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就此覆灭。与他们联系密切的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柳川平助、小畑敏四郎等皇道派也被编入预备役，事实上被赶出了陆军。另外，南次郎、阿部信行、建川美次等宇垣派也同时变成了预备役，具有政治色彩和影响力的高级将官几乎全部离开了现役职务。

二二六事件后成立广田弘毅内阁时，陆军的最高领导包括寺内寿一陆相、闲院宫参谋总长、杉山元教育总监。这三人政治色彩淡薄。这种人事安排明显反映了中坚幕僚层的意向。另外，二二六事件以后，陆军的政治发言权迅速扩大。

在这样的陆军政治状况下，陆军省的军事课高级课员武藤章、参谋本部的作战课课长石原莞尔开始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二人都是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局长时分别安排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但石原到任是在永田被暗杀的当日）。

武藤章是永田嫡系的统制派核心成员，二二六事件后，推动有末精三等军事课员迫使荒木、真崎、林、阿部等老军事参议官辞职，并达到了目的。另外，他还与石原莞尔一起参与了把寺内寿一推为陆相的活动。广田弘毅内阁成立时，他与陆相候选人寺内寿一一起介入了组阁工作，在陆军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陆军

省军务局局长矶谷廉介、军事课课长町尻量基都是非皇道派一夕会成员，赞同武藤章等人的行动。此外，永田铁山的心腹东条英机此时赴满洲就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

虽然石原不是统制派成员，但他是非皇道派一夕会成员，在陆军内部作为主导满洲事变的人物而拥有很高声望，并且，在作战课课长这一陆军军令机构的核心职位上，事实上领导着参谋本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参谋次长是西尾寿造，作战部部长是桑木崇明，这二人没有政治色彩，石原莞尔的发言权尤为突出。

在以藤、石原等人为核心的陆军压力下，1936年5月，广田弘毅内阁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1913年，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废除了军部大臣现役规定，任职资格扩大到了预备役和后备役。这一次又重新限定为现役武官，这是武藤章为首的陆军省军事课起草的方案。不久以后，在后述的宇垣一成拜辞救命即宇垣内阁流产时，体现了这件事的影响。

6月，武藤章因负责一系列政治活动，调出陆军中央，赴满洲担任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便在陆军中央发挥主导作用。

石原推动西尾参谋次长等陆军高层，改组了参谋本部的编制。首先，于同年6月在作战部内新设了战争指导课，专门负责制定国防战略和战争指导计划及做出形势判断。他把这个课确定为参谋本部业务的核心，并亲

图
13
石原莞尔



自担任首任课长。此外，以往形势判断是情报部的重要任务之一，但他把这项任务转移到了战争指导课。另外，他把当时属于总务部的编制动员课合并到了作战课，从而以战争指导课和作战课为核心，构成了作战部。通过这些改组，形成了参谋本部主要权限集中在作战部的一个系统。

翌年即1937年1月，石原任代理作战部部长（作战部部长空缺）；3月，正式就任作战部部长。

2. 石原的对苏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转变

这期间，就任作战课课长不久的石原便得知日本的驻满兵力只有苏联远东军的大约30%，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坦克和航空兵力也只有苏联远东军的大约1/5，感到非常吃惊。他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石原认为，由于苏联远东军迅速增强军备，“满洲国的国防正濒于危殆”。1935年，苏联在远东的兵力为14个师，飞机950架，坦克850辆。日军为5个师团，飞机220架，坦克150辆。石原在该年底决定，作为国策的重点，为了让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有必要在中国大陆部署至少相当于苏联远东军80%左右的兵力。这是因为，他认为日本的对苏战备需要足以“在开战初期能够给予有力的一击”。

1936年6月，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并获得了参谋总长的批准。此时，石原已经由作战课课长变为战争指导课课长。

这份大纲首先强调，要全力以赴让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政策”。为此，需要扩充航空兵力等，同时以“日满和华北为范围”，准备对苏联的持久战。虽然日本最希望不通过战争就能达到这个目的（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但是，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必须打败苏联。另外，为了打败苏联，日本必须与美英保持友好关系。因此，“对华活动”要限制在能够与美英保持友好关系的范围。《大纲》在阐述了这些内容后，进一步做了如下展望：

如果让苏联放弃攻势或者让苏联屈服，接着就应夺取英国在“东亚”（包括亚洲东部、东南亚）的根据地，赶走英国的势力。由此，让亚洲东部、东南亚的被压迫民族获得独立，进而侵占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从而排除白人对“东亚”的“压迫”，确立日本“东亚保护者、领导者的地位”。然后，进一步领导这些“东亚各国”，准备与美国进行“大决战”，即世界的最终战争。

可以说，这里表明了石原宏伟的战争计划。石原早已在设想日本与美国之间最终的世界战争，主张为此而形成以“日满中”为核心的东亚联盟，从亚洲赶走白

人势力。因此，这种东亚联盟的主张并不局限于日本、中国，而且还设想扩大到东南亚，以确保石油、橡胶以及其他资源。虽然《大纲》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海军的意见，但这种构想也是石原自己的想法。

然而，这个《大纲》由于主张优先实行对苏战备，因此没有得到海军的同意。这是因为后者更加重视南进的战备。在此前后，海军废弃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军备不再受到条约限制，正在准备与美国进行造舰竞争。所以，他们必须优先获得建造军舰的预算。

最终，陆海军共同制定了《国策大纲》，确定了同时增强陆海军军备的方针。同年8月7日，依据这个《大纲》，在广田弘毅内阁的五相会议（首、陆、海、外、藏五相）上，决定了南北并进的《国策基准》。

1936年6月，采纳陆海军的主张，对《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在这里，主要的假想敌国并记为美国和苏联，在其之后新加了中国和英国。另外，战时所需陆军兵力为50个师团、航空142个中队；海军兵力为军舰12艘，航空母舰12艘；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第二次修订的时候，主要的假想敌国为美国，其次是苏联。另外，战时所需陆军兵力为40个师团、飞行中队若干，海军兵力为军舰9艘、航空母舰3艘，等等。因而，在第三次修订中，陆

军方面增加了 10 个师团，大规模扩大了航空战力；海军方面则企图大幅度强化航空母舰。

由于优先对苏战备的主张没有能够成为国策，因此，以石原为首的参谋本部开始在陆军中独自按照《国防国策大纲》的路线推进国防政策。

1936 年 7 月，以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制定了《战争计划准备方针》。在该方针中，计划在五年后的 1941 年之前完成对苏战争的准备工作，它的核心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扩充军备，尤其实现空军飞跃发展和增强驻满兵力；第二，以“日、满、华北（河北省北部和察哈尔省东南部）”为范围，大力发展持久战所需要的产业，尤其是迅速开发“满洲国”，确立能够在大陆生产大量军需品的生产体系。这个方针提出在今后五年内完成对苏战备，同时实现生产力的飞跃扩充，以备持久战。

同年初秋，石原莞尔作为战争指导课课长，与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町尻量基、军务课课长石本寅三通过协商，决定了增强对苏战备、飞跃扩充生产力等内容。在此之前的 8 月，陆军省也进行了机构改组，设立了主管全面政治对策的军务局军务课。这是为了强化在政策方面辅佐陆相的体制。

这样，石原莞尔、町尻量基、石本寅三这三位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负责业务的核心人物开始推进石原的构想。值得一提的是，石原莞尔与町尻量基都是一夕会成

员，而且是陆军士官学校同期同学，后者一直从陆军省方面支持石原莞尔的工作。

这一时期陆军省的基本阵容是：寺内寿一陆相、梅津美治郎陆军次官、矶谷廉介军务局局长、町尻量基军事课课长。由于寺内政治色彩淡薄，而且完全没有军政经验，因此军政上的决策几乎全权委托梅津美治郎等人。梅津美治郎是业务型军事官僚中实权最大的人物，但他没有特定的政治性，因而在这个时候能够容忍石原莞尔等人的行动。另外，矶谷廉介与石原莞尔、町尻量基同样属于一夕会，赞同石原莞尔等人的行动。此外，这个时候，作战课课长是一夕会会员富永恭次，他也是永田嫡系的统制派成员。

同年11月，陆军省制定了《军备扩充计划大纲》，计划到1942年之前配备41个师团和142个飞行中队，在满洲和朝鲜部署13个师团。大纲决定了军备扩张方针，以扩充对苏战备。

为此，广田弘毅内阁在1937年度预算案中批准了陆军7.28亿日元、海军6.82亿日元的预算，比上一年度总共增加了3.5亿日元，实施大规模扩军。进而，作为扩军计划的后续费用，给陆军列入了13.9亿日元的预算。整个预算方案金额为30.39亿日元。年度支出的46.4%为军费，比上一年度膨胀了7.27亿日元。由于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内阁对陆军的财政控制已经几乎形同虚设。

另外，1936年8月，石原莞尔让早先设立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提交了作为研究成果的《日满产业五年计划》。“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是以满铁调查部的宫崎正义作为参谋本部顾问，让其设立的一个机构。宫崎正义在满铁调查部担任负责俄国方面的主任职务，精通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因此，这个五年计划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出发，引入了通过计划经济来扩充工业生产力的新思想，也应称为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论。

这种通过计划经济扩充工业生产力的思想，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为模式的永田铁山等人的统制经济论中所不包含的观点。永田等人的统制经济论是从国家的观点，试图对现有的工业生产力和技术进行合理的重组，并实行统制和管理。而石原莞尔的五年计划的目的，不仅包括统制、管理，而且还包括由国家主导发展工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当然，永田铁山等人也试图实行重化学工业化和强化军需产业，但是，它主要是考虑通过国家统制来重组产业结构，并不像石原莞尔那样，作为一项计划，强烈意识到通过计划经济积极提高整个工业生产力。

石原莞尔等人的《日满产业五年计划》于1937年5月作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移交给陆军省实施。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国家主导下，用五年时间把基础产业提高到目前的2~3倍，飞机生产提高到10倍，等等。

这项计划谋求以重工业为中心，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发展。6月，这项计划被广田弘毅内阁、林銑十郎内阁之后的近卫文麿内阁作为政府的决定。

除了这些计划之外，陆军在1936年10月专门制定了内容为扩充实业军需产业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并付诸实施。其目标是，在满洲生产大陆战争所需的武器和军需品。

另外，石原从扩充生产力、充实对苏战备的观点出发，制定了重视国内经济的和平稳定、至少在完成战备的1941年之前不对外打仗的方针，即维持绝对和平的方针。

不过，石原认为，对苏战争未必不可避免。他也考虑到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同时认为，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也需要扩充对苏战备。这是因为，如果日本和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不平衡，就不可能让苏联放弃它在远东的攻势，不会具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条件。

另外，即使到了开战的地步，行使军事力量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消除苏联的军事威胁，应该采取只限于确保沿海州和桦太岛^①北部的方针。这是因为，他并不像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1918年）的山县有朋，还有田中义一、皇道派主张对苏开战时（1933年）的荒木贞夫、

① 中国称库页岛。

小畑敏四郎等人那样，企图向北方扩大领土，而是把现阶段的目标定为消除苏联威胁以及确保产业发展和用于持久战的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石原考虑，苏联在沿海州部署的越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构成了威胁，而针对桦太岛北部，则从确保石油资源的观点出发，想要取得当地全部的油田。但是，对于其他西伯利亚地区，他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没有发现什么军需资源。另外，桦太岛北部的石油产量也只能够满足日本的一部分需要。因此，向北方扩大领土，可以说对确保资源没有多大意义。日本要实现铁矿石、煤炭、石油、橡胶等主要军需资源的自给，需要中国本土和东南亚的资源。

在先前的《战争计划准备方针》中，除了上述充实兵备和扩充生产之外，还提出了必须改革“政治和经济机构”，为此，需要做好强制实行“根本革新”的思想准备。《方针》中还说，为了实行《方针》，必须建立“应该领导新时代的政治团体”。它主张根本改造国内的政治经济体系，甚至提到了为此建立具有领导力的政治团体。

石原一直考虑，“满洲国”应该成为“一党独裁的国家”，并亲自筹建了“满洲国协和会”，作为实行独裁的政治团体。他试图实现“协和会”的一党独裁。在石原关于“满洲国”的这一想法形成的1932年，德国的纳粹政权尚未成立，因此，这种一党独裁国家的构

思是以苏联为模式的。

石原主张，通过创建具有领导力的政治团体，根本改造政治经济体系。这种主张具有一个目的，它试图把“满洲国协和会”实行一党独裁的构想以某种形式带到日本国内。石原莞尔的这个想法，后来为武藤章等人的一国一党论所继承。当然，那个时候也吸收了纳粹德国的经验。

在永田铁山的身上，我们看不到石原的这种一党独裁的想法。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永田铁山的想法是：陆军独自制定国策的具体方案，通过陆相强迫内阁实施。另外，他还研究了这样一种方向：通过一种授权法，把立法权大幅度转移到内阁，让其实施陆军的国策方案。但是，他毫无考虑一党独裁的迹象。不过，他对独裁制度下灵活机动的工业化和军事领导的情况，具有一定的认识。例如，他获得了在苏联“独裁下的统制国家”中，工业化的重点放在坦克生产和可以转用为坦克的农用拖拉机生产上，并在战略上集中使用坦克和飞机这样的情报。但是，永田自己没有谈到过独裁的主张，一党独裁论在陆军中是石原个人的主张。

此外，关于永田铁山等人研究的授权法，有人证实，它是一种纳粹模式。不过，从永田的经历来看，它应该也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授权法为模式的。

另外，石原在1936年6月前后，曾经考虑利用德国从欧洲方面牵制苏联在远东的攻势，并希望在这个方

面与德国合作。

从前一年夏天开始，驻德武官大岛浩与希特勒的私人外交顾问里宾特洛甫、德国国防军谍报局总监卡纳里斯就日德合作共同对苏问题，进行谈判。这个谈判最初是通过参谋本部情报部渠道开始的，冈村宁次当时任情报部部长，也赞同与德国谈判。冈村对德国宣布重整军备表示“钦佩”，当时对德国抱有同情。后来，日本外务省也参与了谈判，1936年11月由广田内阁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

在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战争指导课于1937年1月拟定了《帝国外交方针改正意见》，其中明确记载了要通过《日德防共协定》牵制苏联的想法。对于石原来说，《日德防共协定》是让德国方面牵制苏联在远东的攻势的一个重要手段。至少，石原当时并没有考虑日德夹攻苏联。另外，有人把《日德防共协定》直接联系到欧洲大战开始后的日德意三国同盟，但至少从石原绝对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态度来看，也许不能这样说。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述。

正如先前看到的那样，石原莞尔的长期战略是：驱逐英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势力，构建东亚联盟，确保资源，最终与美国进行决战。也就是说，基本上主张南进。而扩充对苏战备的前提是，让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确保后方安全。

这里引人注意的是，在《帝国外交方针改正意见》

中，除了通过《日德防共协定》牵制苏联等主张外，还认为“华北”应该包含在汉族的“统一运动”之内。

这个意见记载了如下宗旨：日本需要确立“东亚保护者、领导者的地位”，为此，必须实现“日中亲善”。因此，日本必须调整目前日趋严重的日中对立关系。为此，应该认识到中国目前的“困境”，援助它的“建设统一运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华北”应该包括在这种统一运动之内。

它在对华政策上，表明了与以往的华北分裂活动方针不同的见解。

接着，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在同月（1月）又拟定了《对支实行策改正意见》。该《意见》制定了应该“清算”“华北特殊地区”的观念、“纠正”以往酝酿华北“五省独立”势头的方针。

另外，这份《意见》还称，冀察政权的管辖地区属于中央政权的主权范围，冀东地区亦应适当回归中国。可以说，它暗示了把冀察政务委员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逐渐统一到南京中央政府的方向。值得一提的是，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权”是日本与国民政府暂时达成妥协而成立的，但是，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政权其存在本身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并且国民政府发出了对殷汝耕的逮捕命令。况且，“冀东政府”批准以正规的国民政府方面关税12%左右的输入税进行贸易，对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同月，参谋本部按照石原等人的意见，正式向陆军省传达了改变对华政策、不再进行华北分治活动的意见。它清楚表明了转变方向，要求停止以往的华北分裂活动。

陆军省也同意这个方针，同年4月，林銑十郎内阁的四相（陆、海、外、藏四相）会议决定，不再进行企图实现“华北〔五省〕分治”的政治活动，谋求调整中日邦交。这意味着，在国家政治层面上也停止了冈田内阁的内阁会议决定《第一次北支处理要纲》（1936年1月）以来的华北分裂政策。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华北分裂活动在陆军中央是在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局长制定《对北支那政策》后开始推动的一项政策。永田铁山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必须从中国确保其时所需的军需资源。永田等人的分裂华北政策在一个方面具有确保资源、防备世界大战的性质。

石原莞尔也抱有与永田铁山同样的观点，认为应该从中国确保获得国家总体战所需的短缺资源，以前也不反对华北分裂活动，把它作为其中一个过程。例如，在发动满洲事变时（1931年），石原曾经考虑，依靠满蒙的资源，不足以进行长期持久的国家总体战，还需要河北省的铁矿、山西省的煤炭等资源。因此，应该立足满蒙，夺取河北省、山西省等华北地区，进而，视情况占领“中国本部的要都”，从而确立“东亚自给自足的道

路”。他还曾说，“统治满洲”的目的是为了做好开发中国本土资源的准备，以备未来的“世界争霸战争”。

日中签订塘沽停战协定（1933年5月）以后，他的意见也是为了实现“东亚联盟”，如果有必要应该把中国本土也纳入日本的统治之下，实行“以日中满三国为基础范围的自给经济”。另外，当时他还表示，可以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东等地。也就是说，他当时考虑的是包括整个中国在内的自给体制。而且，他还设想，日本不仅与苏联，与美国、英国等国家也可能发生战争。另外，1932年8月，他也曾强调河北省的铁矿、山西省的煤炭等华北资源的重要性，并发表个人意见称，应该首先实现“华北的开发”。这个时候，石原莞尔已经离开关东军，调入陆军中央下的兵器本厂。

此后，石原莞尔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我们将叙述得比较详细。由于它关系到后来日中战争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看一看这种想法的变化过程。

首先，1936年6月的《国防国策大纲》提出了在“日、满和华北”范围内，进行持久战的准备，而且表明了“对华政治活动”应该限制在与美英保持友好关系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确保资源的范围限定在到华北为止，而且以与美英的友好为前提。

接着，在同年7月的《战争计划准备方针》中，上述的“华北”范围也限定为河北省北部和察哈尔省东南部，所以并非整个华北五省，而是其中二省，而且是

前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的区域，也就是说，它的范围仅限于实际上在某种形式上日本影响力所及的范围。

此后，石原为了调整日中国家关系，总结了几条意见：避免“在华北发生无益的纠纷”；在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交涉中，也不要采取“获取我利益的行动”，等等。另外，对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明确要求停止中国驻屯军（天津）直接干涉，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撤回日本顾问，等等。他试图通过这些手段减轻日本对“冀东政府”、冀察政权的压力。

并且，在《帝国外交方针改正意见》中，他明确了“华北”应该包含在汉民族统一运动之内的观点（1937年1月），由此，明确了纠正以往分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的方针，不进行“华北分治活动”的立场。另外，他还表示同意逐步取消“冀东政府”、冀察政权，统一到南京中央政府。这样，石原明确地否定了以往的分裂华北活动。因此，石原说：“不能因为华北的资源而失去理智”，并称，现在谈论华北的资源“有害”无益。

那么，为什么石原改变了方针呢？原因之一，是他在对苏战备问题上抱有危机感，因而必须考虑到与美英等国的国际关系。

石原认为，为了让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政策，需要与美英建立友好关系。这是因为他判断，如果日本与

苏联发生战争，当前不得不依靠美英两国供应军需物品。因此，他主张，对华政治活动也应该“限制”在能够与美英保持友好关系的范围之内。从这种对美英的考虑出发，由于美英两国在华北拥有利益，所以有必要制止企图扩大华北势力范围的分裂活动。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正在顺利推动国家统一，抗日运动不断激化。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按照英国财政顾问李滋·罗思的建议，实行币制改革。在英国的支持下，从以往的银本位制过渡到了法定通货制度，同时实现了货币制度的统一。通过这项改革，稳定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基础，国民政府的政治统一取得了迅速发展。另外，以知识分子阶层为核心，开展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逐渐发展成国民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反蒋集团中的西南派宣布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合并。进而，由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实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华北地区，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渗透，山东省、山西省各派军阀相继归顺中央，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权也在南京中央政府的压力下，开始在与日本的关系上保持距离。而且，在中国各地不断发生抗日暴力事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于1937

年1月汇总了意见：最近的“抗日人民战线”是现代中国的“苦恼的一种表现”，必须把它转化为实现中国统一的运动、建设新中国的运动。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是徒然地镇压一般的抗日运动，而是应该让它转向“统一支那”“建设新支那”的“正当的民众运动”。

石原主张，能够成为这种方向转变“动因”的，首先是日本方面放弃“以往的帝国主义侵犯政策”，同时纠正“侵略、垄断的优越态度”。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积极援助“新支那建设运动”和“统一运动”。

这意味着石原本身对华认识的巨大转变。石原曾经认为，汉民族“具有不能自己创造近代国家的缺陷”，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乃是一个疑问。另外，他认为，他们缺少“自己维持治安的能力”，日本“在政治上领导”整个中国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幸福”。而现在他却承认，中国有可能实现统一和建设近代国家，反而日本应该予以积极援助。而且，为此，日本自己必须放弃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

在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他认识到了现状的严峻。以西安事件为契机，中国形成了反对内战的社会氛围，一致对外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石原在前一年（1936年）的11月至12月视察了华北和满洲，当时的经历应该也是造成他这种认识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是石原否定以往华北分裂活动的原因。

早在1935年6月，国民政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

曾经提议，以中方取缔排日运动和日方停止支持地方政权（自治政府类）为条件，谋求调整日中邦交。这个建议暂时搁置“满洲国”问题，获得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高层的批准。但是，随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建立，日本正式开始华北分裂活动，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

石原考虑到蒋作宾的这个提议以及此后张群外交部长的要求，试图通过停止华北分裂活动，调整日中邦交。也就是说，石原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日本停止支持“冀东政府”和冀察政权，放弃分裂华北活动，撤回华北的政治权益，便能够实现日中合作。这样，就能够让蒋介石事实上承认“满洲国”，使日中关系走向东亚联盟。

不过，尽管石原主张这样的和睦政策，但他同时做好了中国拒绝与日本调整邦交、完全不接受东亚联盟方针的思想准备。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态，日本就要“击败南京政府，让其屈服”。这是因为，为了进行石原设想的与美国的最终战争，绝对需要中国的资源和潜在的经济力量。因此，为了防备发生这种情况，石原同时也着手制定对华作战计划。在这个过程中，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不过，石原想要尽量避免当下与中国发生战争。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五年计划期间不打仗的方针，而且是因为，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在对苏战略上，需要与美英

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这两个国家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利益。

此外，尽管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停止“华北分治活动”，亦即华北的政治自治活动，但他们主张应该积极推动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活动。他们认为需要通过各种日中经济活动，走向日中经济合作。

但是，这里所说的日中经济合作，未必是像华北分裂活动那样排他的、垄断的经济合作。石原等人的立场是，应该纠正日本对华北、华中的“不平等的、垄断的经济扩张”，而应该配合美英等“列强的对华经济扩张”。如果有助于中国统一和建设新国家，日本从经济方面也要与美英两国进行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点与在永田铁山的领导下编写的陆军手册《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1934年10月）的态度相比，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永田等人认为，在与列强各国持久的经济战中，日本必须确保中国市场，而对于欧美各国进入中国市场，日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与之对抗。但是，石原等人在这个时候支持美英等国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反而认为应该在经济方面与美英两国积极合作。这也成为后来以武藤章为首的旧永田团体与石原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在这个阶段，石原等人考虑的是“以日满为范围的自给自足经济”，在对苏战略上，也考虑到了从美英两国获取军需物资。也就是说，准备对苏战争的军

需生产，不包括华中和华北，而是限定在日“满”范围之内。当然，从资源上来看，这不可能是严密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体制，至于短缺的军需物资，他设想将来从美英两国进口。因此，他考虑，不仅需要改善因华北分裂活动而恶化的日中关系，而且需要调整与美英两国的关系。

这种主张导致了后来佐藤尚武外相（林銑十郎内阁）采取的日英友好方针以及广田弘毅（近卫文麿内阁）着手与英国谈判。这是因为，石原预料，在对华问题上，从原则性的态度来看，目前难以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但英国强烈要求维持在华的本国权益，时任英国首相鲍德温为首的保守党右派中，有人希望从这个方面调整与日本的关系。艾登外相也考虑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在谈判的事先磋商阶段，爆发了卢沟桥事件，事态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另外，在策划华北分裂活动的同时，关东军也在内蒙古进行活动。石原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观点出发，主张应该也停止这种活动。

所谓内蒙古活动，指的是日本援助蒙古王族德王，让内蒙古从国民政府“独立”的活动。德王以前就发起过“内蒙自治运动”，一直与国民政府对立。关东军让德王建立了“内蒙军政府”，并让德王政权与“满洲国”签订互助协定。然后，1936年11月，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内蒙军”向华北绥远省发动了进攻（关东军

负责人为关东军参谋、内蒙古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但“内蒙军”在绥远省中部的百灵庙战役中被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领的中国军队击败。12月上旬，“内蒙军”内部发生叛乱，德王等人溃逃。

以这个事态为契机，翌年1937年1月，以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提出了“内蒙军政府”应该停止“对外入侵”，消除与国民政府方面发生的争执。

就在百灵庙附近正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石原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视察了满洲和华北。途中，他去新京（长春）与关东军参谋高层进行了会谈。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高层是板垣征四郎参谋长、今村均副参谋长、武藤章情报主任参谋等人。

根据今村均的回忆，席上，石原主张应该停止内蒙古活动。当时，武藤章情报主任参谋反驳石原说：你“在满洲事变中非常活跃”，现在我们“效仿你的行动，在内蒙古如法炮制”。同席的年轻参谋们“哄堂大笑”。

刚才我们提到，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局长时期，制定《对北支那政策》、指示开展分裂华北活动时，起草人正是武藤章（当时任军事课高级课员）。石原对武藤章起草的分裂华北政策——这也是永田铁山的遗志——提出否定的方针，武藤章当然会强烈反弹。这件事很少有人指出，却是不能忽视的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永田铁山担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的时候，武藤章曾经是直属部长的综合班的班长，受到永田铁山直接的强烈

影响。

石原与武藤在华北分裂活动和内蒙古活动上的分歧，为后来日中战争爆发时二人关于是否扩大事态的分歧，埋下了伏笔。没有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当时为什么武藤章像后述那样，顽固反抗作为上司的石原。另外，永田的心腹、接任板垣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也于1937年6月向陆军提出了应该“给南京政府一击”的意见。

1937年3月石原就任作战部部长的時候，曾经对时任战争指导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说，对于“早晚可以预期的西方各民族的世界大争斗”，日本“应该置身局外”。也就是说，他认为不应该参与到预料之中的下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因为，根据他自己的战争史观，他判断，面向最终的日美世界大战（设想在20世纪后半叶），日本应该采取通过东亚联盟稳定亚洲的政策，而不能参与在欧美发生的大战。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3月，德军进驻《凡尔赛和约》《洛迦诺公约》中规定为非军事区的莱茵兰^①，欧洲局势骤然紧张。另外，前一年10月，意大利开始进攻埃塞俄比亚，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了经济制裁，但是，最终埃塞俄比亚于1936年5月被意大利吞并。

与永田的构想相比，石原这种姿态是不容轻视的。

^① 也称莱茵河左岸地带，今德国莱茵河中游。

永田的国家总动员论归根结底是预料到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不可避免，为了应对世界大战而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日本也不得不参与到下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为此，日本必须做好国家总动员的准备和计划，建立战争体制。永田等人是抱着这样的观点，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这种观点的不同影响到了主张扩大事态的武藤章一派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石原一派之间的分歧。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武藤等人受到永田的强烈影响，在纳粹德国宣布重整军备而引发欧洲紧张局势尖锐化的背景下，重视确保华北的军需资源。这是因为，永田、武藤等人判断，下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开始爆发的可能性很大，而纳粹德国背弃《凡尔赛和约》、宣布重整军备、进驻莱茵兰都使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变为现实。但是，石原认为，日本不应该参与欧洲的大战，因此没有必要以政治策略的形式插手华北的资源。可以说，这种观点的差异是围绕华北分裂活动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7年3月，石原晋升为作战部部长，但是此前他的影响力就已经开始动摇。

同年1月，政友会议员浜田国松在国会上对陆军提出批评，使寺内寿一陆相感到非常愤怒（所谓的“切腹问答”），导致政党与陆军发生分歧。寺内寿一主张解散国会，而政党出身的内阁成员则坚决反对。最终，广田弘毅内阁因内阁内部不一致而宣布总辞职。

按照元老西园寺公望及其周边人员的意见，天皇下令原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就任下一任首相。这是为了让宇垣控制陆军的行动。但是，由于石原等陆军中央幕僚的阻挠，宇垣没有能够从现役武官中得到陆相候选人，最终，宇垣放弃组阁。可以说，这是广田内阁时期恢复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小矶国昭等原宇垣派的将官在派系斗争中失败后，听从了陆军中央和下属幕僚的意见，为了保身，拒绝了宇垣提出的就任陆相的邀请。

接着，天皇任命原陆相林銑十郎代替宇垣就任首相。这项任命符合石原等陆军中央的想法。

石原把原满铁理事十河信二安插到组阁本部，企图让从满洲时期起一直关系密切的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长就任陆相。林銑十郎表示同意，但寺内寿一陆相、闲院宫参谋总长、杉山元教育总监召开的陆军三长官会议推荐了当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の中村孝太郎。林銑十郎要求让板垣就任陆相，但三长官会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这是由于时任陆军次官的梅津美治郎背后的活动。板垣在陆军士官学校比梅津晚一期，在陆军大学则晚五期。而且，梅津是陆军大学的第一名，板垣甚至没有进入同一期的前六名优等毕业生行列。对于梅津来说，板垣越过当次官的自己就任陆相，将会打乱陆军的资辈。另外，石原等人竟然不跟身为陆军次官的自己商量，直接推动陆相的推选工作，应该也让他难以容忍。

由于三长官会议的反对，林銑十郎最后放弃了让板垣就任陆相的任命，而决定由中村孝太郎担任陆相。这样，石原等人通过板垣掌控整个陆军的企图遇到挫折，对他的影响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此后，过了大约四个月，林銑十郎内阁总辞职，1937年6月4日，成立了近卫文麿内阁。

3. 卢沟桥事件与石原、武藤的分歧

大约一个月后的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件。

当天夜里，日中两军在当时的北平西郊卢沟桥附近发生了小规模冲突，7月11日，当地的驻华日军与中方第二十九军签订了停战协定。然而，东京的陆军中央于前一天的7月10日决定向华北派遣2个旅团的关东军、1个师团的朝鲜驻屯军和国内的3个师团。11日，近卫内阁批准了陆军提出的方案，但附加了保留意见：国内的3个师团视情况实施动员。同时，发表政府声明称，此次事件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力抗日”，为了维持“华北”治安，日本政府下“重大决心”，决定派兵。

对于日本政府这份声明，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发表《庐山声明》称：“最后关头”已到，只有抗战

到底。此时，蒋介石尚未做好充分的对日本的应战准备，但他判断，已经不得不应战。

同日，东京的陆军中央指示中国驻屯军向中方提出几项要求：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道歉；罢免当地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撤走附近的中国军队；等等。7月19日，宋哲元等第二十九军首脑接受了日方的大部分要求，签署了停战协定的实施条款。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于同日通告日本政府，当地协定需要获得南京中央政府批准，按现状不能承认，必须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外交谈判。另外，国民政府向日方表示，应该要求国际仲裁进行裁定。

对此，20日，日本陆军中央决定动员国内的3个师团。当天晚上的内阁会议批准向中国派兵。但是，由于此后当地的形势平息下来，按照陆军的判断，日本决定延缓派兵。

然而从1937年7月23日左右开始，一直对日方采取妥协态度的宋哲元态度转为强硬。25日，日中两国的部队在位于北平东南方向的廊坊交战。26日，日中两军在北平的广安门又发生了冲突。

27日，陆军中央决定对国内的3个师团下动员令，并在紧急内阁会议上获得批准。日本从国内动员和派遣了第五师团（广岛）、第六师团（熊本）、第十师团（姬路）。

同日，参谋本部最终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下达命

令：进攻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谋求该地区的稳定。28日早晨，由中国驻屯军、满洲和朝鲜的增援部队、关东军飞行队等组成的当地日军开始发动总攻。29日，日军占领了北平和天津。之后，国内的3个师团和相关部队抵达当地，动员兵力达到约20万人。

其间，陆军中央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石原莞尔（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为首，主张不扩大事态，另一派以武藤章（作战部作战课课长）、田中新一（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为首，主张扩大事态。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我们再详细地看一看具体的发展过程。

7月8日凌晨，事件的消息传到陆军中央，接着，又陆续传来报告。此时，负责统管参谋本部的今井清参谋次长正在病床上，石原莞尔作战部部长实质上是军令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参谋总长是皇族的闲院宫）。

石原听到消息后，表明了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方针，并指示当地的中国驻屯军防止扩大事态，避免行使武力。

但是，武藤作战课课长和田中军事课课长做出了与石原不同的判断。他们认为，南京政府也有可能企图实施“全面战争”，只有用“武力”来解决这个事态。为此，日本应该增强华北的兵力，伺机“加上一击”。二人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

武藤与田中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毕业生，有一段

时期二人都属于教育总监部，一直关系密切（二人都是一夕会成员）。不过，这个时候，武藤比田中早三届从陆军大学毕业，而且作为作战课课长，身处军令机构核心部门的要职，因此，武藤是扩大派的主导人物。武藤在1937年3月从关东军情报主任参谋调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而田中也在同一时期从陆军省兵务局兵务课课长调任军务局军事课课长。与此同时，原为作战课课长（兼任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升为作战部部长，原为军事课课长的町尻调任侍从武官。

对于武藤就任作战课课长，石原的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二二六事件以后，武藤作为军事课高级课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石原非常赏识他的能力。尽管在长春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也许石原对于自己的掌控能力非常自信。此外，从暗杀永田之前到卢沟桥事件之后这段时期，对课长级及以下的人事安排握有实权的陆军省补任课课长，一直是非皇道派一夕会成员加藤守雄。

1937年7月9日，武藤为首的作战课以应对华北的中方第二十九军和中央军增援为由，制定了向当地派遣关东军2个师团、朝鲜驻屯军1个师团、国内3个师团的派兵方案。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此时也主张对华强硬，声称：为了“彻底斩除祸根”，要把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赶出北平、天津地区以及河北省全境。

对此，处于石原影响下的作战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采取了

不扩大的态度。这二人也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毕业生。

7月10日，参谋本部审议了武藤等作战课的派兵方案。当时，石原认为：“当前，应该一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完成对苏战争，由此国防得以安固。不宜干涉中国，使其支离破碎。”也就是说，现在是应该专心于“满洲国”建设、完成对苏战备的时候，如果干涉中国，这些将受到阻碍，国防建设将会混乱，因此不应该扩大事态。但是，在此次审议中，他同意了武藤等人提出的派兵方案。

关于当时的理由，石原后来说：实际派兵，在决定后还需要数周时间。虽然他希望不扩大事态，但是，为了“形势逼迫”时“以备万一”，他认为需要派兵。当天，他得到了蒋介石4个师的中央军北上的情报。因此，石原产生了当地日军和日本侨民处境危险的紧迫感，不得已批准了派兵方案。

当时，当地的中国驻屯军为大约六千兵力，处于其保护之下的平津地区的日本侨民为大约1.5万人。与之相比，中方第二十九军为大约7.5万兵力，而且传来了国民政府军精锐的中央军4个师（约6万人）正在北上的情报。可以说，这对石原的判断产生了很大影响。

就在前一天（7月9日），蒋介石得到了事件情况的报告后，命令河南省的2个师、山西省的2个师北上。但是，直属蒋介石的中央军只有1个师，而且，从

第二十九军首脑处传来了对形势的判断，称派遣增援部队会有刺激日本、扩大事态的危险。因此，各个师的北上行动都比较缓慢。中国方面的北上动向传达给石原时，已经被夸大事实，所以石原并非出于本意地批准了武藤等人的派兵方案。结果，中方4个师抵达当地的时间比日军晚了许多，没有赶上日军发动的总攻。

1937年7月11日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以后，以武藤为首的作战课于16日提出了以下主张：应该向中国方面提出让宋哲元道歉、罢免当地第三十七师师长等内容苛刻的要求，并要求限期答复，如果中国方面没有做出有诚意的答复，便立刻动员所保留的国内3个师团，“讨伐中国军队”。当时，作战课决定把战场尽可能限定在华北，视情况也有可能发展为“对华全面战争”。另外，参谋本部情报部也持强硬姿态，要求立即出兵。

当时，石原等不扩大派认为，应该看一看7月11日签订当地停战协定后的谈判进展情况，但是，武藤等扩大派提出了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方针。

石原对此提出了如下反对意见。

现在能够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能够用于中国方面的大约是15个。这样，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派遣国内的3个师团，两国进入战斗状态，那么，将会有发展成全面战争的危险。如果现在与中国发生战争，只能

“走到哪算哪”。这样，无疑会变成一场“长期”的“持久战争”。但是，从现状来看，必须在与苏联的边境上配备相当数量的精锐师团，因而，无法在中国投入足够的兵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方面利用辽阔的领土进行抵抗，那么日本将会陷入战争的泥潭。

石原认为，现在正是全力扩充对苏战备的时候。如果与中国发生军事纠纷，将会削弱日本在这方面的力量，因此，他“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但是，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的兵力，将会引发全面对华战争，而顾不上扩充对苏战备。现在，中国正在从以前的分裂状态走向国家统一，民众的民族意识越来越觉醒。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发生全面战争，会有发展成持久战的危险，日本自身的国防战略将会走向崩溃。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日中两国发展成长期战争，苏联一旦打过来，目前的日本毫无把握”。从这个方面来看，日本也应该避免发动对华战争。

对此，武藤等人认为：中国处于不可能实现国家统一的分裂状态，如果日方表明强硬的态度，那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就会屈服；现在，应该坚持军事上的强硬姿态，给其一击，使其屈服，把华北五省纳入日本的势力之下；而且，现在需要与满洲相辅相成，增强对苏战备，而眼下的事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绝好机会。

也就是说，武藤主张通过军事打击，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一直以来的分裂华北政策。通过日本实质上控制华北五省，获得垄断性的统治权，从而确保华北的资源和市场。另外，这种主张低估了中国的抵抗力量，认为只要日本进行军事打击，轻易就会让中国屈服。当时，武藤曾宣称，如果向华北派遣国内的3个师团，“那里的一堆废物将会举起双手投降”。

不过，这种对华认识对于武藤等人的军事打击论来说，还是一个次要的理由。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企图打破石原按照绝对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原则而实行的停止分裂华北活动和放弃华北权益的方针。当时，在欧洲，德国宣布重整军备后进驻莱茵兰非武装区，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并受到了国际联盟的制裁，军事上局势日趋紧张。在这样的形势下，武藤等人从防备下一次世界大战的观点出发，对石原的政策抱有强烈的危机感，企图完全确保华北的军需资源和经济权益。

武藤早先就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外交政策是旨在恢复国家主权、恢复领土的“革命外交”，它“绝无将来放弃满洲的意思”，而是“想要（把满洲）收回自己的国家”，并借助美英和国际联盟的力量“对抗日本”，今后，它也肯定“对日本拔刀相向”；对此，日本必须谋求“日满合作”，进而“影响到中国本土”，日本必须有这样的“觉悟和准备”。也就是说，武藤企图逐渐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势力

范围。其背景则是要求确保日本的军需资源和获得市场以备未来的国家总体战。

但是，在这个阶段，武藤、田中等陆军中央的对华强硬派也出于对美英等的考虑，并不打算从正面否定关于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的《九国公约》。因此，他们并不考虑把华北变为独立国家或者变为日本的领土、否定中国的主权，而是希望完全通过自治的独立政权等形式，实现分裂华北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把华北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比如，武藤声称，虽然要对国民政府实施军事打击，但是“并不考虑夺取南京”。另外，田中军事课课长也认为，采取不扩大方针会导致放弃日本的“华北权益”，而为了保护日本在华北的权益，必须坚持强硬的态度。

当时，在陆军中央的幕僚中，赞同以武藤章为首的扩大派的人占多数，而以石原为首的不扩大派占少数。在所有的部长、局长、课长中，不扩大派除了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之外，只有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等人。而扩大派则有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笠原幸雄、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等人，还有参谋本部运输通信部部长冢田攻、参谋本部战史部部长下村定也持同样的态度。在普通课员中，除了河边指挥下的战争指导课课的课员以外，大多数是扩大派。尤其是，当时与课员人数只有四五个人的其他课

相比，作战课课员有 20 人左右，而他们几乎都在武藤课长的影响之下。这是武藤拥有较大发言权的一个背景。

从幕僚层的这种动向可以推测，许多幕僚赞赏石原在扩充对苏战备和推动军备扩张方面的工作，但是，对于他后来停止分裂华北活动则抱有不满意。刚才提到的梅津美治郎阻止板垣就任陆相这件事，也应该是梅津看出了幕僚层的这种不满。

1937 年 7 月 17 日，在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等人的推动下，杉山元陆相、梅津美治郎次官等陆军省高层表示支持武藤章为首的作战课拟定的方案。石原与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石原也担心，拖延谈判会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赢得时间，最终同意给谈判设定期限。这是因为他担心当地的日军和日本侨民的安全。同日，五相（首、藏、外、陆、海五相）会议同意以 7 月 19 日为谈判期限。

由于日方态度强硬，宋哲元为首的第二十九军接受了日方的大部分要求，7 月 19 日签署了协定的详细条款。

但是，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事实上否定了当地签订的协定条款的有效性。因此，7 月 20 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行使武力，内阁会议也批准派遣国内师团。

然而，7 月 21 日，从当地视察回国的参谋本部总

务部部长中岛铁藏、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进行了报告，他们称，宋哲元正在陆续落实7月19日签署的协定条款，认为不需要兵力增援。另外，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也发来了同样内容的电报。

因此，7月22日，陆军中央决定延缓派遣国内师团。当时，石原主张停止派遣国内师团，而武藤坚决主张派遣，二人发生了激烈的辩论，甚至发展到“不是你辞职，就是我辞职，只有一个选择”的争吵。

在幕僚中，即使是部长与课长的关系，只要不是组织的决定，就不是个人服从命令的关系，而允许向参谋总长呈报意见。但是，部长发出指示，课长服从命令，乃是惯例。然而，武藤不采取这种普遍的态度，拒不服从石原。不过，当时，作为陆军中央的意见，最终按照石原等人的意向，决定延缓派遣国内师团。

但是，1937年7月25日发生了廊坊事件，7月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当日晚，石原终于也向当地驻军发出通报，指示“彻底讨伐”中国军队。接着，次日，决定派遣国内3个师团，7月28日开始发动总攻。

在当时的中国，像卢沟桥事件这样的小规模纠纷并不少见。武藤等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动军事打击，让事态扩大呢？这是因为，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武藤强烈反对石原放弃在永田领导下自己起草的分裂华北政策。武藤攻击石原的不扩大政策，也是对石原停止华北分裂活动的一个反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日中

战争是对石原放弃分裂华北政策的一种反抗，是作为激烈的回击开始的一场战争。

尽管如此，为什么它是在这个时候发生呢？实际上，在7月7日卢沟桥事件的大约一个月之前的6月11日，苏联宣布红军最高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人被枪决。此后，继续进行红军领导层的肃反运动，许多高级将领被处决。斯大林掀起的这一场红军大肃反运动一持续到第二年，据说大约45%旅长以上的将领遭到杀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人被枪决的情报立即传到了日本陆军中央。他们判断，红军会因为这次事件受到沉重打击，苏联介入日中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这应该是日本在此时利用卢沟桥事件发动对华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通过军事打击让南京国民政府屈服的良机。

另外，由于1935年3月纳粹德国背弃《凡尔赛和约》，宣布重整军备，进而于翌年3月废弃了关于保障西欧安全的《洛迦诺公约》，进驻莱茵兰地区，同年5月意大利不顾国际联盟经济制裁吞并埃塞俄比亚等事件，欧洲的紧张局势日益激化。武藤章认为，在这样的欧洲形势下，美英等列强国家不会正式介入东亚问题。他宣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事不宜迟〔发动对华战争〕。”

进而，武藤也考虑，随着这种军事紧张局势的尖锐

化，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武藤从与永田同样的观点出发认为，为了应对大战，有必要掌握华北的军需资源和经济力量。

大约两年后的 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第六章

日中战争的展开与东亚新秩序



图 14 1938 年汉口作战中在浦口登陆的士兵。（读卖新闻社供图）

1. 战争的扩大和战线的胶着

1937年7月28日，当地的日本军队发动总攻，7月29日基本控制了平津地区。此时，以石原为首的参谋本部仍然坚持不扩大的方针，指示把军事行动限定在控制平津地区，作战范围为北平、天津西南的保定至独流镇一线以北地区。

但是，8月9日，上海发生了中国机场卫兵射杀两名日本海军特种陆战队队员的事件，当地局势也骤然紧张起来。上海的日本侨民多达大约2.6万人，而保护侨民的海军陆战队只有大约三千兵力。8月10日，日本海军派出4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及3000名陆战队队员急赴上海。同一天，近卫内阁采纳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提议，确定了在上海保护侨民的方针，并批准准备派遣陆军部队。

针对杉山元陆军大臣的要求，作战部部长石原认为，如果派兵不限定在华北地区，将有可能引发日中之间的全面战争，因此，他反对派遣陆军部队。但是，作战课课长武藤积极主张派兵，认为海陆军必须采取一致行动，给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石原以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增强了防御为由，仍然不愿派兵。

石原一直坚持出兵应该限定在华北地区。对此，武

藤认为，“青岛、上海两地拥有许多侨民”，完全“不予保护”，“值得怀疑”。

但是，后来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石原也做出了让步，不得已同意派兵。在8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派遣陆军3个师团。同日晚，上海的日中军队进入了交战状态。8月14日早晨，中国空军轰炸上海的日本舰队和陆战队。日方也在14日、15日对南京、杭州、南昌等地的中国空军基地连续两天进行轰炸。

8月15日，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暴戾行径”，敦促南京政府反省，“将采取坚决处置”（“膺惩暴支”声明）。在13日决定派遣的3个师团中，2个师团编为上海派遣军，剩下的一个师团计划派遣到青岛（日本侨民1.3万人）。两天后的17日，在米内光政海军大臣的主导下，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

另一方面，日军在华北发动总攻后，中国方面决心全面抗战。蒋介石认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决心全面抗战。8月12日，蒋介石正式就任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以他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成为抗战最高统帅部。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宣言，15日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开始进行合作谈判，9月23日，正式确立第二次国共合作^①（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

^①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北伐战争之前的1924年)。

在上海方面，海军陆战队遭到了兵力占有优势的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这样的形势下，8月23日，上海派遣军在上海北部近郊登陆。但是，中国军队利用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修筑的坚固的碉堡阵地和纵横交错的河网，进行了顽强的抗战，日军陷入了苦战。中国方面把上海近郊作为保卫南京的重点地区，在这里集中了以中央直属精锐部队为核心的大量兵力。上海派遣军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损失惨重。从8月中旬战斗开始到11月上旬上海附近的战斗基本结束，日军的伤亡人数超过了4万人。

因此，参谋本部决定向上海增派3个师团，并于9月11日发出了派兵命令。这样，日本向上海派兵达到了5个师团。起初，以石原为首的作战部计划将作战重点放在华北，向上海方面只派出2个师团的兵力。但是，这些兵力已经无法应付上海的战况。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不久，关东军便向陆军中央强烈要求动用内蒙古察哈尔省等地的兵力。参谋本部没有批准关东军的要求，但关东军的一部分部队不顾陆军中央的制止，从8月5日起开始攻入察哈尔省内的多伦、张北地区。8月9日，参谋本部只得向关东军下令发动察哈尔战役。在此期间，石原站在不扩大事态的立场，反对发动这一战役，但武藤强烈支持关东军的要求。在东条英机参谋长的直接指挥下，关东军正式开进察哈尔

省。8月27日，日军占领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此后，关东军继续向绥远省、山西省方面发动进攻。石原等人最初想要把在华北的作战控制在北平和天津地区，因而，他的意图落空。值得一提的是，东条和武藤都属于永田嫡系的统制派团体。

进而，在华北地区，8月31日，在已有的4个师团的基础上，加上计划派遣到青岛的1个师团和从国内增派的3个师团，总共8个师团组建了华北方面军^①。青岛派兵，由于近卫内阁于8月24日决定撤回青岛侨民而取消。此外，8月25日，在近卫文麿首相、杉山元陆相、米内光政海相、广田弘毅外相、贺屋兴宣藏相组成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不正式对华宣战。这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启动《中立法》。因为日本进行战争所需的大量机械及战略物资依赖于从美国进口，而《中立法》禁止向交战国出口此类物资。

华北方面军是日本为了尽早结束战争而组编的部队，它的作战目的是，在河北省中部的保定附近给中国军队以重大的打击。保定战役从9月中旬正式开始，但是由于中国方面采取了后退战术，日军没有能够打击中国军队的主力。在保定战役中，石原等人也仍然坚持不扩大的立场，把作战区域限定在保定至沧州一线附近，但华北方面军把作战区域进一步扩大到了南面的石家庄

^① 日语称“北支那方面軍”，此处按中方惯称翻译。

至德州一线。

石原作战部部长和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课长等人主张，将界限划在保定附近，稳定确保占领地区。但是，武藤章作战课课长和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等人主张，为了在短时间内击败国民政府，不拖入持久战，有必要扩大作战区域。这样，陆军中央内部就产生了意见分歧，因而不能统一领导战争。在这种状态下，陆军中央难以控制华北方面军等部队，最终造成了当地军队的单独行动。

日中战争事实上演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石原于9月27日辞去了作战部部长一职，调到满洲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据说，石原在离开参谋本部时，曾在他担任过课长的战争指导课说：“最终还是被赶走了。”但是，此次调任似乎也是他本人因为没有能够贯彻自己不扩大的方针而提出的要求。

至此，石原在与以武藤、田中为首的扩大派的斗争中失败，离开了陆军中央。

石原离开后，统制派的武藤章（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和与其关系密切的田中新一（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在陆军中央拥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另外，田中新一与统制派的前任作战课课长富永恭次也是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同期毕业生，而且二人曾在同一时期任驻欧武官，一同赴欧，关系相当亲密。此外，富永和同属统制派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联系也非常密切。武藤、田

中、富永、东条四人后来构成了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后日本陆军高层的核心。

不过，石原仍然对参谋本部具有影响力，例如，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课长、多田骏参谋次长等人都是他的势力。由于今井清参谋次长病歿，多田骏于8月14日接任参谋次长一职。多田骏与石原都毕业于仙台幼年学校，另外，石原在担任关东军参谋的后期，多田骏曾作为“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和他一同在满洲任职，两人关系亲密。因此，一般认为，多田骏就任参谋次长一职，与石原的活动有关。此外，石原辞去作战部部长后，扩大派的下村定战史部部长接任了他的职位。

值得一提的是，日中战争爆发之初，永田铁山嫡系的统制派主要成员中，除了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之外，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富永恭次、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作战课课员服部卓四郎、关东军参谋部部员辻政信等许多人都属于扩大派。相反，统制派成员中主张不扩大的，只有中国驻屯军参谋池田纯久、战争指导课课员堀场一雄等少数几个人。在此之后，东条、武藤、富田等扩大派成为统制派的主流。

为了打破上海战场的僵局，参谋本部已经决定向上海增派3个师团。武藤章向上级请求在上海南面的杭州湾登陆，进攻中国军队的背后，同时从华北方面军调遣2个师团投入上海战役。并且，由上海派遣军和杭州湾

登陆部队等组建了华中方面军。其任务与华北方面军相同，即打击中国军队，削弱其抗战意志，抓住机会结束战争。此时，武藤章自己提出担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调离了陆军中央。原来的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调任作战课课长。同时，取消战争指导课，作为战争指导班并入作战课。

1937年11月5日开始的杭州湾登陆作战取得了成功。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最终被迫全面撤退。南京政府最为重视的防线被攻破以后，于11月17日决定迁都四川重庆，但是，仍然表示将继续抗战。虽然上海战役在战术上取得了成功，但并未实现最初削弱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战略目标。

日方在此之后继续向中国增派军队，总共向华北方面派遣了7个师团，向华中方面派遣了9个师团，驻守本土的常设师团只有近卫师团和第七师团（旭川）。另外，为了防备苏联，日军将精锐的常设师团部署在了满洲，上海战役中投入了一部分临时编制的特设师团。特设师团的现役士兵比例少，编制装备也比较差，所以在战斗中伤亡惨重。同时，为了防备苏联，日军采取了逐渐投入兵力的方法，这也是造成上海驻军损失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华北地区，尽管以河内虎四郎为首的参谋本部表明了将军事作战区域限定在河北省的方针，但是，华北方面军违抗参谋本部的指示，不断扩大战线，除了河北

省以外，又向山西省、山东省发动了进攻。参谋本部没有能够对当地驻军采取强硬手段，如前所述，是因为陆军中央内部围绕战争指导方针存在意见分歧。石原辞职后，河边虎四郎作战课课长、多田骏参谋次长仍然对扩大战线持谨慎态度，但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下村定作战部部长等许多幕僚持强硬态度，主张必须扩大战线，直到给中国军队以决定性的打击。

在华中地区，日军控制上海附近以后，华中方面军为了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要求发动追击战，而参谋本部在河边为首的作战课的主导下，把作战区域限定在苏州至嘉兴一线以东。但是，武藤章副参谋长等华中方面军首脑主张继续向南京乘胜追击。参谋本部的下村定作战部部长也承认需要攻下南京。而河边作战课课长、多田骏参谋次长反对扩大作战区域和进攻南京，因此参谋本部内部围绕撤销限制线及进攻南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迫于华中方面军的强烈要求和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等多数陆军中央幕僚的意见，参谋本部同意进攻南京。

这样，从1937年12月3日起，华中方面军的各个部队开始对南京发起进攻。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南京，但由于当时几乎没有做好进攻内陆的战前准备，兵站补给不足，在当地发生多起日军掠夺食物和物资的情况。另外，在此过程中，不仅杀害了许多在战斗中抗战的中国士兵，而且杀害了许多败兵、残兵、俘虏和平民

(南京事件)^①。

河边、多田等人之所以反对进攻南京，有其背景。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正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调停（陶德曼调停），河边、多田考虑在兵临城下的时候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对日本最为有利。

10月1日，正值上海的战斗极其困难的时候，近卫内阁在首相、外相、陆相和海相出席的四相会议上决定，制定一定的媾和条件，争取尽快结束战争。媾和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华北、上海划定非武装地带；承认“满洲国”；签订日中防共协定；批准华北的铁路、矿业及其他日中合资企业；等等。

根据这些媾和条件，广田弘毅外相表示接受各国在日中之间进行和平调停。德国答应调停。德国一方面和日本缔结了《防共协定》，另一方面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德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第三，因此希望日中之间早日实现和平。11月初，广田弘毅向德方提出了以四相会议上的决定内容为基础的和平条件，陶德曼把它直接转达给了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条件。当时，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蒋介石正指望会议结果。但是，虽然会议通过了谴责日本的决议，

^① 即南京大屠杀。

却没有制裁日本，并于11月下旬无限期休会。

在这种情况下，12月初，蒋介石在与陶德曼会谈时暗示在保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前提下，接受以日方的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这是蒋介石在日军突破了上海附近最重要的防线并逼近南京的困境下做出的反应。

陶德曼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把蒋介石的意见转达给了日本政府。但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的1937年12月21日，近卫内阁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修改和平条件，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新的和平条件在原有条件基础上增加了以下条款：在华北、内蒙古建立自治政权；将华中占领区域变为非武装地带；在华北、内蒙古、华中地区驻兵；要求赔偿；等等。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接受的条件，翌年（1938年）1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向日方询问和平条件的具体内容。

在此期间，参谋本部的河边虎四郎作战课课长、多田骏参谋次长等人判断，即使南京沦陷，蒋介石政权也不会垮台。他们认为，出于对苏战备的考虑，应该避免长期战争，因而主张以最初比较宽大的条件与国民政府媾和。但是，近卫内阁和陆军省预测，南京沦陷后，将会削弱蒋介石政权，主张扩大媾和条件甚至停止谈判。一般来说，参谋本部依靠独立统帅权，一般为强硬派，而陆军省则相对谨慎。但在这一时期，陆军省态度强硬，而参谋本部反而比较慎重。

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围绕媾和问题一直进行反复争论。1937年11月下旬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以后，按照近卫文麿的提议，成立了大本营，作为战时和事变的统帅机构。同时，还设立了由大本营和内阁组成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这是国家层面的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机构。

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多田骏参谋次长作为参谋本部的代表，在河边虎四郎作战课课长等人的支持下，反复说明和平的必要性（参谋总长是皇族成员闲宫院，按照惯例不参与决策）。但是，不仅杉山元陆相，而且近卫文麿首相、广田弘毅外相等人也主张对华强硬，多田骏近乎处于孤立境地。

当时陆军省的核心人物由杉山元陆相、梅津美治郎陆军次官、町尻量基军务局局长、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四人组成。町尻量基与田中新一都是一夕会成员。町尻量基在石原调任后出任军务局局长，基本上尊重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的意见（另外，町尻是公家华族，有一定的能力，但可以说是比较温和的类型）。因此，不扩大派的柴田兼四郎军务课课长没有什么影响力，在陆军省内部，主张对华强硬的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杉山元陆相在联络会议上主张对华强硬。

1938年1月15日是日方设定的最后答复期限。当天，日本举行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近卫文麿首相、

杉山元陆相、广田弘毅外相等组成的内阁认为，中方1月13日询问和平条件的具体内容事实上就是拒绝的答复，因而主张停止谈判。对此，多田骏参谋次长一个人坚持反对停止谈判。但是，米内光政海相支持近卫文磨等人的主张，并提到内阁总辞职的可能性，最终多田也只好同意停止谈判。

1月16日，近卫文磨首相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将期待真正值得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陶德曼调停宣告结束，日军此后陷入了旷日持久的长期战争的泥潭。接着，1938年4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电力管理法》等法规 [另外，前一年（1937年）10月，为了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设立了直属内阁的企画院]。

值得一提的是，前一年的12月，当地日本驻军在华北占领区建立了傀儡政权——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接着，在发表近卫声明后的1938年3月，在华中占领区也成立了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另外，同月，成立了“华北开发”和“华中振兴”两家国策公司，以便进行华北、华中的经济开发。这两个国策公司的原材料和当地驻军的所需物资基本上都由当地供应，而且费用都是以傀儡政府滥发的没有实质担保的纸币来支付。可以说，这是占领之下事实上的掠夺经济。

这份近卫声明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国际社会都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在当时构成东亚国际秩序的华盛顿体

图
15
近
卫
文
磨



系中，有关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的《九国公约》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作为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合法政权，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均为绕不开的前提。而日本事实上否认了南京国民政府，表明要求成立新的中央政府。这说明，日本在挑衅以往的东亚国际秩序。这引致后来关于“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占领南京后，当地日军为了消灭华中地区北部的军事要地徐州附近的军队主力，制定了徐州作战方案。它的目的在于连接华北和华中的占领区，南北夹击和消灭徐州附近的军队。但是，以河边虎四郎为首的作战课按照不扩大战线的方针，不同意发动徐州战役。此时出任作战部部长的桥本群也赞同作战课的想法。当地的日军派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前往东京，坚持有必要进行徐州战役，但作战课没有同意。

然而，1938年3月，河边虎四郎被免去作战课课长的职务，由军事课高级课员稻田正纯就任作战课课长。稻田受到属于扩大派的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的影响，作为作战课课长批准了徐州战役。这样，随着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河边虎四郎的免职，陆军省、参谋本部全部由扩大派占据了要职，这些人在陆军中央开始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4月上旬，大本营发动了徐州战役。此时，武藤章似乎在考虑，如果能够歼灭中国主力部队，也许能够抓

住机会结束战争。但中国方面避免决战，而是选择了退却，5月中旬，日军占领徐州，但没有能够给中国的主力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

接着，当地的日军和陆军中央决定向华中的汉口和华南的广州发动进攻，前者位于长江中游流域的军事要地，后者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机构临时设在汉口，而广州则是国民政府主要援助通道——香港通道的一个物资运输据点。当时，日军考虑，如果攻下这两座城市，便能够实质上控制中国的主要城市，以军事手段解决事变。1938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了汉口和广州。但是，已经迁都内陆腹地重庆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抗战，基本上不能指望用武力让国民政府屈服。

截至1938年7月底，日本陆军由34个师团组成，其中，向满洲、朝鲜派遣了9个师团，向华北派遣了9个师团，向华中派遣了14个师团，日本本土只剩下2个师团。而且，派往中国大陆的许多兵力不得不用来维护占领区治安。因此，日军占领汉口、广州以后，主要负责在剩余的广大地区积极进攻的野战军，只有据点设在汉口附近的第十一军（7个多师团，约20万兵力）。

因此，即使野战军攻取了新的重要地区，部队也不得不返回原驻地。于是，中国军队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日本的现有兵力不足以对幅员辽阔的中国实行军事统治。当时担任在华日军要职的武藤章曾经

回忆说：日军的控制只停留在城市、铁路、公路等“线的统治”，并非“作为面”来控制占领地区。而且，当时除了配备精锐部队的满洲之外，在派往中国本土的兵力中，只有大约10%是现役士兵，而90%是预备役和后备役士兵。可以说，随着战线的急速扩大，士兵的质量也出现了脆弱的一面。

这样，日本方面当初尽早解决日中战争的计划，已经几乎没有了可能性。这场战争变成了石原担心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1938年12月上旬，陆军中央决定了新的战争指导方针。其内容是：当前要着眼于维护现有占领地的治安，全力恢复当地的治安和消除残余的抗日势力；不扩大新的占领地，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予以反击，但避免毫无准备地扩大战线。

这一指导方针改变了一直以来“削弱中方的抗战意志，抓住机会结束战争”的作战目标，从持久战的角度把重点转移到了稳定占领区的统治上面。此后，日军基本上一直维持这一方针。

2. 近卫内阁的“东亚新秩序”

声明及反响

在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日中战争无望的情况下，日军

占领汉口、广州后的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称：第一，日中战争的目的在于，日本、“满洲”、中国建设东亚新秩序；第二，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以往的反日政策、刷新其人员组成，日本将不拒绝其参与新秩序的建设。

这份“东亚新秩序”声明显示了日本对国际社会基本立场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之前，日本方面一直宣称，日中战争是对中国方面排日行为的自卫行动，而近卫声明把它重新定位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有田八郎外相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宣称，在东亚不能用事变前适用的观念和原则约束现在及将来的事态。以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一直主张，在尊重“尊重主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原则的基础上，日本对原则的解释和适用见解不同。而在这里改变了以往的主张，认为原则本身存在问题。这事实上否定了以关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门户开放的《九国公约》等为核心的华盛顿体系的原则。而且，“东亚新秩序”声明表明将要建立新的东亚国际秩序，取代华盛顿体系确立的国际秩序。

1938年12月22日的近卫首相谈话阐明了“东亚新秩序”日中合作的内容。谈话中称，基本理念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但具体的实际内容则是：要求中国允许日本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军；在华北和内蒙古

为日本开发资源积极提供方便；等等。

近卫谈话的依据是1938年11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它的内容如下：首先，为了促进日中提携，允许日军在华北、内蒙古驻兵；驻兵地区的铁路、航空、通信、主要港口航道的监督权归日方所有。此外，对于华北、内蒙古的资源，为日方提供特殊的方便。这些是对中方提出的核心要求。

除此之外，日本还要求：新中国的政治形态不是现行的国民政府那样的中央集权制，而是采取“分治合作主义”，即自治政权联合体的形式；在其他地区，对于特定的资源，也要给日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中方赔偿日方在战争中的损失。而且，谈话认为，由于日中提携，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权益受到“限制”理所当然。

这些政策着眼于日本确保华北、内蒙古的资源和驻兵，另外，还意在限制列国的在华权益和经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政策内容明显违背以往华盛顿体系中的尊重主权、机会均等原则。另外，可以说，它改变了一直以来的尊重列国既得权益的原则（实际上，这后来导致了限制长江上的自由航行权、日本船只垄断华中占领区的内河航行以及翌年6月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等事件）。

这种方针是以稻田正纯为首的作战课起草的。基本内容没有本质上的修改，便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获

得通过。

另外，“东亚新秩序”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满足一定的条件，将不拒绝其参与建设新秩序。这一内容修改了先前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但它的条件是《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中说明的条件，而且包含拥立国民政府内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新政权，取代蒋介石政权之意。这即扶植在国民政府内长期与蒋介石争夺主导权的汪兆铭。其目的是，通过政治活动，建立以汪兆铭为首的新政权，推翻蒋介石政权，从而解决事变。然后，在新政权下，合并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培育一个新的中央政府。

通过影佐祯昭军务课课长的暗中活动逃出重庆的汪兆铭，以接受近卫首相谈话的形式，向中国各方面发出了“和平通电”。然而，事与愿违，赞成的只有极少数人，反蒋介石派的军队没有任何行动。最终，日方的企图受挫，近卫内阁和陆军中央通过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解决日中战争的设想落空。

此外，近年来，东亚共同体论作为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当时的东亚共同体论支持了近卫文磨依据《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提出的“东亚新秩序”，这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它包括向华北、内蒙古驻兵和确保资源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武藤章认为，日中战争本质上是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的“民族运动”的冲突，是

“大和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斗争”。这也包括日本声称它的大陆政策的目的在于实现东亚新秩序之后的形势。如前所述，日本陆军内部的认是：尽管有“五族协和”这种“崇高的”指导精神，但是，构成“东亚新秩序”的“满洲国”“客观上、本质上”，是“大和民族统治满蒙”。同样，日中战争也被视为日本和中国的“民族斗争”，尤其如后所述，“日、满、华北、蒙疆”被定位为“大和民族的自卫生活圈”。因此，日本想要在这些地区建立的“东亚新秩序”，尽管宣传共存共荣这种“道义上的理念”，但在真实的自我认识上，可以说，是日本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

另外，这种批判华盛顿体系的“东亚新秩序”论，效仿了纳粹德国宣称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欧洲新秩序”口号。但是，如后所述，对陆军中央来说，这并不直接意味着日本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将与德国合作。同样，否定华盛顿体系的原则，也未必代表日本打算在军事上与美英两国对立。永田、东条、武藤、田中等人都当过驻德武官，可以说，他们对德国抱有同情，但对他们来说，这与国策层面的问题不是一个层次的事情。

这样，日中战争陷入了长期的持久战，此后也没有能够找到有效的打破僵局的办法，战局一直处于胶着状态。

在这种状况下，1939年9月30日，武藤章回到陆军中央，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同年9月13日，同

属统制派的富永恭次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这样，永田嫡系的统制派掌控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实际业务的最高职位。

在此之前，1937年7月日中战争开始以来，与武藤章、富永恭次关系密切的田中新一一直担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这也是陆军省内掌握实权的要职。从1939年2月起，与田中新一关系密切的岩畔豪雄开始担任军事课课长，而此人也属于统制派。另外，1938年6月，统制派的影佐祯昭就任军务局军务课课长，取代了石原派的柴山兼四郎，这是仅次于军事课长的要职。从1939年3月起，统制派的有末精三担任军务课课长，他与东条、武藤关系密切。另外，石原派的河边虎四郎于1938年3月调出后，受田中新一影响的稻田正纯开始任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而他也同样是统制派。

这样，河边等石原派幕僚调出以后，统制派一直占据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课长一级的要职。而且，二二六事件以后排除了宇垣派、皇道派，随着石原派的解体，陆军中央的政治团体只剩下了统制派。所以，统制派在陆军中央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统制派掌握的只是课长级及以下的职位，未必具备可以控制陆军中央的能力。因此，我们也不能轻视业务型高级幕僚的发言权。

但是，随着武藤章和富永恭次分别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和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统制派在陆军中央开始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不言而喻，武藤和富永的就任是

因为陆军中央中统制派幕僚的推动。在这样的体制下，1940年7月，统制派中最年长的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

武藤章就任军务局局长、富永恭次就任作战部部长后，包括继富永之后出任作战部部长的田中新一在内，这些人开始领导陆军中央。此后，担任军事课课长的真田穰一郎、西浦进也属于统制派。军务课课长先后由与武藤关系密切的统制派的河村参郎、与东条关系密切的佐藤贤了等人担任。而作战课课长一职，在统制派的稻田之后，经过两位非统制派的实务型幕僚，先后由统制派的服部卓四郎和真田穰一郎担任。这样，不仅军务局局长和作战部部长，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三个主要课长职位也基本上被统制派占据。

不过，稻田正纯之后的两名非统制派的作战课课长冈田重一和土居明夫均属土佐派，同一时期的参谋次长泽田茂也是土佐派。一般认为，泽田茂就任参谋次长是同属土佐派的陆军次长山胁正隆在卸任之前推举的。据推测，任命冈田、土居担任作战课课长有辅佐泽田茂的含意。但是，他们并没有作为具有独自政策的政治团体开展活动的迹象，陆军中央的实权掌握在统制派的手中。

就在不久之前（武藤就任军务局局长以前），近卫文磨首相在《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后的1938年5月至6月对内阁进行了改组。新任命的内阁成员包括：石原

派的板垣征四郎任陆相；原陆相宇垣一成任外相；皇道派的荒木贞夫任文相。它的主要目的是，压制陆军中央的统制派幕僚，缓和对华关系，尽早结束日中战争。

陆军中央反对任命板垣为陆相的方案，但由于近卫文麿的强烈要求，并有可能发展成内阁总辞职，最终，他们接受了这个方案。由于近卫文麿首相在国民中拥有较高的声望，而且积极寻求打破现状，对陆军中央来说，正是所需要的人物，而且比较容易控制。但是，他们让统制派的东条英机担任了陆军次官，所以，板垣征四郎没有能够起到压制统制派幕僚的作用，此后陆军的内外方针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另外，当时陆军的方针由陆军首脑和各课长、高级课员一级的人员组成的“官邸会议”决定。在这里，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影佐祯昭军务课课长、稻田正纯作战课课长等统制派幕僚拥有比较大的发言权。这反映在陆军内外方针的延续性上。

另外，宇垣外相也因反对设立将会削减外务省一部分权限的对华中央机构的方案，在就任四个月之后便宣布辞职。这样，在这一方面，改组内阁的目标也没有实现。经过这一系列变动之后，近卫内阁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

那么，在日中战争陷入胶着状态时，为什么陆军中央没有像太平洋战争时那样进行全面的军事动员，大幅增强战力，进攻重庆，强制进行彻底的对华军事作战呢？当时的动员人数不足 100 万，而太平洋战争后半期

超过了400万人。

这是因为，对于他们统制派幕僚来说，日中战争并不是要全面统治中国，它本来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为了防备下一次世界大战，确保战争所需的军需资源和经济权益。自从永田铁山提出构想以来，统制派一直继承对中国的这种定位。他们考虑的是对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应对问题。例如，当时，稻田正纯作战课课长等参谋本部的人预测，下一次世界大战将发生在1942年前后，并且认识到，处理日中战争和备战下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国防的两大任务。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在宣布重整军备、进驻莱茵兰地区之后，继续军事介入西班牙内战，并于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之后，德国要求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捷克发布动员令，坚决抵抗德国侵略，而英法两国表示支持捷克的抵抗运动。德国与这三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同年9月，由于英法两国在慕尼黑会议上采取绥靖政策，暂时避免了战争危机，但欧洲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正在变为现实。

在这样的欧洲形势下，日本陆军中央的统制派幕僚认为，在处理日中战争时，需要保留相当的实力。考虑到应对下一次世界大战，陆军必须保持军事上的灵活性，保存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另外，为了防备苏联介入日中战争时日本与苏联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也有必要保存一定的实力。

另一方面，对于近卫内阁的“东亚新秩序”声明（1938年11月3日），不仅中国国民政府，而且美英两国政府也强烈反对。1938年12月28日，蒋介石批评称：“东亚新秩序”是日本企图对中国实行军事统治，消灭中国文化，垄断东亚经济的阴谋。美国政府于12月30日通告日本：美国难以承认无视机会均等原则的中国新秩序，提出强硬抗议。英国政府也于1939年1月14日发布了対日备忘录：按照《九国公约》的精神，不能容忍日本通过武力将中国置于附属国地位。另外，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4000万美元借款，英国政府也设立了1000万英镑的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同时还提供了500万英镑（2300万美元）的政府担保。此后，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时，美国又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借款；同年12月，英国也向中国提供了1000万英镑（4600万美元）的借款。

在此之前，美国曾经多次谴责日本的在华行动，比如，罗斯福总统曾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但是，美国实际上一直没有进行具体的对日制裁和援助中国，而是希望实现日美和平。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美国对日出口额大约占对华出口额的将近7倍。英国也忙于应对危险的欧洲形势，为了维持自身的在华权益，不得不对日本的行动采取妥协。

但是，以“东亚新秩序”声明为契机，美英两国开始采取对抗日本的行动，在财政上援助中国。值得一

提的是，苏联在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于翌年8月向中国提供了大约1亿美元的借款及各类武器和军用物资，并派遣了军事顾问团。1939年6月，又与中国签订了提供1.5亿美元的对华援助协议。苏联为了让日军的矛头不指向本国，积极支持中国继续对日抗战。但是，签订后述的《日苏中立条约》后，苏联的对华援助急剧减少。

另一方面，1938年8月，德国向日本提出了缔结针对苏联和英法两国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方案。同年2月，希特勒解除了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的职务，更换了外交部部长纽赖特（里宾特洛甫就任），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德国改变了以往的亲华政策，转向加强对日合作。5月，德国承认“满洲国”，并禁止向中国出口军火和军用物资。7月，从国民政府撤走了军事顾问团。德国希望通过拉拢日本，在防备对苏战争的同时，让日本起到从背后牵制英国的作用，因为英国在亚洲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这是德国向日本提出缔结三国同盟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已经于前一年承认“满洲国”，加入《日德防共协定》，同时退出了国联。

日本陆军考虑与德国缔结只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而与意大利只是缔结牵制英国的秘密协定。因为陆军判断，在日中战争长期拖延的情况下，需要防范苏联军事介入，通过强化与德国的关系牵制苏联。

但是，德国坚持要求建立针对英、法、苏三国的

军事同盟。陆军担心不能建立同盟，但为了牵制苏联，最终接受了德国的方案。但是，外务省和海军强烈反对建立针对英法两国的同盟，翌年（1939年）1月，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内阁内部产生分歧，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

随后的平沼骐一郎内阁也在三国同盟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1939年4月，德国外相里宾特洛甫警告称，如果日本对建立同盟犹豫不决，德国有可能会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5月，德意两国签署军事同盟协议。陆军担心苏联介入日中战争，需要牵制苏联，因而急于缔结三国同盟，但依然不能获得外务省和海军的同意，在内阁会议上一直争执不休。在此期间，发生了诺门坎事件。在7月开始的战斗中，关东军部队惨败给远东苏军。对于陆军中央来说，扩充对苏战备和加强德国对苏联的牵制再次成为紧迫的问题。

然而，1939年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于是，平沼内阁决定停止三国同盟的谈判，并宣布内阁总辞职。对陆军来说，三国同盟也失去了意义。

接着，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

在这样的情况下，9月30日武藤章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在担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之后，又回到了陆军中央。另外，正如后述那

样，武藤章对于政治、战争策略有相当明确的整体构想。而同一时期领导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并无独立的构想，因此，武藤在短期内主导了陆军中央的基本政治、战争策略。

就任军务局局长之前、担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时期，武藤曾经处理的重要问题中，便有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的问题。天津市是当时华北最大的贸易港口，这里的英法租界集中了主要的金融、商业机构，是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

以武藤章为首的当地驻军认为，英法租界享有独立的自治行政权，已经成为共产党游击队和国民党军游击队在华北的根据地。另外，他们还认为，英法租界严重阻碍了当地驻军对华北地区的经济统治。

日军把实质上在其控制之下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货币“联银券”确定为唯一的法定货币，企图把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法币”驱逐出华北地区。它试图通过发行货币，让华北经济圈脱离国民政府，并加以操控。联银券和法币分别与日元和英镑挂钩。但是，在不受日军管辖的英法租界，法币依然是法定货币，联银券几乎没有渗透进去。因此，租界外也仍然流通法币，以英法租界为节点，一直存在连接华北和华中、华南地区的法币交易圈。英法租界成为日方对华北经济实行统治的一个障碍。

因此，1939年6月，以武藤章为首的华北方面军高

层试图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使其脱离华北经济，同时封锁抗日活动。武藤章认为，英法租界不仅是“独立国家”，是抗日活动的根据地，而且阻碍了联银券的流通，严重影响华北经济的发展。

英国政府为了应对紧迫的欧洲局势，力图避免与日本发生纠纷，因此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与日本的问题。首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举行了会谈。1939年7月23日，英国方面同意停止一切在华妨碍日军的行为，对日本做出大幅让步。中国国民政府认为，这意味着英国实质上承认了日本对占领区的控制，因而向英国提出了强烈抗议。

然而，三天后的7月26日，美国政府突然通告日本政府，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罗斯福总统认为，日本在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后，又强迫英国做出让步，事态重大，因而采取了这种警告措施。美国通告日本废除通商条约，表示美国从六个月之后（条约失效日期）开始，可以随时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在美国的支持下，在随后举行的东京日英谈判中，英国政府改变了态度。这一次谈判由双方的在华代表团进行直接谈判。英国在取缔租界内的抗日组织等维持治安方面做出了让步，但在货币问题上，拒绝了日方强行禁止法币在租界内流通的要求。英国主张，需要与美法两国进行协商，没有做出让步。8月20日，谈判无限

期延期。

当时，武藤章作为在华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参加了谈判。1939年8月14日，武藤章发表了谈话，措辞强烈地批评英国：“英国的态度是玩弄‘两面外交’，蓄意拖延，企图让第三国介入。”之后，返回北京。此后，一直到翌年6月，日军一直封锁租界。

封锁天津英法租界问题，对于之后的日本陆军来说，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日军意识到，英国直接妨碍了日本确保华北的资源和对市场的统治。这不只是华北地区，而且对日本统治华中、华南的占领区也是如此。当然，对于武藤来说，也是一样。因此，武藤章出任军务局局长后，对英国一贯采取强硬态度。

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当然引起了与列强各国的在华权益、机会均等原则的摩擦。但是，日本与英国的利益冲突尤为突出，因为英国在中国拥有庞大的既得利益和经济影响力。

第二，美国政府，尤其是罗斯福总统等人重视英国的态度明朗化。关于美国为何重视英国，我们将在后面阐述，而这一点有可能对日本来说具有重大的影响。

当时，日本的许多重要物资都依赖于从美国进口，比如75%的石油、49%的钢铁、54%的机械等。这些物资当然也用于日中战争。随着美国通告废除《日美通商

航海条约》，美国政府可能断绝供应这些战略性的重要物资已经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而且，这并非由于日美关系发生直接的摩擦，而是由于日英关系的恶化而显露出来的问题。这对于今后日美关系来说，暗示了一个重大问题。

第七章

欧洲大战与日德意三国同盟

——武藤章出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



图 16 日、德、意签订同盟条约（读卖新闻社供图）

1.《综合国策方案》的制定与建设 “大东亚新秩序”

1939年9月30日武藤章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后，对于在欧洲爆发的大战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早在开战后的同年9月4日，阿部信行内阁就发表了不介入欧洲大战的声明。当时的陆军中央也是以局部解决（日中两国之间）日中战争为基本目标，而对欧洲大战采取保持“中立态度”的方针。在武藤章就任军务局局长后，军务局的核心成员是：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军事课高级课员西浦进、军务课课长有末精三、军务课高级课员永井八津次等人。包括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富永恭次在内，统制派掌控了陆军中央的实权（永井与西浦一样，是永田嫡系的统制派）。此外，有末精三不久后调任，由与武藤章关系密切的统制派的河村参郎就任军务课课长。

武藤章认为，在坚持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基础上，建设国内体制即建立“国防国家体制”和尽早解决日中战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武藤章所说的“国防国家”，指的是从“平时”开始建设面向“国家总体战”的体制，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举国一致态势的国家。换言之，就是按照战争目

的，组织和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全部力量，能够在“有事”时立即发挥“综合国力”的国家。所谓建立国防国家体制，具体内容就是建设一个这样的国家体系。它可以说继承了前面提到的永田铁山等人编制的陆军手册《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中的思想，主张平时建立起国家总动员的体制。

按照武藤的观点，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战国时代”，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战场”。列强都在竞相建立国防国家体制。在这样的“世界趋势”下，日本不可能置身局外，袖手旁观，因此必须尽快向建设国防国家体制“迈进”。也就是说，为了应对欧洲大战爆发后世界形势的发展，需要尽早建立国防国家体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武藤并不把日中战争时期视为战时，而是视为平时。对于当时的武藤来说，建立国防国家体制而防备的“战时”（“有事”），指的是进入与欧洲列强正式战争的事态。

虽然武藤对于欧洲大战采取当前不介入的态度，但并不是前面所述的石原莞尔那样的绝对不介入。他认为，现在战争只停留在欧洲附近，但迟早会变成一场世界大战，日本也必须决定何去何从。针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趋势，日本为了确保行动的自由，不仅要建立国防国家体制，而且必须尽快解决日中战争。

这是因为，他考虑，当时日本在中国大陆投入了大约 85 万兵力进行日中战争，如果这样下去，日本将难

图
17
武
藤
章



以进行与欧美列强的正式战争。因此，需要缩减在华兵力，恢复作战能力的伸缩性和灵活性，确保国防的后备力量。为此，尽快解决日中战争，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确保军需资源的开发和驻军，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因此，武藤等人采取了两项举措。第一，他试图与重庆国民政府直接谈判，寻求日中和平。武藤在日中战争开始时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武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但是，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转战华北、华中时，目睹中国方面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态度，由此对军事解决的可能性感到了怀疑。后来，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他开始希望尽早和平解决日中战争。但是，前面围绕汪兆铭的活动（“梅工作”）让汪兆铭逃出了重庆，但事与愿违，支持者寥寥无几，事实上以失败告终。因此，他认为，以汪兆铭为首的新中央政府基础脆弱，有必要与蒋介石为首的重庆政府直接谈判。这就是所谓的“桐工作”。

第二，武藤等人主张，不论与蒋介石的谈判成功与否，都要实施撤军，以削减驻华日军。他们试图由此确保兵力部署的灵活性，使之能够应对世界大战，同时筹措军队装备机械化等需要的扩军经费。特别是在诺门罕战役中，暴露了日军的装备问题，让陆军中央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

一些面向大众的历史书的观点是，日本陆军南进，最终发展到对美开战，是由于难以解决日中战争，日本

为了打破僵局而做出的决策。但是，武藤等人根本的问题意识，本来即在于如何应对下一次世界大战，而尽快解决日中战争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前面也说到，对于他们来说，日中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主要是企图确保中国的军需资源，以防备下一次世界大战。

确实，作为当前的问题，解决日中战争受到了重视，而且，南进的一个目的也是切断援蒋通道（法属印度支那通道、缅甸通道）。但是，南进并不只是这个目的，正如后述那样，它是一个“幌子”。日本是为了建立准备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防国家体制，而试图形成一个包括整个东南亚在内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圈。

此外，武藤就任军务局局长后不久，受畑俊六陆相的委托，邀请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直接入阁，但被断然拒绝，让他丢了面子。但是，不久之后，阿部内阁宣布总辞职，海军出身的米内光政组成了新的内阁。

关于建设国防国家的问题，武藤首先着手制定作为基本计划的综合国策案。1940年初，他作为军务局局长责令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军务课课长河村参郎负责起草。岩畔等人与企划院的秋永月三（陆军大佐）、国策研究会常任理事矢次一夫（陆军省顾问）等人合作，拟定了草案。当时，还秘密动员了各省主张革新的官僚。

当时，武藤认为，尽管陆军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缺少领导国策的“确实的政策”。武藤的心

腹、军务课内政班班长石井秋穗也认为：“日本政治的中心……〔已经〕在陆军。但是，陆军没有具体的政策”。武藤企图以这个综合国策案作为陆军的基本政策。

1940年6月中旬，武藤等人按照这份草案，编写了《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作为军务局的参考方案。它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要点如下。

(1) 作为最高国策，在日本、“满洲”、中国结合下，建设“包容大东亚的合作经济圈”，以期充实和发展国力。其基调置于“东亚新秩序”，谋求强化“日满华”结合。尤其是，把“日、满、华北、蒙疆”建设成为“大和民族的自卫生活圈”；

(2) 为了执行这个国策，扩充必要的陆海军军备；

(3) 对欧洲战争，维持不介入方针；

(4) 对于中国，谋求扶植和发展亲日政权，通过日中经济合作，按照“日满中”经济综合计划，开发重要产业；

(5) 在内政方面，确立适应新事态的“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建立“全国性的国民总动员组织”。与此同时，为了发展而解散现有政党。另外，为了扩充生产力，让现有的经济机构适应计划经济，强化国家统制。

除此之外，还谈到了对华政策以外的外交方针，关于这些内容我们将在后面阐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日本、“满洲”、华北、内蒙古被作为“大和民族”的“自卫生活圈”。以之为轴，设想形成基于“日满

华”构成的“东亚新秩序”和“包容大东亚的合作经济圈”的三重结构的地域圈。华北、内蒙古被定位为日本的自卫生活圈。它继承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后的近卫谈话中要求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军以及确保资源的内容。这一点为后来日本坚持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军，埋下了伏笔。

另外，从资源的自给自足等观点出发，不仅东亚，而且包括东南亚等在内的地区都被作为“合作经济圈”，表明了获得南方资源的企图。日本要从东南亚获得的必要资源主要有石油、生橡胶、锡、镍、磷、铝土矿（铝的原料）等。日本建设“合作经济圈”是为了摆脱依赖美英的经济现状，因为当时美英集团占据了日本进出口之大部分。而对南洋的政策，则是永田铁山等人的《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中没有表明的论点，反而是前文提到的石原莞尔的《国防国策大纲》包含的内容。这种“合作经济圈”的主张，随着欧洲战况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日本划定“大东亚生存圈”和以武力侵占南洋。

不过，早在广田弘毅内阁和阿部信行内阁时期，日本已经把目光投向南洋的资源。但是，像这样把包括整个东南亚的地区全部划为日本的自给自足经济圈，而且把它的建设确定为日本的最高国策，尚属首次。

第二，它明确提出，为了执行国策，要确立“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创立“全国性的国民总动员组织”。

这与原首相近卫文麿的亲信成立新党的运动相结合，通过积极推动所谓的近卫新体制运动，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它的企图是由亲军的政党确立一党独裁，后来演变成通过近卫新党的政治领导力实现“一国一党”下新体制的行动。

这种观点也是在永田铁山处没有明确看到过的。据推测，它是受到了纳粹和苏联一党独裁制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继承了石原“一党独裁”的主张。虽然武藤是公认的永田铁山的继承人，但是，也许可以说，他也受到了石原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他与石原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例如，对东南亚的视角、一党独裁论等。

此外，纳粹的一党独裁是众所周知的，而关于苏联共产党，武藤通过庄司健吉（陆军主计军官^①）等渠道也得到了情报。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局长时，曾经命令庄司健吉驻苏两年。回国后，庄司历任企画院调查官、军务局办事员，还曾经为与武藤章关系密切的矢次一夫等人的“国策研究会”提供合作。

关于苏联的国家体制和共产党，庄司曾经这样指出：苏联的国家体制是能够按照“国家意志”推动全部经济机构的机制，虽然它也有经济上效率低的缺点，但是它能够按照“国家的政策目的”，最有效地发挥

^① 主计军官，后勤会计人员。

“国力”。在这里，共产党作为“独裁”的“国家统治者”统治全国，而且掌握一切“物质方面的权力”。武藤章与庄司一直保持联系，所以二人应该具有相同的认识。

1940年3月左右，近卫的亲信开始了建立“近卫新党”的活动。5月下旬，近卫文磨、木户幸一、有马赖宁三人聚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新党的备忘录》。备忘录中约定，以近卫首相的设想为基础，以解散现有政党为前提，组建新党，阁僚由新党任命。此外，5月10日，德国开始向西进攻荷兰、比利时，还有法国。

6月上旬，武藤军务局局长称，全军赞成近卫出马和组建新党，并将暗中支持。这意味着，他设想把近卫新党当作《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的“强大的政治领导力”。而且，他还作为常任理事参与策划了于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的8月下旬成立的新体制准备委员会。对于武藤来说，这是为了组建具有“强大政治领导力”的亲军的新党。

在此期间，有人批评，新党就是制约天皇统治权的幕府。遭到这种批评以后，近卫文磨产生了动摇，开始对组建新党变得消极。但是，武藤章坚决主张“集结有力的政治实践体”，试图推动建设“一国一党”，亦即“一党独裁”的新体制。他企图创建一个作为“具有有力的政治力量的组织”的“党”，通过它的“有力的领

导”，建立面向国家总体战的新的政治体制。此外，《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还称，为了发展将解散现有政党，以创建全民性的总动员组织。

但是，近卫文麿及其亲信担心被批评为幕府，最终放弃了成立新党。1940年9月下旬，近卫内阁在内阁会议上决定设置大政翼赞会，作为补充行政的精神运动组织。10月中旬，大政翼赞会正式成立。

这样，最初打算建立新党的新体制运动宣告结束，最终诞生了不具有政治领导力的大政翼赞会。武藤等人所希望的树立亲军的“强大政治领导力”这一目标最终没有实现。

近卫文麿希望模仿纳粹德国的欧洲新秩序，实现东亚新秩序，创建一党独裁的新党，并成为它的政治领导人。虽然他认为这个新党能够领导陆军，但是对于不具备独立的政治基础的近卫文麿来说，必须依靠陆军的合作。因此，虽然他认为陆军想把自己当作傀儡，但他也不得不依靠陆军的力量。但是，当有人批评一国一党的新党是幕府时，近卫自己变得左右摇摆，最终放弃了创建新党。

陆军中央企图通过亲军的新党实行一党独裁，从而实现陆军希望的国策。而且，只有近卫文麿能够胜任党首一职。这是因为他在国民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并且有打破现状的态度，对于陆军来说，比较容易控制。因此，在近卫文麿被批评为幕府而产生动摇时，武藤章一

直坚持推动他创建一个能够“集结政治力量”的、有力的新党，作为国民组织的核心。但是，最终，由于近卫变心，9月下旬，武藤章等人创建亲军新党的计划宣告失败。

不过，武藤章等人的《综合国策十年计划》本身在第二次近卫内阁组阁后（1940年7月26日）内阁会议通过的《基本国策要纲》中得到了反映。

这个《基本国策要纲》的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设以“日满华”的结合为根本的“大东亚新秩序”；

（2）鉴于国内外的新形势，以“发挥综合国力的国防国家体制”为基础，扩充必要的军备；

（3）在内政方面，确立“有力的新政治体制”，谋求国政的综合统一；

（4）以日本为中心，按照“日满华”三国自主建设的原则，确立国防经济的根基。

这些内容沿袭了第二次近卫内阁组阁之前武藤直接交给近卫文麿的《综合国策基本要纲》。这份《综合国策基本要纲》是在米内内阁末期的7月上旬至中旬，作为新内阁的政治纲领，由武藤等人根据《综合国策十年计划》拟定的一份文件。

不过，从《综合国策十年计划》到《综合国策基本要纲》有一个变化。前者中的不介入欧洲战争方针，在后者中改为需要“再检讨”“与执行国策步调一致的

国家合作”。不过，这个部分没有包含在内阁会议通过的《基本国策要纲》中。这个修改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关系到外交方针，因此需要重新研究。前者中把“日、满、华北、蒙疆”定位为“大和民族的自卫生活圈”的表述在后者中被删除，这也许是因为文件的性质。因为前者是一种内部文件，而后者则是将被作为近卫内阁的官方政治纲要。此外，前者中的“包容大东亚的合作经济圈”的表述在后者中变成了“大东亚新秩序”。

其次，武藤等人把尽早解决日中战争与建设国防国家一起列为当前面临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他们推动了通过与重庆政府的直接谈判，寻求日中和平的活动（桐工作）。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坚持继续抗战，此项工作最终也宣告失败。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兆铭政权，11月日本政府（近卫内阁）承认其为合法的中国政府，并签订了“日华基本条约”。但是，它的实际控制地区几乎只是日军的占领区，完全是一个傀儡政权。此后，日本通过各种渠道策划汪兆铭政权与重庆政权合并，以实现日中和平，但都没有成功。

另外，关于削减在华驻军的问题，陆军中央最初考虑分阶段把在华兵力从85万减少到50万。但是，当地日军制定了进攻位于长江上游的宜昌的计划，反而要求增派兵力。对于陆军中央来说，宜昌是重庆物资补给的战略要地，如果日军占领宜昌，将对正在进行的与重庆

的和平活动从侧面施加压力的意义。因此，1940年5月，陆军中央批准了当地军队的增兵要求，决定先增派2个师团，然后年内削减大约10万兵力。此后，日军占领了宜昌，但和平活动几乎毫无进展，最终被迫停止。另外，随着德国开始向西进攻，欧洲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与此同时，陆军中央也开始把关心转向向南方行使武力的问题。

那么，武藤等陆军中央的对外政策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已经谈过了他们的对华政策，而在《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阐述了对欧美列强的政策。

首先，关于苏联，必须扩充对苏战备，在完成充分的战备之前，谋求调整邦交，努力“维持和平状态”。可以说，不论将来如何，当前要谋求稳定与苏联的关系。

对美国的方针是，防止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扩充日本的经济力量，摆脱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这与形成“包容大东亚的合作经济圈”、建立自给自足体制，乃是表里的关系。

关于英国，《计划》则明确表示，“要从远东赶走英国和英派势力”。不过，它指出，采取具体行动时，需要审时度势。另外，对英政策与对美政策有“微妙的关联性”，需要注意英美两国的关系。在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从远东赶走英国势力的强硬方针，这一点值得注意。这不仅是因为英国在中国拥有最大的权益，而且是

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支持者。

武藤等人认为，英国的支持是中方抗日姿态的有力支撑。另外，从封锁天津英法租界可以看出，英国一直在阻碍日本控制华北经济以至中国经济。因此，赶走英国在整个中国的势力，是这个时候武藤等人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而且，从美国由于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而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可以清楚地了解，武藤等人会警惕对英关系将影响到对美关系。

关于德国和意大利，只是简单地提及，表示要注视欧洲形势的发展，“保持原来的友好关系”。如前面所述，《防共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从背后牵制苏联，防止苏联介入日中战争，并非企图在下一世界大战中与德意两国合作。

此外，《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的“合作经济圈”的范围不仅包括东亚和东南亚，而且包括西伯利亚东部、澳大利亚和印度。在这些地区中，东亚以外的地区都被定位为“日满华”经济合作中缺乏资源的“补给圈”。这个“合作经济圈”的范围也为后来的“大东亚生存圈”“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所继承。

2. 对南方行使武力论与 德英战争的走向

这个《综合国策十年计划》篇幅相当长，一直到1940年6月中旬才完成，历时长达四五个月。因此，它并未反映1940年5月10日德军开始向西进攻后英军自5月27日开始从敦刻尔克撤退、6月14日德军攻陷巴黎这些欧洲形势。接着，6月22日，法国最终向德国投降。

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武藤等陆军中央于7月3日重新制定了《随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要纲》。这个文件阐述了当时陆军中央全面的战略方针，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纲》中，首先表明了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日中战争，同时努力抓住“良机”“解决南方问题”的方针。当时，关于“向南方行使武力”的政策是，尽可能只针对英国，进攻香港和英属马来半岛等地。另外，它指出，要采取措施努力“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它明确提出了以英属马来半岛等为主要目标向南方行使武力，而且站在了所谓英美分离的观点上。也就是说，限定只攻击英国，根据情

况，可以避免美国的军事介入。

而所谓行使武力的“良机”，它设想的是德军攻下英国本土，即英国战败。因此，日本向南方行使武力是企图抓住这种国际形势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始构建作为国策的自给自足的“合作经济圈”“大东亚新秩序”。占领英属殖民地乃是其中的一环。因此，它的定位可以说是日本为了实行国策（建设“合作经济圈”“大东亚新秩序”）而发动的侵略性的行使武力，而不是出于自卫。

不过，武藤等人也认识到，即使说英美可以分离，两国也有可能联合行动，就像美国由于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问题而通告日本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一样；因此，根据事态发展的情况，也有可能对美开战，并指出有必要为此做好“准备”。

但是，既然陆军中央明知英美两国的密切关系，此时为什么认为有可能只限定攻击英国呢？为什么判断英美两国可以分离呢？

他们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德军在英国本土登陆，英国崩溃，那么美国政府在未做好战争准备和孤立主义的国内舆论下，将会失去军事介入南方的机会。另外，如果英国本国崩溃，美国不惜与日本战争而进行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很小。

此外，关于荷属东印度（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文件中也说，应该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获得石

油等重要资源。同时，文件中设想了通过外交难以达到目的时，根据情况，也可能行使武力。

这是因为，虽然荷属东印度的宗主国荷兰已经被德军占领，但荷兰政府本身逃亡到了英国，依然存在，因此荷属东印度当局也有可能与英国合作，不愿给日本提供资源。可以说，尽管日本行使武力的对象尽量限定为英属殖民地，但为了确保石油等资源，日本也考虑根据荷属东印度的应对情况，可能行使武力。

不过，如果日本发动武力攻击，荷属东印度当局有可能彻底毁坏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石油设施。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恢复石油生产，估计需要两三年时间。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日本打算优先进行谈判（不过，太平洋战争开战时，日本通过空降部队发动偷袭，基本上毫无损地夺取了巨港等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设施）。

关于法属印度支那，文件称，要切断援蒋行动，同时让其允许日军补给、通过部队、使用机场。另外，它也暗示了行使武力。这是为了封锁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物资补给通道和进攻英属新加坡、荷属东印度。援蒋通道的问题，被视为切断美英等国的援蒋行动，从而迫使重庆政府屈服的一个手段。但是，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定位，不仅仅是为了切断援蒋通道，还是作为攻击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等地区的基地。另外，为了解决南方问题，日本要“强化与德意的政治同盟”，同时谋求“与苏联邦交的飞跃性调整”。按照负责人员和附件的

说明，这一点具体设想的是对南方行使武力时与德国、意大利建立军事同盟，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6月中旬完成的《综合国策十年计划》称，关于与德意两国的关系，日本将维持以往的友好关系，但在这里，变成了将要建立军事同盟。这也是前述《综合国策基本要纲》中“与执行国策步调一致的国家合作”的具体内容。另外，有一点刚才没有提到，在《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称，关于与苏联的关系，应该抑制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主张。但在这里，开始考虑签订条约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武藤等人在6月中旬的时候，以不介入欧洲战争方针为前提，主张与欧洲形势保持距离，可以说，是企图保持行动自由。而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加入德意两国阵营，并积极稳定对苏关系的方针。很明显，这是为了进攻英属殖民地、荷属东印度，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

这是想利用大英帝国崩溃的机会，一举夺取南方的英属殖民地，进而荷属东印度，建设日本自给自足的“合作经济圈”。为此，日本要与进攻英国本土的德国建立密切的关系，相互理解，同时确保稳定北面与苏联的关系。

这份陆军中央的《随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要纲》，经过与海军方面协商——对基本内容几乎没有做改动，就作为陆海军方案，于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的

1940年7月27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获得通过。海军方面只是做了局部修改，例如，避免写入向南方行使武力的具体地区名称之类的内容。

该陆海军方案刚拟成，1940年7月22日，陆海军首脑即举行会谈，就方案的内容交换了意见。会上，武藤章做了发言。他说：“德国和意大利提议建立军事同盟时，[日本]要接受”。但是，海军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日本与这两国应该停留于政治同盟，军事同盟仅仅是考虑。另外，武藤认为“对英即是对美”，他表示，陆军在处理对英关系时，也要慎重考虑对美关系。

此外，当时的理解是，对法属印度支那行使武力是“以处理支那事变为幌子”。也就是说，以解决日中战争为名，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有一部分人认为，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完全是为了解决日中战争，也就是切断援蒋通道。但是，它说起来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如刚才提到的那样，它同时也是为了向英属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等南方发展势力，即建设“合作经济圈”、建设“大东亚新秩序”。

武藤在这个时候这样论述道：

当今世界处于历史的“一大过渡期”，“维持现状国家”和“打破现状国家”的斗争将会产生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的国策在于，建设“以日满华为核心的大东亚生

存圈”。这就是“解放”遭受外国压迫，在“奴隶境遇”中呻吟的“所有东亚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实现“大东亚的自力更生”。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必须确立“国防国家体制”。欧洲战争中德国发动闪电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早已建立了国防国家体制。构建这种国防国家体制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形成“自给自足经济体制”。为此，日本不仅要关注中国，而且要关注“南方”。日本正在为了建立“大东亚生存圈”，进行一场“圣战”，要把整个地区从“白人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拯救”出来。另外，德国正在不断征服欧洲强国，一举埋葬大英帝国。这样，维持现状国家和打破现状国家的斗争正处于东西呼应、火花四溅的状态。

这里，“合作经济圈”改成了“大东亚生存圈”，后来又变成了“大东亚共荣圈”。另外，它强调，为了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日本有必要向南方发展，并将“南进”策略定位为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必须采取的政策。进而，它把日本和德意两国视为打破现状国家，认为这三个国家与美英等维持现状国家，在东西方都处于对立的状态。

此外，武藤章认为，把“大东亚生存圈”中包含的各个民族从“白人帝国主义”下的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是日本的使命。这是当时在普通民众中散布的言

论，也是战后谈到的太平洋战争历史性质的一面。但是，当时的军务局的内部资料对此表示怀疑：凭日本的国力，能否供应中国四亿人，加上南方一亿人需要的产品？尤其是这些资料指出，日本在南方占领区获取军需资源，会产生单方面的“经济榨取”，即掠夺资源。也就是说，由于日本的国力不足以生产和出口工业产品作为从南方进口资源的报酬，因此，将只能成为单方面的掠夺经济。这是军队内部真正的认识，武藤也完全知道这一点。

陆军中央曾经用“五族协和”等“崇高的目的”和“高尚的领导精神”宣扬日本的满蒙政策，但它认识到其“客观的本质”是“大和民族统治满蒙”。另外，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时，一方面提出日中共存共荣建立新秩序的理念，另一方面把华北、内蒙古当作“大和民族的自卫生活圈”，正式决定了要求驻兵和确保资源的方针。这里也一样，一面声称从白人帝国主义的奴隶境遇中解放亚洲各民族，一面明确认识到它实质上是掠夺资源。这些作为陆军本身的理念和本质（实质）的自我认识，是值得我们思考和不容忽视的地方。

此外，1943年5月，日本政府（东条英机内阁）秘密决定把原英属马来半岛、新加坡、原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作为重要资源的供应地纳为日本的领土。这件事在同年11月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上也没

有公布。这是因为它违背“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

在陆海军拟定的《随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纲要》方案的附件中，还有这样的内容：目标在1940年8月底完成解决南方问题的准备工作。这是因为，当时日本设想德国在这个时候会攻下英国本土。实际上，从1940年6月下旬法国投降前后开始，德国已经可以使用法国空军基地，并且从7月中旬正式开始对英国发动空袭。德国和英国的空军在英国本土上空展开了激战，双方发生了大规模的空战（德英空战因被拍成电影《不列颠之战》而闻名）。不过，此后德国未能掌握制空权，9月17日，德国决定推迟英国本土登陆战役。10月12日，希特勒正式下令将进攻英国（“海狮计划”）推迟至来年春天。一般人理解，日本陆军认为美英可以分离，而海军一贯认为美英不可分离。但是，至少在陆海军对《随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纲要》方案达成一致并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通过的7月下旬，陆海军都认为美英是可以分离的。

但是，德国推迟在英国本土登陆作战的计划以后，日本海军明确提出了英美不可分离的立场。他们的主张是，德国推迟对英国本土的进攻，德英陷入长期战争之后，美国将会不可避免地军事介入与英国发生的战争，因此，英美两国绝对不可分离。对于海军来说，英美可分离的条件是，德国通过短期战争攻下英国本土。海军判断，随着德英战争陷入长期战争，从以往的英美关系

和美国的世界战略来看，对英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变为对美战争。

对此，陆军中央在德国推迟登陆作战后，仍然坚持英美可分离的看法。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可以再次发动登陆作战。

此外，陆军起草《随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纲要》时，米内内阁对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持消极态度，而且陆军希望的国内体制建设进展也不顺利。因此，陆军中央为了推动建立近卫新党的计划，让畑俊六陆相辞职，并拒绝其推荐后任，迫使米内内阁总辞职。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文磨内阁成立。

另一方面，在德国决定推迟登陆作战后的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由此，日本政府（近卫内阁）明确地站在了德国和意大利一边，正式参与欧洲战争。

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并不是陆军主导的，而是在近卫首相的支持下，由松冈洋右外相主导进行的。但是，陆军中央也同意建立三国同盟。如刚才提到的那样，陆军中央判断，对南方行使武力时，需要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另一方面，松冈考虑通过日、德、意三国同盟加上苏联阻止美国参战。这就把与德意的军事同盟和对南方行使武力结合起来。这一点未必与武藤等人最初的意图一致。而且，松冈考虑的是针对英美的军事同盟，而武藤等人则不想刺激美国，只想停留

在针对英国的军事同盟。但是，两者在阻止美国参战的方向上是一致的。继缔结三国同盟之后，松冈又于翌年4月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对此武藤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他认为，通过缔结三国同盟和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将会有效地阻止美国参战。

三国同盟成立后，武藤对日本面临的国际形势，阐述了如下认识。

日德意三国合作，正在颠覆英美法等国统治的“旧的世界秩序”，建设“世界的新秩序”。当今，英美的反日态度日趋尖锐，两国正在密切合作，策划进攻日本。它们企图把苏联拉进英美阵营，援助重庆政府，使其继续抗日。另外，它们还唆使泰国、荷属东印度对抗日本。

苏联虽然在英美和日德意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是，日本必须在与德意两国合作下，尽量让苏联与轴心国一方合作。当然，日本也不能忘记警惕苏联对全世界的赤化宣传。但是，日本必须构建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并且必须获得南方资源。因此，日本必须调整与苏联的关系，暂时与苏联合作，以便向南方发展。另外，苏联的对华援助具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切断苏联的对华援助，也需要调整与苏联的关系。

日本必须通过这样的三国同盟和与苏联合作，尽可能让美国反省。而且，日本需要以公平、妥当的态度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虽然日本自己并不打算与美国进行战争，但必须做好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断然与之对抗的准备。美国现在正在推动建设国防国家体制，军费达到了大约150亿日元，这是日本无法想象的。而且，事态绝对不容乐观。一旦处理不好，也有可能“在太平洋上发生日美战争，给世界人类带来悲惨的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行“建设大东亚”的国策，必须建立国防国家体制，有力地执行国策。

也就是说，武藤考虑通过日、德、意结成三国同盟和与苏联合作，给美国施加压力，从而阻止美国参战，避免日美战争，实现建设“大东亚生存圈”的目标。武藤在陆军省局长会议上发言称，三国同盟的目的不是发动日美战争，而是为了彻底地避免与美国的战争。这是因为，武藤也不希望，发生了欧洲战争之后，再发生国力悬殊的日美战争，而且，他也不希望“给世界人类带来悲惨的后果”。但是，如后所述，武藤的这种期待在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两个月之后，由于1941年6月爆发德苏战争而落空。

在日德意缔结三国同盟之前的1940年9月23日，日军开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陆军早就企图切断作

为援蒋通道之一的法属印度支那这条通道。法国宣布向德国投降（求和）的第二天，6月18日，在畑俊六陆军相的要求下，米内光政内阁要求法国政府（贝当政权）停止援蒋行为。日军占领广州、切断香港通道以后，法属印度支那通道成为最重要的援蒋通道，经由法属印度支那的援蒋物资大约占到了全部援蒋物资的一半。来自苏联和美国的援助物资也通过法属印度支那通道进行运输。剩下的援蒋物资中，缅甸（缅甸当时为英属）通道占30%，苏联的援助物资还从苏联边境，通过经兰州的新疆通道运输到中国。

法国接受日本的要求后，日方派进了监视团，并进一步向法属印度支那要求，允许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由于当地的谈判进展不畅，因此，从1940年8月1日开始，近卫内阁的松冈外相与法国驻日大使举行谈判，30日签订了法国允许日军进驻和使用空军基地等的协议。这份协议的内容，依据的是以武藤为首的陆军中央拟制、于1940年7月27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获得批准的《随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要纲》。

然而，此时发生了日军部队擅自越境事件，当地的谈判陷入停滞。日本派遣了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赴当地指导，而富永恭次试图强行实施武力进驻。9月22日，日本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达成协议，进入了商定细节的协商阶段。但是，9月23日，当地日军又

擅自越境，与法军进入交战状态。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25日。而其间，本来就持强硬态度的富永恭次并没有制止当地军队武力进驻。

由于此次事件，富永恭次被撤掉作战部部长职务。10月10日，田中新一就任作战部部长。此后，陆军的构想和政策一直由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和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二人掌控。担任陆相的东条英机，由于长期离开陆军中央，并没有独自的构想，而主要是由武藤章和田中新一制定政策，他做出最终决定。但是，不久以后，在统制派内部，以武藤章为首的军务局与以田中新一为首的参谋本部作战部之间，围绕世界战略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富永恭次被撤掉作战部部长一职前后，塚田攻取代泽田茂担任参谋次长，杉山元取代闲院宫担任参谋总长。不过，富永恭次于翌年4月恢复了陆军中央要职，担任陆军省人事局局长。这是因为，在统制派中富永与东条英机关系尤其密切。

另外，关于英国援蒋的缅甸通道，日本政府在法国战败后的1940年6月下旬，也要求英国政府封锁这条通道。7月12日，在德国进攻英国本土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只得接受对缅甸通道封锁三个月。

此外，在《随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要纲》中，为了加强对国内的领导，促进国防国家建设，提出了实行强权政治、昂扬国民精神、统一国内舆论等要求。陆

军中央根据这份文件，于7月下旬制定了《关于国内指导的具体要目》，内容包括：建立全国性的国民总动员组织；解散现有政党；同时，进行企业的整合和确立经营者任免权；进而，禁止和限制言论、结社、集会等；压制对国策的批评等内容。可以说，它的意图在于，不仅要对政治、经济，还要对包括取缔言论、集会在内的国民生活本身实施严格的管制。

第八章

渐进的南进方针与德苏战争的冲击

——田中新一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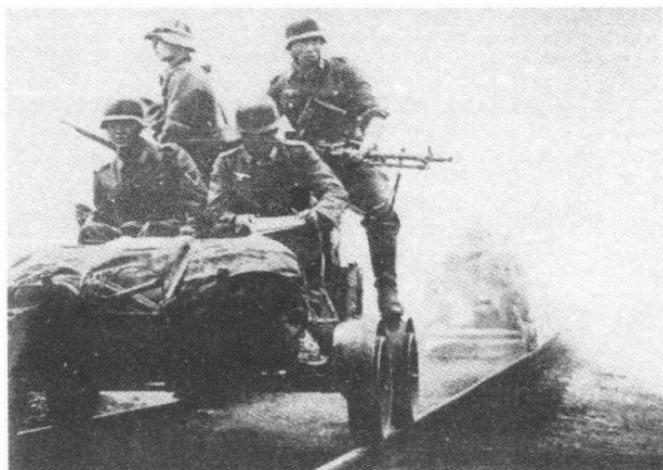


图 17 德苏战争。1943 年，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国侦察兵（读卖新闻社供图）

1. 从英美可分离到英美不可分离

1940年10月10日田中新一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后，根据陆军省的提案等文件，亲自起草了《支那事变处理要纲》。10月23日，经参谋本部、陆军省同意，成为陆军的方案。

它的基本方针是：通过制止英美的援蒋行动、调整对苏关系等一切手段，迫使重庆政权屈服；使国内外的体制适应在华“长期大规模持久战”，同时，为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恢复和增强国防力量的弹性；充分利用日德意三国同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它把解决日中战争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作为课题，要求为此恢复国防的弹性。

当时，以田中新一认为，迫使重庆政府屈服是“次要的”。若“全面解决东亚问题”，日中战争会“自然”得到解决。所谓“全面解决东亚问题”，意思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它的目标是，通过对南方行使武力（与英国、荷兰的战争），构建摆脱经济上依赖美英的自给自足经济圈。他的设想是，不单独解决日中战争，而是通过向南方行使武力，形成大东亚经济圈，从而处理日中战争。此处还暗示了为此要恢复国防的弹性，亦即削减在华兵力等。

根据战后的回忆，当时田中的想法是：“单独解决支那事变几乎无望。支那事变，唯有作为综合欧亚的国际大变局〔世界大战〕的一环，才有望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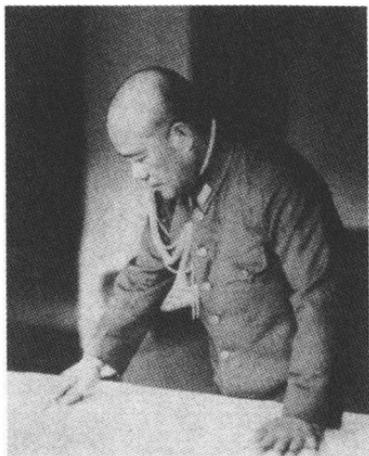
该《支那事变处理要纲》后来经过陆海军讨论，基本上没有做大的修改，就在1940年11月13日的御前会议上被正式批准。

翌年1月，以田中新一为首的作战部拟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要纲》，并得到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非正式批准。其要旨如下：第一，抓住机会，行使武力，解决南方问题，确立自给自足的体制，为此，做好作战准备，首先把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作为基础地区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第二，对北方（苏联），暂时采取保持安宁的方针，组建满洲和朝鲜14个师团。

也就是说，基本内容是伺机对南方行使武力和保持北方安宁，与《时局处理要纲》基本上是一样的方针。

不过，这份《纲要》中，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被当作基础地区受到重视。田中新一把占领这两个地区作为南方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这里提出的这个观点导引出了后述的渐进性地、分阶段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式。另外，由此可见，即使在德国推迟对英国的本土登陆作战后的这个阶段，作战部也依然坚持伺机向南方扩张的主张。田中自己认为，翌年的春季至夏季，德国将进攻英国本土，欧洲战局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图
18
田
中
新
一



引发与英美两国的战争，因此对实施这个计划持慎重态度。其间，4月，日苏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日美按照《日美谅解方案》开始谈判，6月，德苏战争爆发。

“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称谓前一年8月在松冈外相谈话中首次使用，而在重要的官方文件上首次出现，则是在这份《对法印、泰施策要纲》中。在此之前的表述有“包容大东亚的合作经济圈”“大东亚生存圈”“大东亚新秩序”。此后，基本上统一为“大东亚共荣圈”或者“大东亚新秩序”。

早在1941年2月上旬，陆军省、参谋本部就拟定了《对南方施策要纲》，并提示了海军方面。其要点是：对南方政策的目的在于，确立日本的自给自足经济体制；遇到英国崩溃等良机或者遭到美英全面禁运时，行使武力；努力分离英美两国，把战争对手限定为英国和荷兰。

这份陆军方案仍然站在英美可分离的立场上。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德国将再次实施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然而，海军方面判断，英美绝对不可分离，对南方行使武力就是对美开战，因而不同意陆军方案，并明确提出了英美不可分离的立场。

此后，陆海军继续协商，4月17日《对南方施策要纲》海陆军方案制成。6月6日，陆海军正式批准了该方案。该方案起草时正是日美谈判开始之前，而正式

必要时，行使武力；与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签订包括修筑空军基地、利用港口设施、进驻日军等内容的军事合作协定。

可以说，该纲要提出了渐进性地、分阶段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式。它明确了将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方针作为第一阶段的内容。它还明确表示，可以行使武力。其意图不仅在于确保资源，还包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和在该地建设包括空军基地在内的军事设施。这是因为，在介入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之间的边境纠纷过程中，日本与泰国的关系军事上也已经变得非常密切，而且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已经结束。

这个时候，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被确定为日本构建的“大东亚共荣圈”中橡胶、锡、磷、钨等军需资源的第一补给圈。另外，法属印度支那被作为日本南进的军事基地，也备受重视。

在这个决策过程中，田中新一认为，应该在1941年3月底之前正式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是因为，他预料从春季至夏季，欧洲战局将随着德国进攻英国而发生巨大变化，因此需要在3月底进驻，以应对七八月的新形势，而且做出决定以后，准备进驻需要一个月，修建机场需要两三个月。

武藤章也同样主张以3月底为目标。但是，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松冈外相的同意，因而一直到7月都没有得到实施。松冈认为，现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将会

田中为首的作战部在起草《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要纲》的同时，还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在这一计划中，提出了如下策略：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谋求解决日中战争；驻华日军削减到大约 50 万人；不再扩大在华的占领区，作战后回到原来的驻地。

这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单独解决日中战争，而企图通过更宏大的国际关系的变化，即欧洲大战的趋势、与苏联调整关系、向南方行使武力等手段处理日中战争问题。另外，它还意味着将大幅度削减当时大约 75 万在华日军，以确保国防力量的弹性。田中与武藤一样认为，需要削减中国派遣军。这是因为，如何应对世界大战是统制派幕僚共同的首要课题。这份《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经陆军省、参谋本部正式批准后上奏给了天皇。

虽然《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要纲》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份文件都是由以田中新一为首的参谋本部拟定的，但是以武藤章为首的陆军省也表示了同意。因此，可以说，武藤章与田中新一对其内容并没有大的意见分歧。

另外，1941 年 1 月 30 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通过了《对法印、泰施策要纲》。这是由陆军省、参谋本部起草，经海军同意的文件。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过程中，与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之间建立军事、政治、经济上的融合关系，为此，

批准正值德苏战争爆发前夕。在思考到此后日本的轨迹时，这个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内容如下。

(1) 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过程中，日本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之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建立融合的关系。另外，在日本与荷属东印度之间要建立紧密的经济关系；

(2) 这些均通过外交手段以期实现。尤其要尽快建立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的军事融合关系；

(3) 在实行上述政策时，如果发生如下事态，将行使武力以“自存自卫”：英、美、荷等对日禁运时，或者美国等对日本加强包围态势，国防上不能容许时；

(4) 英国确实崩溃时，努力通过对荷属东印度采取外交手段等，达到目的；

这里，表明了两大方针。其一，作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阶梯，谋求通过外交手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

前一年（1940年）7月制定的《时局处理要纲》制定的方针是，捕捉良机，通过武力攻击英属殖民地，一举解决南方问题。可以说，它是想通过武力，直接实现大部分“大东亚共荣圈”的构建。而在这份《对南方施策要纲》中，继承了《对法印、泰施策要纲》的内容，表明了分阶段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第一个阶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方针。但是，与同样考虑行使武力的《对法印、泰施策要纲》不同，它试图通

过外交手段和平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而关于荷属东印度，原则上也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密切经济关系。

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那样，这与当时英美不可分离的看法已经明确成为陆海军共同的认识有关。为了避免刺激英美两国，试图不通过行使武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对于荷属东印度，也企图通过外交谈判，确保能够给日本供应必要的资源。不过，日本抓紧与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建立军事融合关系，因而重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和修建军事基地，以便向南方占领英属、荷属殖民地。

其二，是把向南方行使武力只限于“自存自卫”。方针不再坚持《时局处理要纲》中英美可分离的主张，陆军和海军都站在了英美不可分离的认识上。因此，对南方英属殖民地发动军事攻击立即意味着对美战争，因而不可能对南方英属殖民地行使武力，以避免美国参战。它放弃了伺机行使武力，只有在“自存自卫”的情况下才行使武力。行使武力亦即意味发动与英美的战争。而且，所谓的“自存自卫”的情况，设想的是英、美、荷等国对日采取禁运措施，或者在军事上构建对日包围态势，在国防上对日本形成威胁的时候。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日禁运措施方面，美国已经对全部军需物资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开始实施对日禁运废铁和航空汽油。

这不仅是海军方面的认识和判断，而且，田中新

一、武藤章等陆军方面也同意这种观点。1941年2月的陆军方案至4月的陆海军方案期间，美国在3月颁布了《租借法》，明确表示将向英国提供大规模的武器援助。此外，从5月起，《租借法》也开始适用于中国。

另外，美国政府表示，如果英国在与德国的战争中战败，将丧失大西洋的制海权，对美国自身的安全带来重大的影响。美国认为，如果纳粹德国统治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全部欧洲，它的影响力也会波及南美洲，直接威胁美国，因此对此高度警惕。而且，英国战败后，德国将获取英国的工业力量和海军力量，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军事威胁。

从这种观点出发，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包括军事方面将全面支持英国。

这个时候，罗斯福总统命令美国海军对于运输对英援助物资的美国商船加强保护。由海军护送商船，当然也设想到了开火行为。这包含了美国直接与德国交战的可能性，被视为美国决心参战。进而，4月12日，美军进驻丹麦属格陵兰岛。从这些也可以看出，美国为了防止英国战败将对德宣战。

也就是说，日本陆军也已经看到，英美已经是不可分离的状态。实际上，从1941年1月底开始，英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了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3月底签订协议，制定了英美共同的统一战略。

3月中旬至下旬，日本陆军省战备课课长冈田菊三

郎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各方报告了关于物资方面的国力情况。报告称，如果是两年左右的短期战争，可以向南方行使武力，但如果与英美发生长期战争，将无法保证物资供应。总之，除非决心对美开战，目前南进只能在不会与英美发生战争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从后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引发美国对日全面禁运，日本开始对南方行使武力并发动与英美的战争这个过程来看，可以说，这份《对南方施策要纲》具有极其暗示性的内容。

不过，陆海军拟定《对南方施策要纲》方案的第二天，1941年4月18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国内发来了《日美谅解方案》的电报。当时是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的5天之后，德苏开战的两个月前。《日美谅解方案》试图签订全面的协议，以恢复日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它包括如下内容。

(1) 关于日中战争，以中国独立、日军按照日中之间的协定撤军、蒋介石和汪兆铭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等为条件，美国总统劝告蒋介石政权和平解决；

(2) 日本保证不以武力实施南进，美国对日本获取必要资源给予合作；

(3) 签订新日美通商条约，使两国的通商关系正常化。

这份《日美谅解方案》是由美国天主教神父华尔什和德劳特、产业公会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前陆军

省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等人拟定的一份非官方的协定方案。华尔什和德劳特经邮政部部长天主教徒沃克的介绍，与赫尔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也进行了接触，而井川忠雄与近卫文磨则交情甚笃。岩畔是从陆军省派遣到美国辅助野村大使的。另外，在方案拟定过程中，日本驻美大使馆、美国国务院等也曾间接参与。

4月16日，赫尔国务卿和野村大使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赫尔以保证领土完整和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机会均等、不改变太平洋现状这“四项原则”表明了美国的基本态度。在此基础上，赫尔称，美国不受《日美谅解方案》约束，但可以作为两国开始谈判的基础。

4月18日，野村大使把《日美谅解方案》用电报发给本国，但当时并没有提到赫尔提出的四项原则。这件事给后来的日美谈判带来了不少混乱。

关于《日美谅解方案》，近卫首相为首的内阁和海军认为，日本可以接受，持欢迎态度。不过，松冈外相当时正在访问德国和苏联，不在国内。

武藤章也表示欢迎，认为它会缓和日美之间的紧张局面，有助于解决日中战争。在战后的回忆中，他也说，这是“应该非常满意的事”，当时觉得这样“日本得救了”。

这是因为，如前所述，武藤章认为需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但他希望尽早解决日中战争，避免日美战

争。关于从中国撤军的条款，他也认为，《方案》规定将按照日中间的协定，而撤军的时间和范围，视协定的内容可以有各种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把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派往美国，也是武藤章的主张。不过，军务局对于字面上没有保证在华北等地驻兵，抱有不安。这是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对于武藤等人来说，确保华北的资源和在华北驻兵对确保日本的“自卫生活圈”必不可少。

田中作战部部长认为，《日美谅解方案》基本上是美国为了对德宣战在“争取时间”。另外，与武藤不同，田中判断，在这个阶段与美国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这是因为，美国已经决心与德国战争，它迟早会发展为日美战争。日本为了“国防的独立自主”，需要资源上实现自给自足，必须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但是，这必然与美国的太平洋政策——以《九国公约》体系为核心的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发生正面冲突。因此，美国将绝对不容许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他的意见是：在对美开战之前，最好利用日美谈判，解决日中战争，进一步谋求获取南方的大量战略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田中也欢迎《日美谅解方案》，尽管他与武藤立足于不同的观点。因此，东条英机等陆军中的许多人也反应相同。

武藤也同样主张为了建设国防国家，需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但是，他根据国力悬殊和战备课课长对

国家物资状况的判断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极其危险，应该避免。因此，他试图通过三国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阻止美国参战和军事介入，同时当前通过外交手段，谋求南进。

例如，1941年5月上旬至中旬，陆军研究了美国对德宣战时日本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当时，田中作战部部长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美国对德宣战已经“不可避免”，今后一切的处置都必须以美国参战为“前提”。有必要尽可能在美国参战前，让美国切断对华援助。日美谈判要以此为目的。如果美国参战，就按照三国同盟，向德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援助。另外，与德意合作，赶走英国在新加坡以西的南亚的势力。进一步，进攻英属新加坡（对英战争）应“见机行事”，对美宣战应“视状况而定”。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对德宣战，日本将不仅向德国和意大利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援助，而且还考虑进攻英属新加坡和对美开战。

此后，德美关系恶化。6月，德国和意大利的在美资产被美国冻结。

另一方面，武藤章本来把三国同盟设想为针对英国的军事同盟，而且他主张应该尽量避免对美战争。因此，正如前述那样，他认为，三国同盟的目的不是日美

服，或者发展成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但是，无论怎样，如果事情解决了，日本有可能再次遭到美、英、苏、中四国夹击。另外，绝对不介入的中立政策也只能说是空想。因此，日本当前只能在轴心国阵营中实行国策。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田中新一对是与德意两国合作还是与美英合作进行了反省，然后才按照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最终选择了维持与德意合作。

一般认为，对于昭和陆军来说，与德国的结盟从初始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方针，但实际上未必是这样。例如，1939年8月《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町尻量基（一夕会成员）便重新研究了是与德意苏三国联合，或是与美英两国联合，还是走自己独自的道路。当时，陆军自己试图推动强化《日德防共协定》，但由于德国与苏联接近而被迫搁置，开始与德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如此，昭和陆军对于与德国关系的考虑未必是固定不变的。他们一直同时考虑与美英两国合作等其他道路，但是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做出了最终的选择。在进行日美谈判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愈加具有深刻和决定性的意义。武藤军务局局长也被迫重新考虑。

另一方面，军务局接到德苏即将开战的情报后认为，德苏战争以德国的胜利在短期内结束的可能性很小，将会发展成长期的持久战。因为苏联拥有辽阔的领

国”。另外，美国不承认日军驻兵，要求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太平洋地区适用非歧视待遇原则，否定了“东亚新秩序”。进而，美国事实上要求日本退出三国同盟。由于军务局并不知道赫尔提出的四项原则，因此，他们对美国的修订方案与《日美谅解方案》大相径庭的内容非常吃惊。

2. 德苏战争与武藤、田中的分歧

但是，1941年6月22日，随着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德苏战争正式爆发。早在大约两周前的6月6日，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便给日本国内传递了德苏即将开战的情报，政府、陆军已经在忙于应对这种新的局势。

围绕日本对德苏战争的对策，陆军中央内部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田中新一在6月9日、10日召开的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上提出了如下主张：在北方，良机必定会到来。在南方，不论良机是否到来，日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与英美的战争。因此，无论如何，有必要下定决心行使武力。

当时，田中新一特别对与苏联的战争显示了积极的态度。他对苏联持强硬的意见，认为应该“人为地捕捉”良机，对苏联发动进攻。所谓人为地捕捉良机，意

意味着实际上不论是否有良机，即使故意制造良机，也要发动与苏联的战争。另外，所谓在北方的良机，如后所述，指的是德国进攻苏联后，苏联短期内全面崩溃。

田中认为，如果德国和苏联发生战争，英、美、苏三国势力会加强合作，美国将会全力援助英国和苏联。另外，美、英、荷等国家会对日本实行经济压迫。因此，日本必须尽快完全占领作为第一补给圈的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以防备美英在西太平洋的行动。尤其是，需要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必要的兵力，作为对英属马来半岛、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发动进攻的基地。如果法属印度支那不同意进驻，便应该对法属印度支那行使武力。

另外，德国进攻苏联后，有可能德国在几个月内就会获得胜利，同时斯大林政权就会崩溃。虽然苏联也有可能采取撤退战略，使德苏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即便如此，苏联也会失去列宁格勒、莫斯科、巴库油田等地方，国力大幅度下降。因此，日本需要不失时机地对苏联行使武力，解决北方的问题。也就是说，日本应该利用德苏战争的机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同时对北方行使武力。

田中认为，如果苏联屈服，将会消除日本来自北方的威胁，同时还会挫败英国继续与德国战争的意志。英国已经成为日本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大障碍。如果打倒英国，日本对南方行使武力便会变得轻而易举

举。另外，日本没有了北方的威胁，将会对美国从太平洋方面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具有从背后牵制美国对德宣战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一年7月，希特勒在与陆海军首脑的会谈中，就进攻对苏的必要性，进行了如下发言。

英国的希望是俄国和美国。如果对俄国的希望消失了，对美国的希望也将会消失。这是因为，如果俄罗斯掉队了，将会显著提升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俄罗斯是英国和美国在东亚摆在日本面前的一把刀，是英国最抱期望的因素。打倒了俄罗斯，也就夺去了英国最后的希望。

也就是说，发动与苏联的战争是挫败英国战争意志的一种手段，而且苏联的崩溃将会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使日本获得行动的自由。而这会成为对美国的威胁，使美国难以站在英国一方参战。

此外，有趣的是，这个时候，田中对日本国策的方向应该是与德意轴心国结成同盟，还是应该与美英合作，再次进行了研究。

在田中看来，日本正在面临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是维持“三国轴心”，还是转变国策“与美英亲善”。如果退出轴心国，而与美英两国建立友好关系，也许日中两国会走向和平，然后，德意两国屈

战争，而是彻底“避免”日美战争。另外，应该利用三国同盟，阻止英美对重庆的援助、推动调整日苏关系，进而通过外交手段向南方发展。因此，他对于美国对德宣战时日本立即参加德国一方持消极态度，认为只有静观事态发展。

如后所述，两者这种想法上的差异，随着德苏战争的爆发而公开化，对此后日本的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在接到《日美谅解方案》电报五天前，1941年4月13日，松冈外相在莫斯科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虽然德国方面曾经警告德苏之间有隔阂，但是松冈考虑通过三国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在陆军内部也有人做出这样的解释：正因为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才使得美国在《日美谅解方案》上做出了让步。

但是，松冈外相回国后，对于在自己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拟定《日美谅解方案》感到不快，5月12日，拟定了自己的修订方案，并提交给美国方面。它的宗旨是：美国的作用仅限于劝和，而不让美国参与日中之间和平条件的具体内容。

对此，6月21日，美国方面提出了修订方案。它的内容从日本方面来看，是难以接受的。这是因为，美国修订方案暗示，日中谈判的对手不是汪兆铭政权，而只能是蒋介石政权（重庆政府），间接地否认了“满洲

土、丰富的资源及一党专制的、强韧的政治组织，所以苏联不会轻易屈服。

武藤章认为，苏联不会短期内战败。从德苏双方的国力和苏联辽阔的领土来看，德苏战争将会成为一场国家总体战，必然走向长期化。因此，他认为，希特勒对英国本土再次发动登陆作战的计划将会无限期推迟，英国不大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崩溃。因此，他对德苏战争的态度是：只能静观事态，关注形势发展。

按照这样的预测，军务局内部关于如何应对德苏战争，大致确定了如下方针。当前，先观望形势，如果德苏战争出现对于日本极为有利的状况，则对苏联发动进攻，一举击溃苏联，从而解决北方问题；如果德国使苏联屈服后继续进攻英国，而且胜局已定，那么日本应该越过法属印度支那，武力入侵南方要地，将它们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不过，这样的方针全部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基本的观点是，一边静观事态，一边注视形势的变化。武藤认为，在此期间，日本应该通过日美谈判，推动调整与美国的关系，进而利用与美国的关系促进日中战争的解决。因此，武藤自己全力以赴推动日美谈判，并对在北方行使武力持否定态度，反对后述田中新一等人对苏开战的主张。

不过，武藤章也认为，为了建设国防国家，需要形成一个“大东亚共同体”，日本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迅

速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泰国和确保资源。因此，他虽然警惕英美在西太平洋的行动，但对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并不持否定态度。军务局内部反而也有人强烈主张，应该趁德国与苏联发生战争、北方暂时没有威胁，积极入侵南方。不过，武藤章同时也考虑到，法属印度支那将会成为日本进攻英属、荷属殖民地的据点，而有可能招致英美的反弹。因此，他认为，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而关于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他也与田中新一持不同意见，对行使武力持慎重态度。

另一方面，田中新一也并非只设想了德苏战争短期内结束这一种情况，他也考虑到这场战争发展为持久战的情况。他考虑，如果苏联在短期内出现崩溃的征兆，那么，日本有必要乘机对苏开战。另外，即使战争陷入了持久战，也应该暂且等待时机，抓住战况中“极微的机会”进攻苏联，必须确保对北方“行使武力的自由”。

具体来说，即使德国不能短期内击败苏联，战争陷入持久战，也要视远东苏军的动向，或向苏联发动进攻。如果有参战的机会，则德军和日军分别从东西夹击苏联，彻底摧毁苏联军队的抵抗能力。田中新一希望通过积极配合德国发动的对苏战争，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从而解除北面苏联的威胁。日军为此而做的准备，就是后述的“关东军特种演习”。

此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对德苏开战后的国策方案，协调了意见。1941年6月14日，两者达成一致意见，制定了《随形势变化的国防国策大纲》。其主要内容如下。

即使德苏开战，日本也要推进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政策，确保该经济圈。如果轴心国阵营胜利在望，则向南方行使武力。如果德苏战争的形势对日本极为有利，则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也即，除非德苏战争对日本极为有利，也就是德国胜局已定的时候，日本才会进攻苏联。另外，向南方行使武力设想的也是轴心国阵营胜局已定，也就是德国短期内让苏联屈服，而且攻下英国的时候。也就是说，参谋本部作战部所主张的向北方行使武力、向南方行使武力，都限定在陆军省军务局也同意的情况下，这才达成了一致意见。

武藤章等人基本上也认为，德苏战争将会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如果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苏联迅速崩溃，那么他们也并不反对进攻苏联。这是因为武藤章自己在日中战争期间，也一直担心和警惕苏联军事介入，而这将是解除北方威胁的绝好机会。另外，关于向南方行使武力，他认为，如果苏联、英国在德国的进攻下相继崩溃，国际形势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也不会轻易对西太平洋进行军事介入。这是因为，它不仅背后受到德国

牵制，而且德国统治整个欧洲以后，美国将会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因此，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参与欧洲的战斗，那么，即使日本进攻新加坡，也不会引起与美国的战争。如果国际形势这样发展，对于武藤章为首的军务局来说，是极符合期望的。不过，武藤章等人判断，德国难以在短期内战胜苏联，事情不会那么顺利。但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于推进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政策，亦即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持一致意见。

陆军拟定《随形势变化的国防国策大纲》方案后，与海军进行了协商。1941年6月22日德苏开战。6月24日，形成了陆海军《随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要纲》，确定了如下几个“方针”。

(1) 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

(2) 向处理日中战争迈进，同时，为了奠定自存自卫的基础，加快向南方发展的步伐，另外，根据形势的变化，解决北方问题。

在这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被列为首要的国策，为此明确提出了处理日中战争，同时向南方发展和解决北方问题的方针。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个“要领”。

(1) 为了促使蒋介石政权屈服，从南方各个地区增强压力；

(2) 在自存自卫上，推进对南方要地的各项政策。为此，做好对美英战争的准备，执行对法属印度支那和

泰国的各种政策，强化向南方发展的态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惜对美英开战；

(3) 对于德苏战争，以三国同盟的精神为基调，但暂时不介入，暗中做好对苏战争的准备，自主应对。如果德苏战争的形势对日本极为有利，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4) 向北方行使武力不能影响保持对英美战争的基本态势；

(5) 极力防止美国参战，但如果美国参战，将按照三国同盟行动。不过，行使武力应自主决定。

也就是说，日本现在不介入德苏战争，但是做好对苏战备。如果战况对日本极为有利，便向北方行使武力。这些内容基本上与陆军拟定的《随形势变化的国防国策大纲》方案完全相同。在陆军方面看来，海军对进攻苏联持消极态度，但害怕陆军从南方收手，因此，海军以保持面向南方政策的、准备与英美交战的基本态度作为条件，同意了陆军的方案。

根据田中新一回忆，陆军和海军在执行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政策上是一致的。另外，田中强烈主张进攻苏联，但海军方面则对此比较慎重。与武藤章等人一样，海军方面认为，只有苏联短期崩溃的情况下，日本才可以向苏联发动进攻。海军还认为，目前尚不具备武力入侵南方的条件。而田中则认为，随着德苏开战，日本自存自卫的威胁急剧增大，因此，应该同样下定决心

向南方行使武力。实际上，他只是原则性地同意强化南进的态势，但海军方面却第一次提出了“不惜对美英开战”这样强烈的措辞。不过，海军此时并未决心对美开战，海军的言辞是针对进攻苏联主张的一种均衡。

这份陆海军的《随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要纲》经大本营政府联络恳谈会讨论后，1941年7月2日大本营联络会议作为御前会议召开了，会上基本上按原样正式通过了这个方案。这个方案为此后日本的道路确定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样，日本政府正式批准了关注德苏战争的动向、做好对苏动武准备的方针。以田中为首的作战部开始增强对苏战备。

这个时候，1941年7月1日，作战课课长一职上，由永田铁山生前的统制派成员、作战课作战班班长服部卓四郎（诺门坎事件时的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取代了土佐派的土居明夫。这样，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和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两个统制派成员组成了参谋本部的核心阵容。

此外，在此期间，松冈外相在德苏战争爆发后，主张立即与德国合作进攻苏联。他不仅与近卫首相等内阁成员，而且与陆海军也产生了意见分歧。松冈在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回国后，主张与德国进攻英国相呼应，进攻英属新加坡。但随着德苏开战，他不顾刚刚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而立即主张进攻苏联，使近卫等人感

到吃惊。进而，松冈由于6月21日的美国方案要求日本退出三国同盟，而且当时赫尔的普通照会对他进行了谴责，因此强烈主张停止日美谈判。

但是，不仅近卫首相，连陆海军都希望继续日美谈判。7月18日，近卫文磨组成第三次近卫内阁，排除了松冈外相。新的外相由稳健派、海军出身的前商工大臣丰田贞次郎就任。松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他的发言权是倚仗近卫首相的信任。因此，此后松冈迅速丧失了政治影响力。

由于准备对苏作战已经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以田中为首的作战部开始计划和实施对满洲实行陆军大动员。当时，关东军为平时编制12个师团，拥有35万兵力。田中新计划将关东军变为战时编制，同时加上朝鲜驻屯军2个师团和从国内派遣的2个师团，共计16个师团进行对苏战备。总兵力为战时编制16个师团，加上重炮队、高射炮队等陆军直辖部队和后勤部队，达到了85万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陆军大动员。此外，还动员了马15万匹，同时征用90万吨位的船舶用于运输。这些人员和物资的移动都被当作绝密，为了掩饰动员目的，名称也定为“关东军特种演习”。

作战部设想与苏联战争的时间为大约两个月，在进入冬季的11月之前必须在预定的战斗地区决出胜负。为此，需要在1941年9月初动武，而且必须在8月上旬至中旬做出开始战争的决策。

另外，作战部规定了武力介入的标准：远东苏军调往西面的德国战线，兵力减半，尤其是飞机和坦克减少到1/3。德苏开战前的远东苏军兵力为30个师、2700辆坦克、2800架飞机。而“关东军特种演习”前驻满洲和朝鲜的日军兵力为14个师团、450辆坦克、720架飞机，即使加上“关东军特种演习”增强的兵力，决定战局走向的坦克和飞机在数量上也绝对处于劣势。

如果日本对苏开战，有必要一举击败远东苏军。如果战争开始时就遭到沉重打击，那么不仅向北方行使武力失败，而且也不可能向南方行使武力。无论是“大东亚共荣圈”，还是国防的独立自主都会只停留在梦想。首战胜利是绝对条件，根据诺门坎事件的经验，不仅师团数，坦克和飞机的比重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对苏动武受两个条件的制约：其一，8月中旬之前做出决策；其二，必须清晰远东苏军减少应达到何种标准。

起初，作战部考虑了20个师团的方案，但是未能得到陆军省的同意，最终放弃。

武藤为首的军务局（核心成员为：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军事课课长真田穰一郎、军事课高级课员西浦进、军务课课长佐藤贤了、军务课高级课员石井秋穗）从一开始就认为德苏战争会成为一场持久战，反对日本进攻苏联。另外，关于《帝国国策要纲》中进攻苏联的条件，军务局也解释为：德军进攻后，苏军遭到致命打

击，日本仅凭关东军的现有兵力（35万）就能够击败苏军，而且能够以这个兵力维持占领地区。

因此，军务局对实施关东军现行12个师团的战时动员，也比较慎重。1941年6月29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强迫主管动员的军务局军事课课长真田穰一郎实施正式动员（战时动员）时，真田也没有接受他的要求。这是因为，军务局认为，正式动员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做出开战的决策。不仅如此，在他们看来，不可能达到《帝国国策纲要》设想的进攻苏联的条件（苏联在短期内崩溃）。

然而，7月上旬，武藤章军务局局长因治疗眼疾休假期间，田中新一再次向真田穰一郎施加压力，使他同意了正式动员驻满洲和朝鲜的14个师团并动员和派遣本土航空部队以及一部分陆军直辖部队。但军事课没有做出更大的让步。田中新一只得于7月4日与东条英机陆相直接交涉，获得了东条英机的同意。次日，陆军内部决定对以16个师团为骨干的总兵力85万人实施正式动员。

此外，在陆军省中身居要职的人事局局长富永恭次也主张发动对苏战争，积极配合田中新一的活动。富永可以说是东条英机的心腹部下，他与田中新一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学生，关系尤其亲密。另外，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也向陆军中央提交意见称：“此时，要断然根本解决北方问题……现在恰逢执行国策的千载良

机”。

1941年7月6日和16日，陆军省分两次发出了关东军特种演习的动员命令，从而实施了总兵力85万人、马15万匹、征用船舶90万吨位的大动员。参谋本部作战部考虑，即使苏军在德苏战争中不发生崩溃，只要远东苏军减少一半兵力，尤其是飞机、坦克减少到1/3，就伺机进攻苏联，日本和德国分别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可以说，这就是前述田中新一所主张的应该“人为地捕捉”良机时的具体含义。这是因为，《帝国国策要纲》事实上把苏军在德苏战争中崩溃设想为进攻苏联的良机。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海军当时一直警惕陆军采取谋略突然发动对苏战争。

但是，远东苏军并没有像田中新一希望的那样，向西面的对德战线大幅度调动。7月中旬的时候，西调的只有5个师左右，相当于开战前30个师的70%，而西调的坦克、飞机及其他机动装甲部队也只有大约1/3。如后所述，尽管对德战线对于苏联来说状况已经极其严峻，但苏联一直在远东保持足够的兵力。可以说，苏联方面也对日本参战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另外，参谋本部情报部在8月初对形势做出判断，认为德国不可能在当年内让苏联屈服。尽管如此，田中新一仍然不放弃自己的计划，企图与东条英机陆相协商，在8月10日前后决定是否对苏宣战。

但是，1941年8月9日，参谋本部决定了放弃年内

对苏宣战的方针。这是因为，针对7月28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于8月1日启动了对日全面石油禁运，全面停止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因此，对于陆海军和政府来说，应对美国上升为首要问题。这成为日本推迟进攻苏联的主要原因。田中自己也判断，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从日本的石油保有的现状来看，已经不能优先考虑对苏联的战争。

接到德苏即将开战的情报之后不久，1941年6月10日，陆海军之间就《关于促进南方施策事宜》达成了一致。它是根据此前陆海军批准的《对南方政策要纲》拟定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1) 与法属印度支那之间，建立包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在内的军事融合关系；

(2) 为此，进行外交谈判，法属印度支那不答应要求时，使用武力解决。

这份《关于促进南方施策事宜》在1941年6月12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恳谈会上得到了批准。也就是说，日本正式决定着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外交谈判，同时也考虑到了向法属印度支那行使武力。

接着，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的《帝国国策要纲》也要求，依据《对法印、泰施策要纲》和《关于促进南方施策事宜》，执行针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各种政策，强化南进的态势。

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是天然橡胶、锡、锌、钨等重要

资源的产地，同时它的地理位置还使其能够成为直接进攻马来、新加坡、西婆罗洲等英属殖民地和荷属东印度，进而还有美属菲律宾等地的基地。因此，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可以获得当地的资源，同时还为了确保需要在南方发动进一步战争时所需的军事基地。

7月3日，日军下达准备进驻的命令，在中国南方的海南岛集结了大约4万兵力的进驻部队。7月14日，日本驻法大使向法国维希政府提出了下列要求：修建金边、西贡、边和等8个航空基地；建设西贡、金兰湾港口，并作为海军基地使用和管理；驻扎必要的兵力；等等。进而，7月19日，日本提出了最后的答复要求，不论法国是否同意，日军将于7月24日开始强行进驻。7月21日，法国政府只好同意日军进驻。从7月28日起，日军开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修建航空基地等各种军事设施。这样，日本把英国在东南亚的最大根据地——新加坡，纳入了直接空袭的范围。另外，日本还获得了将来在南方作战的舰队基地。

日本希望，通过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对荷属东印度施加军事压力，从而软化荷属东印度方面在陷入僵局的日荷谈判中的态度。

荷属东印度拥有天然橡胶、锡、镍、铝土矿等重要资源，还拥有储量丰富的石油。日本早已在关注这个未来的石油供应地区。1940年1月《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失效，石油及其他重要资源不能保证稳定的进口以后，

日本为了确保重要的军需资源，尤其是石油的稳定供应，于9月13日派遣代表团，开始与荷属东印度当局进行外交谈判。而荷兰本国已经于5月被德国占领，政府流亡到了英国。

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缔结三国同盟后，荷属东印度方面提高了对日德接近的警惕，一直到第二年谈判仍然毫无进展。（1941年）6月中旬，日荷谈判暂时中止。此后，日本代表团回国，但总领事继续在当地进行谈判。日荷谈判的中止也是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一大原因。日本希望从法属印度支那施加军事压力，软化荷属东印度当局的态度。

但是，7月21日法国政府接受日本于7月14日提出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要求以后，7月24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劝告日军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并提议让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另外，他说，由于美国国内强硬的对日舆论，将不得不对日本采取石油全面禁运，并暗示将要落实。进而，他发出严重警告：如果日本为了获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而强行武力进驻，英国已经做好了对日宣战的准备，以保护荷属东印度；这种情况下，美国由于与英国的关系，有可能也会向日本行使武力。早在同年3月，美、英、荷三国已经在新加坡举行了联合作战的军事人员会议。

第二天即7月25日，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包括藏在横滨正金银行纽约支行的1.4亿美元的战略

物资采购资金)。7月26日、27日，英荷两国、荷属东印度也相继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接着，日军开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后的8月1日，美国全面停止对日本的石油出口。在此之前，日本石油的大约70%都从美国进口，剩余的来自荷属东印度、桦太岛北部等地区。此外，荷属东印度早在日军开始进驻的当日，即7月28日，就停止了《日荷石油民间协定》，禁止向日本供应石油。

由于美国采取对日石油禁运措施，日本推迟了进攻苏联的计划，并决心向美英开战。在前述的《对南方政策要纲》中设想的日本不得不为了自存自卫而行使武力的事态，便是遭到英、美、荷等国对日禁运。现在，正是到了这样的局面。

如前所述，日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以后，美国于1939年7月通告日本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翌年1月，该条约失效。另一方面，赫尔国务卿指示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与日本外相会谈，企图说服日本：德国胜利将不会给日本带来安全和和平，而与美国合作，扩大贸易，通过和平手段增加福利，才对日本有利。

此后，同年（1940年）6月，日本向英国提出了封锁援蒋缅甸通道的要求。7月，美国决定对废铁、石油以外的军需物资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也适用于日本。同月，英国政府做出了封锁缅甸通道三个月的决定。呼应这个举动，美国决定石油和废铁也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禁止对日出口航空汽油。9月，针对

日本缔结三国同盟、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美国决定对日禁运废铁。接着，1941年8月，针对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采取了对日禁运石油的措施，从而对日全面禁运。英国也于5月，禁止英国本国和英属马来向日本出口橡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日禁运措施。

1941年8月9日，参谋本部决定推迟进攻苏联，即日制定了《帝国陆军作战要纲》。其内容是，推动在11月底之前做好对英美作战的准备。另外，8月13日又编写了《南方作战构想陆军方案》。它的内容主要是确定了如下方针：12月上旬开战，在翌年5月之前，攻下香港、马来半岛、新加坡、西婆罗洲等英属殖民地及美属菲律宾、关岛、荷属东印度；为了开战，9月中旬开始，在11月底之前完成所需兵力的动员和集中，征用150万吨位的运输船舶。以田中新一为首的参谋本部放弃进攻苏联以后，立即开始准备向南方扩张。

此外，8月上旬，陆军省战备课再次对国家物资重新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了可以持续进行南方作战的结论。在3月进行国力分析时，曾经认为开战第二年年底有可能出现石油供应不足的问题，但此次通过修改石油储量预测，认为可以持续进行南方作战。

3. 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与 美国的对抗措施

关于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以武藤为首的军务局考虑，应该在不与美英发生战争的范围内南进，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为日军进驻的限度。但是，实际上，随着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采取了对日全面石油禁运的措施，局势走向了日本对美英开战。

一般认为，日本的陆海军高层和幕僚完全没有预料到美国实行对日全面石油禁运。那么，武藤章是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件事的可能性呢？在1941年7月21日法国接受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要求之后，7月23日，武藤章曾经做过这样的发言：

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是通过日法之间签订协议，而不是通过行使武力的和平进驻。但是，综合各种情报，当然必须预料到，日本会遭到“美国冻结资金”、英国实行出口管制等一系列的经济压迫。“应该已经完全不能指望从美国运入物资”。

他考虑，即使不通过行使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也可能会引起美国加强对日禁运，实行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实际上，在此两天后的7月25日，美

国冻结了日本在美资产，26日英国随之仿效，8月1日美国开始实施对日全面石油禁运。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外务省提供情报称，美国对日没有禁运的只有石油，如果发生了什么事，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石油也实行全面禁运。而且，如果日本乘德苏战争之机决心向南方行使武力，那么日美关系将完全没有调整的余地。武藤章作为军务局局长从外务省获得的情报中，应该也包括野村的这个情报。虽然日本在实际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时没有直接行使武力，但它却是以武力威胁强迫法国方面让其进驻，可以说，这同样是野村担心的事态。

武藤还考虑，如果美英在现实中越来越加强对日本的经济压迫，那么，就到了必须排除万难打破局面的时候。这时，就意味着日本与英美的军事冲突，必须预先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他考虑到，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不仅会引起对日全面禁运，而且这进一步会导致与美英两国的战争。

此外，丰田外相在1941年7月24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也说，如果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有可能实施禁止出口重要物资（棉花、石油等）、冻结资金等措施。但是，他的看法是，虽然担心美国会实施石油禁运，但并不清楚是否会全面实行石油禁运。

那么，为什么明知美国有可能实行对日全面禁运，武藤章仍然决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呢？关于这一

点，武藤章自己也曾经说，由于田中新一为首的参谋本部“不顾一切地想要扑向苏联，所以，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们这样做”。也就是说，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目的，乃是为了阻止一直推进关东军特种演习的以田中为首的作战部对苏联发动进攻。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在何种意义上被认为具有阻止对苏开战的效果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虽然田中新一自己企图进攻苏联，但他同时也在推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海军的一些人也企图通过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把急于对苏开战的陆军引向南方。而此时他们想到的牵引陆军的力量就是法属印度支那方面与陆军发生军事纠纷（当时，海军还没有决心与美英进行战争）。

但是，田中新一也事先充分考虑到了如何应对这样的事态。他制定了进驻大规模部队（大约4万人）的作战计划。这样，即使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引起与法属印度支那军队的军事冲突，也足以应对，而不影响对苏开战。对于田中来说，因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与法属印度支那方面发生纠纷，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本身基本上不能够阻止他对苏开战的计划。

那么，武藤章考虑的是什么呢？当时，通过关东军特种演习集结的日本陆军大部队，在苏联和“满洲国”的边境与远东苏军正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由于田

中新一一直主张，即使人为地制造机会，也应该进攻苏联，因此武藤章非常害怕田中新一等人会抓住某个机会，对苏联发动进攻。按照武藤的判断，这意味着在北方苏联宣战的同时，引起在南方与美英的战争，也就是同时进行南北两面的战争。

包括以武藤章为首的军务局在内的陆军省对形势的分析是：“北方是希望，南方是必然。如果北方干起来，南方必然起火”。也就是说，向南方发展对于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来说，是一个“必然”的要求，而在北方武力排除苏联的威胁，只不过是“希望”，意思是最好能够实现。另外，他们预料，如果日本在北方对苏联开战，支持苏联的美英两国将会完全切断日本的资源供应。因为苏联继续对德抵抗，对于英美两国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那样，在南方，日本也不得不为了求得石油、天然橡胶、锡等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而向英属殖民地和荷属东印度行使武力，最终向英美开战。

不仅陆军省，海军也最为担心的是，资源上一无所获的对苏战争将会成为一场消耗战，日本会因为这场战争而被美英切断资源，被迫对美英开战。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最糟糕的选择。日本将会因此陷入南北两面同时与美、英、苏进行全面战争的状况。

当时，武藤自己也努力避免发展成一场南北两面同时进行的战争，但是，他曾经严重警告说，有可能会发

展成这种情况。

武藤也许在这样考虑。为了阻止日本陷入南北同时战争这样最糟的情况，只有通过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让美英加强对日禁运，从而制造出不可能对苏开战的情况。这是因为，他判断，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很可能会引起美英加强对日禁运，使得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

本来，武藤章一直反对向北方行使武力和对苏战争，也不同意作战部关于增强关东军兵力的主张。但是，在他因病休假期间，东条英机陆相批准了田中等人的要求，实施了关东军特种演习。这在武藤看来，将容易引发南北同时作战的危险状况。也许他判断，为了避免对美英、对苏南北两面的同时战争，即使冒着英美强化对日禁运的危险，也必须阻止向苏联发动进攻。

事实上，田中为首的参谋本部在美国因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后，放弃了进攻苏联。

武藤章也许考虑，与对苏开战让日本陷入南北两面同时作战的最糟情况相比，引起美国实施对日全面禁运，仍然有可能通过日美谈判，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可以推测，这是后来他不顾田中为首的作战部的强烈反对，全力投入日美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田中新一是如何考虑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影响的呢？这么说，是因为田中新一对日军进驻

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本来也是积极的，而且试图在准备对苏战争的同时，推进向南部行使武力。可以说，他反而比军务局更加热心。

关于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必要性，田中新一是这样考虑的：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是日本的第一补给圈，在任何情况下，没有这个地区的资源，日本都将不能应对长期的国家总体战，因此，即使为了进行与苏联的战争，也必须确保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通过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驻军，能够实质上掌控整个法属印度支那，同时对泰国形成威慑；另外，根据形势，它还能够成为日军进驻缅甸的基地。

但是，如果美英两国想要确保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那么日本的国防计划将会从南方开始崩溃。美英两国有可能需要东南亚的橡胶、锡等资源，因而企图抢先争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如果日本进驻后能够在战略上利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它将可以成为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跳板。

此外，日本海军也一直警惕美英两国抢先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所以这未必是田中新一的突发奇想。美国在1941年7月7日就抢在德国之前进驻了属于丹麦的冰岛。田中深知这一点。

但是，田中判断，美英两国不会通过正式行使武力，阻止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据他分析，在1942年之前，美国不会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也就是

说，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时间之前不至于正式对日宣战。

因此，美国出乎意料地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以后，田中新一不得不急忙中止一直全力推动的进攻苏联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把美国对日实行全面石油禁运，视为日本需要为了“自存自卫”而行使武力的事态，而美国政府在明知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断然采取了这个措施。

罗斯福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在战略上采取所谓的欧洲第一主义，一直重视欧洲战局，并且一致认为，美国首先应该竭尽全力打败德国。因此，当时美国全力对英国本国进行物资和军事援助，并准备对德宣战。

另一方面，在对日政策上，美国原则上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但又试图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而是通过各种牵制政策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美国采取了各种手段牵制日本，包括外交上的警告；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限制重要物资出口；美国舰队驻扎夏威夷；保护抵抗日本的东南亚英属殖民地和荷属东印度；支援重庆国民政府；等等。

因此，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应对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美国国务卿特别顾问霍恩贝克（原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等对日强硬派认为，如果美国加强对日本施压，那么日本最终肯定会让步。对此，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等知日派警告说，如果逼得日本走投无路，日本将有可能对美开战。

但是，罗斯福总统决定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和实施对日全面禁运。

这是因为当时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判断，在德苏战争方面，苏军在德国的进攻下，已经陷入了极其危险的状况。这增强了美国对苏联发生崩溃的危机感。美国采取紧急对策，急忙把援助英国的大量军需物资转向援助苏联。由于存在同样的危机感，英国政府也同意美国的做法。因为如果苏联战线崩溃，苏联战败，德国将会再次转向进攻英国。而这一次进攻将远比上一次有力，英国将面临真正的危机。而如果英国屈服，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在欧洲的立足点，从而危及美国的安全。

从这种观点出发，美国政府对日军通过关东军特种演习向苏“满”边境实施大动员，保持高度警惕。这是因为，美国已经想到，苏军正在西面战线与德国陷入苦战，如果日军从东面发动进攻，对于苏联来说，将是最糟糕的情况。

因此，为了阻止日本进攻苏联，美国抓住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机会，决定采取对日全面禁运的强硬措施。美国决定对日本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阻止日军北进。这件事蕴含着日本对美开战的危险。尽管如此，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防止苏军崩溃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如果消除了日军北进的威胁，苏联便可以把远东军用来增强西面战线，对付德国。这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实际上，正如田中新一所预料的那样，当时美国尚未做好对日战备。美国还没有完成菲律宾基地的修建，也没有完成重型轰炸机的部署。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决定冒着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危险，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可以说，美国政府对苏联在德苏战争中崩溃，抱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

一般理解，美国针对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是为了遏制日本进一步南进。但是，它同时也是为了阻止日本向北方进攻苏联。当然，遏制日本南进也是对日全面禁运的主要目的之一。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继续南进将意味着占领东南亚的英国和荷兰殖民地。如果这样，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和澳大利亚等国向英国运输物资，将有可能被日本海军切断运输线路，使英国难以继续与德国战争，甚至导致大英帝国的崩溃。对于美国来说，从安全出发必须绝对阻止英国崩溃。

总之，可以说，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和后来决心对日宣战，都是为了保证英国的生存。

此后，武藤章竭尽全力进行日美谈判，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实行全面禁运而不得不推迟向北方进攻苏联的田中新一则强硬地主张，向南方行使武力和向美英开战。二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此外，通常认为日美战争是一场围绕争夺中国市场的战争，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它是围绕英国

及其殖民地的命运走向而发动的一场战争。

事实上，美国正式援助中国，实际发动各种对日制裁，开始于1940年，也就是德国进攻英国的时候。在此之前，只是停留于通过一定程度的借款进行支援。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之前，美国的对日出口额是对华出口额的7倍左右。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不可能为了保护中国市场而不惜与日本发生战争。而且，当时日本的海军比美国海军强大，事实上难以与日本对抗。美国国务院的对日强硬派、远东事务处处长霍恩贝克也表示，美国不应该为了中国市场而甘冒与日本战争的危险。

但是，此后德国正式向英国发动进攻，英国本土面临危机。于是，美国为了把日本困在中国，正式开始援助重庆政府，以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提供1.4亿美元的借款），并加强对日经济制裁。这是因为，美国担心，如果日本征服了中国，它将很可能配合德国，转而进攻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其他英属殖民地。这样，英国被切断了殖民地的物资补给，将无法抵抗德国的进攻而最终失败。美国对日、德、意缔结三国同盟感到紧张，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第九章

日美谈判与对美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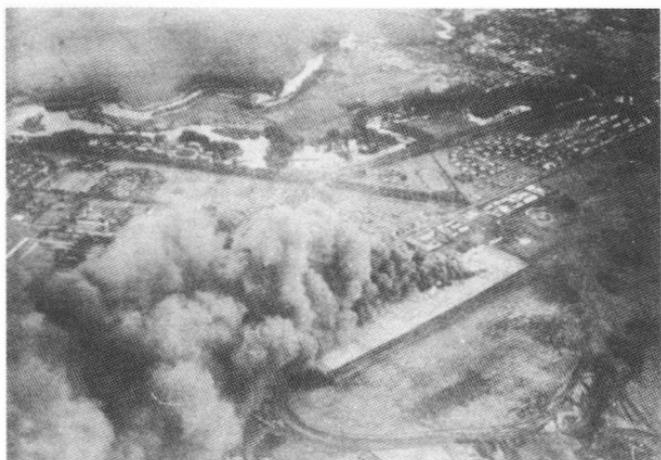


图 18 日本袭击珍珠港。熊熊燃烧的惠勒机场（读卖新闻社供图）

1. 继续谈判，还是决心开战？

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禁运之后，丰田贞次郎外相照会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日本无意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区。另外，他还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同样内容的请求，寻求恢复日美两国之间的通商关系。后来，丰田外相又向苏联承诺将履行《日苏中立条约》，并决定与英国就保证泰国中立进行谈判。包括这些活动在内，丰田外相时期的对美提案等对美国的应对措施，武藤章军务局局长都亲自前往外务省参与了策划。武藤章全力以赴进行日美谈判。但是，对于田中新一作战部部长来说，丰田外相的这些活动无法容忍。因此，他对赞同丰田外相活动的武藤也表示了不满。

另一方面，近卫首相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希望与罗斯福总统举行首脑会谈。1941年8月8日，他向美方提议在檀香山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其目的是，排除反对对美让步的陆海军幕僚的介入，通过两国首脑直接会谈，避免日美战争。为了避免日美发生战争，近卫下定决心对美让步，包括日本从中国撤军、实质上废除三国同盟等措施，以便达到日美妥协的目的，同时，近卫考虑采用不经陆海军而直接由天皇批准和决定这一非常手段。他向周围的人表示，决心绝对避免日美战争，调

整日美关系后，今后至少十年“卧薪尝胆”，维持日美和平。

对于近卫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的想法，武藤章军务局局长经过与东条英机陆相协商，最终以履行现行政策为条件，予以同意。他在内心对通过首脑会谈避免战争抱有期望。而田中为首的参谋本部则担心近卫会削弱三国同盟而与罗斯福妥协，因而强硬地表示反对。但是，武藤章说服了田中新一。他说，如果陆军拒绝首脑会谈，近卫有可能放弃内阁，如果那样，就会引起政变，陆军必须对此承担责任。以田中新一为首的参谋本部害怕内阁更换后会转变政策，只好对此表示同意，条件是不向美国承诺削弱三国同盟。

日本向美国方面提议举行首脑会谈时，罗斯福总统正在大西洋上与丘吉尔首相会谈。1941年8月14日，发表了英美联合宣言《大西洋宪章》。宣言包含了以下内容：曾经被武力剥夺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应该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最终消灭纳粹暴政；等等。宣言虽然没有指名日本，但表明了对侵略主义的批评和反纳粹主义的理念。9月，苏联也加入了这一联合宣言。

罗斯福总统从大西洋会谈回国后，于8月17日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进行了会谈，并交给其两份文件。其一，是一份措辞严厉的警告。内容是：如果日本政府通过武力及其威胁，对邻国采取军事侵略的行动，美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可以说，这体现了对

于日本实行进一步军事侵略美国的强硬姿态。其二，是对日本提出的举行首脑会谈建议的答复。声称不符合美国一贯主张之基本原则的，美国不予考虑，要求日本表明更加明确的态度。

作为对此的答复，8月28日，日本向美国传递了近卫首相给罗斯福总统的口信和日本政府声明。口信的内容是，希望不拘泥于此前的旧事，从大处高处讨论涉及整个太平洋的日美之间的重要问题，避免发生最糟糕的事态。它表明了近卫对首脑会谈的非凡热情，强烈要求实现会谈。并且，他暗示，在首脑之间达成大致的协议，然后，个别的细节问题在会谈之后根据需要由事务部门进行谈判。另外，政府声明没有提及日美之间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而是阐述了一般的、原则性的态度。

武藤章军务局局长和他的亲信军务课高级课员石井秋穗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了这份政府声明的起草工作。他们在声明中加入了陆军方面的意见，同时又仔细注意不妨碍首脑会谈。

在此期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了解到了近卫首相的积极态度，向本国政府呈报意见称：日本的政治家只有近卫能够控制日本军部的过激派，美国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

此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国内传达了罗斯福总统对首脑会谈也有兴趣的消息。为了准备实现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和陆海军开始推动随员人选等工作。

9月3日，美国政府做出了对近卫建议的答复。美国答复称，美国赞成首脑会谈的宗旨，但在举行会谈之前，日美之间需要事先就以往一直未解决的问题达成一定的协议。而且，作为需要达成协议的事项之一，就是4月16日日本提出《日美谅解方案》时赫尔国务卿所表示的美国基本态度，即所谓的赫尔四原则。前面已经说到，野村大使在给日本政府发来《日美谅解方案》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及赫尔四原则。武藤章得知作为美国基本态度的赫尔四原则后，指示部下对此进行研究。他已经注意到它在今后日美谈判中的重要性。

进而，赫尔国务卿又向野村传达了实现首脑会谈的前提：需要对以往日美谈判中遗留的“特定的根本问题”达成协议。所谓“特定的根本问题”，暗示的是日本从中国撤军问题、三国同盟问题、通商非歧视原则问题，等等。近卫的口信和政府声明完全没有涉及日本从中国撤军的问题和三国同盟问题；而关于通商非歧视原则，则认为不仅适用于太平洋地区，而且应该适用于全世界，同时应该承认相邻地区之间特殊的紧密关系，但基本上对这一原则表明了承认的态度。

总之，日美要实现首脑会谈，前提是解决这些难以妥协的问题，事实上举行会谈已经变得遥遥无期。在这个阶段，可以说，近卫的企图基本上已经化为泡影。当时，武藤章感慨地说，如果美国政府无条件同意会谈，那么事情完全有可能朝着近卫希望的方向发展。他在内

心一直期待通过首脑会谈实现日美妥协。

日本政府接到美国政府的答复后，开始起草对美提案，起草了包含陆海军意见在内的综合处理方案。

在此期间，由于遭到美国全面禁运，陆海军开始制定新的国策。

在美国对日全面禁运的次日即8月2日，军务课高级课员石井秋穗按照6月6日通过的《对南方施策要纲》拟定了“应该下决心在南方开战，推进作战准备”的方针。《对南方施策要纲》中明文规定，遭到英、美、荷等国家对日禁运时，日本为了自存自卫，将对南方行使武力。石井向武藤章和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直属参谋次长）等提交了这个方案。武藤章认为，海军是对美战争的主力，因此南方战争必须由海军主导，表示了慎重态度。战争指导班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认为对美英的战争由海军方面决定。他们也希望尽可能避免对美战争。

田中新一在放弃向北方进攻苏联之前的8月6日也曾经表示，对美英战争将是长期战争，不能轻率行事。如果日本断然进行这场战争，就有必要确立长期不败的态势。田中新一也对南北两面同时战争比较慎重。但是，如后所述，8月9日推迟对苏联发动进攻以后，他便开始倾向于尽早对美英开战。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而陷入困境的日本海军拟定了《帝国国策遂行方针》，于8月16日

提交给了陆军方面。它的内容是，以1941年10月中旬为限，同时进行对美战备和外交。到10月中旬，外交上仍然不能达成妥协时，则采取武力措施。

对此，田中新一强硬主张，应该在决心立即对美开战的前提下，开始作战准备，并命令战争指导班（班长：有末次）拟定修订方案。这是因为，按照田中新一的观点，与海军不同，如果不在国家层面上决心开战，陆军难以进行战争准备。海军由于其性质，即使国家没有决心开战，也比较容易进行正式的作战准备。但是，陆军准备战争主要包括大规模召集人员、向预定战场集中军需物资、大量征用运输船舶等。它的性质是，只有国家意志决心发动战争，才能正式推动战争准备工作。

但是，田中新一主张下决心立即开战并不只是因为这个理由，而是出于重视对美战争的决心本身。他的立场是：要把决心以战争变成既成事实，作为不可动摇的大前提，因而决心以战争为主、外交为辅。另外，田中认为，基本上不可能按照他能够接受的内容在外交上达成妥协。因此，田中的意见是：应该实质上中止对美谈判，用外交掩饰开战企图，同时集中力量准备战争。

战争指导班按照田中的意见起草了修订方案，内容是：到9月中旬仍然不能打开外交局面时，下决心开战。但是，田中新一认为，应该立即确立开战决心，因此他也不同意修订方案。8月19日，战争指导班制定了《帝国国策遂行要领》方案，写明了立即决心开战。

该方案经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参谋总长杉山元等人同意，作为参谋本部的方案提交给了陆军省。但是，武藤章军务局局长坚持尽量保留外交余地，反对立即决心开战。他希望完全通过日美谈判打开局面。

8月25日，田中新一与武藤章进行了会谈，制定了陆军方案。它的要点是，日本决心对美、英、荷发动战争，并以10月下旬为目标做好战争准备；在此期间，与美英进行外交谈判，尽一切手段努力坚持日方的要求；到9月下旬仍不能满足日方的要求时，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这个方案吸收了田中新一和武藤章两个人的主张。

陆军方案把备战目标定在10月下旬，是因为根据石油储备减少、日美海军主力舰总吨位比例的变化、在北方形势安全的冬季进行作战行动的需要、进攻马来半岛的季节条件等因素，考虑在11月初开始战争。此外，田中新一似乎也考虑到了来年春季以后在北方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因而考虑在冬季发动南方的战争。

在此期间，针对1941年8月17日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出的警告，田中新一认为，这是美英经过协商后采取的一项对日强硬举措，不应该视为单纯的威胁。因此，根据日美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和石油储备等情况，必须在年内，尽可能在秋天之前，实施对美开战。当时推测，由于美国大规模海军扩张政策，日美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1941年将为0.75:1，1942年将为0.65:1，

1943年将为0.5:1, 1944年将为0.3:1。也就是说, 来年以后日本的主力舰总吨位将低于美国的70%, 第三年以后则降到一半, 将无法与美国进行战争。到了那个阶段, 如果日美发生纠纷, 日本在军事上将无力对抗, 只能屈服于美国。因此, 即使通过日美谈判在外交上达成妥协, 如果是几年, 对日本并没有意义, 而必须持续十几年。

8月27日, 日本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 对陆军方案进行了讨论。会上, 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主张, 即使与美国的谈判破裂, 也不应该立即决心开战, 而应该根据欧洲形势, 再决定是否开战。田中新一反驳说, 到9月下旬仍然不能满足日方要求时, 就应该停止外交手段, 决心对美开战。此时, 田中自己也考虑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这一点, 无论是参谋本部还是陆海军, 想法都是同样的——但是, 他判断, 日美两国到一定时间仍然不能在外交上达成妥协时, 陆军必须决心对美开战。关于这一点, 他感慨地说, 并不知道海军方面真意何在。即使最强硬的田中新一也考虑尽可能避免对美开战; 但是, 在他看来, 事情已经发展到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禁运的阶段, 而且, 如果一定时期内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以失败告终, 日本将只能对美开战。可以说, 武藤章也把一切赌在了这段时间的外交谈判上。但是, 海军依然态度摇摆不定。

次日, 战争指导班修订了方案, 把“决心对美、

英、荷开战”改成了“在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心下”。海军方面以把决心开战的时间从9月下旬改为10月中旬为条件，同意了修订方案。但是，田中新一希望决心开战的时间最晚也要在10月上旬，并且希望在决心开战的时期不会因为政变等原因而改变国策。

1941年8月30日，日本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经过讨论，基本通过了陆海军拟定的《帝国国策遂行要领》。9月2日，陆海军正式通过。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在不惜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心下，以10月下旬为目标做好战争准备；

(2) 与此同时，对美英尽一切外交手段，努力贯彻日方要求；

(3) 到10月上旬左右仍然不能满足日方要求时，立即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从陆军方案来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修改成了“在不惜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心下”，决心开战的时间由9月下旬变成了10月上旬。

9月3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召开，批准了向御前会议提交的国策草案。这里，陆海军方案中的“不能满足日方要求时”，按照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的建议，修改成“日方要求没有希望获得满足时”。是否没有希望，乃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决心开战也随着这个判断而变得在时间上留有余地。这个陆海军方案经过部分修改后，于9月5日直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

9月6日，御前会议召开，批准了内阁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遂行要领》。这样，在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层面上正式决定：到10月上旬日方要求仍然没有希望获得满足时，将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在此次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借明治天皇的作品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件事广为人知。关于这个发言，武藤军务局局长加入自己的意图，向军务局内部的部下传达说：“这无论如何是命令在外交上达成协议”。此时，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仍然向军务课高级课员石井秋穗表态说，自己下定了战争的决心，绝对不会改变，陆相应反复进宫，向天皇说明必须开战的理由。服部不服从天皇的意志，反而企图完全让天皇听从自己的意见，这种“信仰犯”^①式的异常行为给石井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在此期间，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还是在内阁会议、御前会议上，近卫文磨首相都没有对决心向美、英、荷开战表示过反对。而先前提到过，他曾经表明决心，绝对避免日美战争，对美大幅让步，十年卧薪尝胆。也许他担心遭到陆军的抵抗而被迫内阁总辞职，或者也许他有信心能够通过外交谈判避免战争。总之，作为处于首相地位的政治家，不得不

^① 信仰犯，在日本概指以道德、宗教或政治信念为动机，确信其行为属于正当而犯下的罪行。如思想犯、政治犯等。

说他的行为难以理解。

在此以后，全部焦点便集中在了10月上旬之前的日美谈判上。不言而喻，武藤章也同意批准《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在10月上旬的期限之前，决定全力以赴进行日美谈判。武藤自己与田中一样，出于石油消耗、与美国战斗力对比的变化等军事上的考虑，同意应该给日美谈判设定期限。

首先，日美谈判中，日方的要求是一个问题。

1941年8月17日，日本政府接到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对日美首脑会谈的答复后，以外务省和陆海军为中心，一直在推进拟定日美谈判的综合处理方案。另外，在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遂行要领》中，“附件”部分说明了对美谈判的要求事项和承诺的限度。这些主要是根据陆军的意见。此外，通过前一天的内阁改组（成立第三次近卫内阁），更换了松冈外相，由丰田贞次郎就任外相。

9月25日，根据这些文件，日方汇总了谈判提案，并通知美国政府。它的内容考虑到赫尔国务卿提出的“特定的根本问题”，包括如下论点。

关于三国同盟问题，将自主进行关于同盟的解释和行动。关于从中国撤军的问题，在一定地区让日军和舰船驻扎必要的时间。关于通商非歧视待遇原则，该原则应该全世界适用。另外，不应该否定

邻国之间自然的特殊紧密关系。日本将在中国进行以利用开发重要国防资源为主的日中经济合作，但这并不限制在公正基础上进行的第三国经济活动。

在汇总这份日方提案之前，发生了各种摩擦。首先，关于三国同盟，田中新一主张写明三国同盟的义务，而武藤章则同意以外务省方案为基础的最终方案。二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田中新一重视与德国的同盟，反对牺牲与德国同盟而与美国妥协。但是，如果像田中新一主张的那样，写明坚持三国同盟的方针，那么，日美谈判显然就会触礁。对于武藤章来说，他对日美谈判仍然抱有最后的希望，因此，无法接受田中新一的意见，不同意对方案进行修改。如后所述，两者的意见分歧，背后实际上是两者对纳粹德国的评价和对美战略构想的不同。

此外，美国担心，美国对德国宣战时，日本会不会因三国同盟而自动对美开战。关于三国同盟问题的主要论点就在于此。

但是，日本已经通过秘密换文与德国驻日大使之间达成谅解，内容是，是否对美开战由日本自主判断决定。日本海军从一开始对于三国同盟的解释也是这样的立场。而陆军，包括参谋本部也表示，日本应该自主决定参战的时间和方法。自主决定参战时间，并不意味着美国担心的自动参战。

在从中国撤军问题上，外务省起初提出了尽快从中国撤军的全面撤军方案。陆军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和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也参与了方案的修改，最终修改为“按照日中间的协定，尽快从中国撤军”。他们企图通过加上“按照日中间的协定”这样的语句，保留驻兵的余地。关于这一点，武藤章曾经说：“这是因为如果写驻兵，显然对方〔美国〕会拒绝”。武藤章自己也要保持一定的驻兵。

但是，军务局内部也认为，这个方案对驻军的态度比较暧昧，修改为要求在内蒙古和华北驻兵。在内蒙古和华北驻兵的名义是“防共驻兵”，但主要是为了确保和开发军需资源。海军主张，在此基础上再追加在海南岛等华南沿海地区驻扎舰艇部队。但最终方案——有参谋本部主张的成分——只写“一定地区”，避免明确特定地区。日本的驻兵要求与美方的主张存在巨大分歧，成为此后日美分歧的焦点。

关于通商非歧视待遇问题，日本原则上予以承认，同时以容许邻国之间的自然紧密关系为由，要求允许旨在利用和开发重要国防资源的日中经济合作。这样，强调了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而形成的日中关系的特殊性，同时声明不限制第三国的经济活动，表示并不否认机会均等原则。

关于1941年9月25日的日方提案，外务省在与武藤章和冈敬纯两位陆、海军军务局局长协商后，向日本

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发电，补充了对美答复的方案。

以田中新一为首的参谋本部认为，补充方案中有些部分可以解释为，日本关于三国同盟仍有进一步让步的余地，另外，日中和平条件中有忽视与汪兆铭政权既定协定的部分，因此，他感到非常愤慨。田中新一冲进武藤章的办公室，对参与拟定对美答复方案的武藤章提出了严重抗议。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田中新一离开后，武藤章感慨地说，与田中的协调已经让自己精疲力竭了。可以说，这个时期两人的分歧非常严重。

此外，在9月25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提议，下决心开战最迟也要在10月15日之前。这个意见在会上得到了同意。在《帝国国策遂行要领》中，规定10月上旬左右为决定开战的时间，因此，期限清楚地定在了10月15日之前。这是田中新一指示起草的意见。他判断，海军方面把11月16日设想为开战第一天，由此倒算，10月15日之前需要有政策的转机。

1941年10月2日，赫尔国务卿以备忘录的形式做出了答复。美方的答复再次强调了四项原则，同时，关于三国同盟衷心感谢日本采取的措施。但是，美方要求进一步阐明态度。进而，针对日本在不确定的时间内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兵的要求，称有提出异议的余地，予以否定。美方认为，需要明确宣布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和

中国撤军。另外，对日中间因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特殊紧密关系，也提出了异议。

接到赫尔的备忘录以后，外务省拟定了对美答复的方案。该方案包括以下主张：日中达成和解后，原则上两年内撤军；日本有可能在内蒙古和华北的部分地区、海南岛驻兵五年。

10月5日，武藤章、田中新一等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主要幕僚在陆相官邸研究了陆军应采取的态度。根据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记录，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希望实现外交解决；要立刻奏请御前会议，决心开战。不过，根据军务课高级课员石井秋穗的记录，在没有希望实现外交解决的想法上是一致的，不过，虽然武藤章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但他认为御前会议的时机还不成熟。武藤仍然对决心开战持慎重态度。

这天傍晚，东条陆相与近卫首相进行了会谈。东条说，美国的态度是无条件承认赫尔四原则、拒绝驻兵、日本退出三国同盟，这些都是无法让步的。近卫的意见是，驻兵是问题的焦点，能否以一律撤军为宗旨，以保护资源等名义，让日本保留一些驻兵？东条反对说，这是缓兵之计，会留后患。近卫又问，英美是否可以分离，有没有避免与美国战争的办法？东条否定说，在海军的战略上没有可能，现在一切政策全部以英美不可分离为基础。

同日，海军也召开了高层会议，决定向首相进言：

按照继续谈判的方向，由近卫首相与东条陆相进行会谈，商量延长谈判期限和缓和条件。

10月6日，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会上，海军方面主张，如果就驻兵来考虑，外交上有望解决。但田中新一毫不理睬，陆军和海军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海军方面有人发言称，海军对南方战争没有信心，有没有把英美两国分离的办法？最后，会议以破裂结束。

10月7日早晨，及川海相对东条陆相提议，与美国仍然有继续谈判的余地，需要放宽期限，并坦白地说，海军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把握。东条回答，外交上无望解决，但如果海军没有把握，将重新考虑开战的问题。

同日，武藤章向内阁书记官长^①富田健治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关于驻兵，就算到了最后方案，也仍有考虑的余地。还应该进行谈判。”武藤章考虑，最终在对美谈判中，对中国驻兵问题仍然有让步的余地。

当时，参谋本部认为，军务局的意图是可以改变驻兵要求，因而他们向陆军省提交了一份意见，要求绝对不可更改关于驻兵的措辞方式。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认为，武藤军务局局长的态度令人不可理解。

这一天（10月7日）晚上，近卫和东条进行了会

^① 内阁书记官长，二战后称为内阁官房长官。

谈。会谈中，近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问：在驻兵问题上，能不能原则上撤军，而实质上驻兵？而东条拒绝说，绝对不行。

但是，10月8日，东条拜访了及川，他说：“在支那事变中，日本损失了数万英灵，眼睁睁地看着离开它（中国），实是不忍。不过，想到如果与美国发生战争，又会丧失数万人，又不应不考虑撤军。这是难决之处。”最后，他婉转暗示，如果仅仅在撤军问题上让步，就能够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将考虑撤军。虽然东条对近卫强硬地拒绝了撤军，但可以说，态度仍然有些动摇。

这样，不仅武藤章，而且东条英机也对是否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不得不考虑撤军，一直举棋不定。

通常认为，东条英机当时主张，如果从中国撤军，日中战争中同胞的血就会白流，此前的战争就失去了意义，因而绝对反对撤军。但是，东条英机曾经在一战后任驻德武官，深知不论战争胜负，国家总体战必然伴随巨大的牺牲。另外，他设想日美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国家总体战，东条当然也预料到这种牺牲将远远超过日中战争。因此，东条并非单纯地从日中战争中的牺牲这个既成事实来判断从中国撤军的问题。如后所述，他最后不能同意从中国全面撤军，另有其他原因。

这样，处于政权核心的近卫首相、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一直个别地进行会谈。近卫和及川分别从继续谈判的观点，要求陆军在驻兵问题上让步，但东条没有做出

让步。

于是，及川海相向近卫建议：近卫首相自己下决心领导政局朝继续与美谈判、从中国撤军的方向发展，海军全面赞成。但是，近卫不愿意自己承担最终的政治责任，提出由陆军和海军商量这件事。而及川海相按照海军的判断，也未能肩负起避免战争的全部责任。

后来，武藤章又向富田健治提议：如果海军真不想与美国作战，希望由海军清楚地表明态度，这样，就会遏制陆军内部的主战论。他希望富田促使海军阐明这样的意见。武藤章同时向海军方面表示，如果海军表示不进行战争，那么他将答应从中国撤军。

对于武藤这种举动，田中新一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策动是为了遏制陆军内部的强硬主张。

东条陆相的基本态度同样是应该尊重御前会议的决定，但他也表示，如果海军没有把握，那么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应该作废，责任人应该全部辞职。

武藤章和东条英机一方面受到未来对美战争的沉重压力，一方面又受到来自田中新一为首的参谋本部的压力。他们知道，海军对与美国的战争没有信心，因此主张继续谈判。于是，二人考虑让海军方面明确表示对战争没有信心，从而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开战。但是，海军也由于组织内外的条件，一直避免做出这样的表态。

另外，武藤此时表示，外交谈判仍有可能，还没有进入决心开战的阶段。而且，即使决心开战之后，也应

该寻求外交上妥协的可能性。

在10月15日决定开战的日期越来越迫近的情况下，1941年10月11日，野村驻美大使发来电报称，完全没有希望实现首脑会谈。陆军的省部幕僚在接到这封电报后，一致同意决心开战，企图促使大本营和政府做出决定。但是，武藤制止了他们的行动，主张应该在决心开战的前提下，对美进行强硬外交。参谋本部幕僚认为武藤的行为不可理解，并愤慨地表示，武藤是让陆军态度陷于混乱的元凶。

10月12日，日本政府接到野村大使电报的第二天，近卫首相、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铃木贞一企划院总裁在位于东京荻洼的近卫私邸“荻外庄”举行了五相会谈。

在会谈中，及川海相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我们站在外交和战争的十字路口，首相应该做出决断，如果继续外交，停止战争，未尝不可。对此，东条陆相反驳说，如果没有具说服力的信心，即使总理做出决断，也不能同意。近卫首相发言说，我不得不说应通过外交解决问题，我对战争没有信心，必须让有信心的人来做这件事。东条说，这样的话令人感到意外，这应该是通过《帝国国策遂行要领》时讨论的问题。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木户内大臣的日记，东条的发言是：可预见《日美谅解方案》将不会成立，因此希望下重大决心；

不过，如果有人能够说服我，对方案成立有信心，那么我当然不喜欢战争。

此外，前一天夜晚，近卫首相授意富田内阁书记官长拜访了海军的冈敬纯军务局局长，委托助首相一臂之力，清楚表明海军避免战争、继续谈判的态度。冈敬纯与富田健治一起前往海相官邸。及川海相表示，作为海军，不能说能战争或者不能战争之类的话，是否继续外交谈判，全凭首相决定，因此，希望近卫公对继续谈判做出裁断。及川海相在五相会谈上的发言，正是以这些活动为背景。

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意见仍然没有达成一致，10月16日，近卫内阁最终宣布总辞职。接着，日本召开了重臣会议，讨论下一任首相。重臣会议在木户幸一内大臣的领导下，奏荐东条陆相担任下一任首相。于是，天皇下令东条组阁。当时，木户内大臣要求把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作废，东条表示同意。这样，《帝国国策遂行要领》正式作废。

2. 东条内阁的成立与走向 日美开战的道路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成立，陆相由东条英机兼任。政府包括陆海军在内立即开始重新研究国

策，10月22日至10月30日连日召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进行讨论。

参谋本部方面，田中新一强烈主张应该立即决心开战，并把意见传达给了武藤章。但是，武藤章没有同意。参谋本部只得在10月21日做出结论：如果到10月底，仍然不能满足日方要求，将放弃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决心对美开战，并同意在10月最后一天前的一周左右进行外交谈判，在此以后，应该停止谈判。

东乡茂德外相为首的外务省的意见是：不论重新研究国策的动向如何，都应该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武藤章为首的军务局也持同样的意见。

武藤章向东条英机进言说，如果10月20日左右，日本采取了一切手段，任何人都能够接受，最终发生战争的话，国民也会奋起支持政府。另外，如果日美两国达成妥协，并解决了日中战争，国民将会无比感谢政府。因此，需要在日美谈判上倾注最后的努力。东条也对此表示同意。

10月21日，东乡外相向野村驻美大使发去电令：新内阁对调整日美关系的热情与前内阁并无不同。在拟定这份电令时，应外务省的邀请，武藤章也参与了策划。参谋本部的幕僚们得知此事后，谴责武藤完全无视参谋本部的意见，愈加对武藤感到不满。

但是，武藤也认识到，美国主张维持现状，而日本则主张建设新秩序，两者的主张存在根本的分歧。另



图
19
东
条
英
机

外，更换内阁、成立东条内阁后，解决日中战争的条件仍然不变，关于这个条件，日本的让步也不可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在日美谈判上，武藤也主张，在建设新秩序和解决日中战争的条件上，让步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如后所述，所谓的“一定的限度”，意思就是确保武藤自己视为日本“自卫生活圈”的内蒙古和华北的资源及在其驻兵。

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重新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要点：欧洲战局的预测，物质国力的判断，对美谈判条件的放宽，等等。

关于欧洲战局的预测，陆海军统帅部（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认为，德英战争和德苏战争都将成为持久战，陷入长期化，但估计德国的优势和不可战胜无法动摇。但外务省预测，英国正在趁德苏战争的机会不断恢复国力，来年德英之间将五五开，后年英国将转为优势，而德国会陷入困境。但是，外务省的这个预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物质国力的判断：确保南方资源的海上运输和船舶损耗量成为问题。但是，如果能够保持使用300万吨位的民用船舶，就能够维持可以继续战争的国力和确保最低限度的国民生活。

关于对美谈判条件的放宽，会上按照外务省的提案进行了讨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1) 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亦即三国同盟的问题，

与此前一样。即，自主决定参战。进而，加上了不扩大同盟条约中的自卫权解释这一内容；

(2) 关于赫尔四原则，同意美方的主张。不采取有条件、原则上同意等附加保留意见的办法；

(3) 通商非歧视待遇原则应该全世界适用，在此基础上予以承认。日方不主张基于与各邻国的地理特殊紧密关系而进行重要国防资源开发等特惠性日中经济合作；

(4) 在中国的驻兵问题，与此前一样，在“蒙疆”、华北、海南岛驻兵。在谈判时，可以将所需期限定为 25 年。但，在之前的谈判中，驻兵没有特别限定一定的地区，此次则限定为“蒙疆”、华北、海南岛。其他地区两年内撤军。

这些内容，除了驻兵问题以后，日方做了相当大的让步。这个意见基本上直接成为对美提案的甲方案。

在这些内容中，驻兵问题成为讨论最多的内容。东乡外相提出的方案是，让美国同意以全面撤军为宗旨，规定一定的期限，只在上述特定地区进行 5 年的限定性驻兵。对此，杉山元参谋总长、塚田攻参谋次长强硬地表示反对，坚持不能同意限期驻兵。而东乡外相也毫不让步，甚至声称，如果不同意限期驻兵，自己将宣布辞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于是，东条首相提出可以采用 99 年至 25 年这样一种近于永久驻兵的表达方式的方案，并建议采用 25 年

的方案。参谋本部方面也只好接受 25 年的期限。东乡外相认为，即使 25 年的方案，谈判也难以达成协议，但如果暂先设定了期限，美国方面提出异议时，可以再灵活处理。关于这一点，东乡本人要求东条理解，东条也似乎表示了同意。

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重新研究国策的最后一天，10 月 30 日，东条首相提出了以下三个方案，希望 11 月 1 日决定日本的国策。

第一方案：不战争，卧薪尝胆。

第二方案：立即决心开战。

第三方案：在决心战争的前提下，同时进行备战和外交。

1941 年 10 月 31 日，田中新一主导的参谋本部部长会议决定了以下方针：立即实质上停止对美谈判，决心开战；开战定于 12 月上旬，今后的对美外交，只是通过外交掩饰开战的企图。这是参谋本部对东条英机提出的三个方案的结论。此外，根据海军军令部的作战要求，陆军和海军两个统帅部之间已经就 12 月 8 日正式开战达成谅解。

武藤为首的军务局则主张第三方案，而东条首相在 11 月 1 日早晨与杉山元参谋总长的会谈中也主张第三方案。

11 月 1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首先对东条提

出的三个方案进行了讨论。关于第一方案，即“卧薪尝胆”的方案，东乡外相和贺屋兴宣藏相表示，他们认为现在没有必要进行战争。但遭到陆海军统帅部的强烈反对，最终没有得到同意。

其次，关于第二方案，参谋本部提出了前述方针。而东乡外相显示了强硬的态度，希望无论如何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而不能进行伪装的外交。东乡还主张，外交需要谈判时间和条件，才有希望取得成功。参谋本部方面提出外交期限截止到11月13日，但东乡对此表示反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休息的时候，杉山元参谋总长招来田中新一进行协商，结果田中做了让步，把外交期限延长到11月30日。可以说，这个插曲说明了田中新一在参谋本部内的发言权。

由于外交期限成为问题，讨论便包括了第三方案。会议最后决定：决心战争；12月上旬开战；外交截止到12月1日零时。

接着，会议开始讨论外交谈判的条件。东乡外相在说明上述甲方案的同时，突然提出了一个此前没有经过正式讨论的乙方案。它的内容是：日本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由美国取代它给日本供应石油；另外，两国在获得荷属东印度必需物资方面，相互提供合作。这是一个暂定的协议方案。

它是原外相币原喜重郎提出的方案。可以说，它企

图把日美关系暂时恢复到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以前的状态。币原外相预料包括驻兵问题在内的甲方案最终将难以达成妥协，因此准备了乙方案，以谋求暂时达成妥协。

会上，杉山元参谋总长、塚田攻参谋次长激烈反对乙方案。但是，在休息时，武藤章加上东条英机，对二人进行了说服工作：如果拒绝乙方案，有可能导致外相辞职，甚至发生政变。这样，下一届内阁很可能会主和，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决心开战。杉山元二人接受了说服，承认了乙方案，条件是加入“不妨碍日中战争的解决”这样的内容。这样，东条英机提出的三个方案，最终结论实质上成了第三方案。

田中新一得知通过了乙方案以后，愤然表示了极度不满。这是因为他估计乙方案极有可能达成妥协。对于已经决心对美开战的田中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而，他把愤怒转向了进行说服工作的武藤章。他以作战部部长的名义给武藤章发了一份盘问式的正式文件，写道：乙方案达成妥协，难道不影响国防的弹性吗？

此外，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重新研究国策的初期，东条首相曾经向岛田繁太郎海相发感慨说：事到如今，如果后退，则对不起日中战争牺牲的 20 万英灵；但是，如果发生日美战争，则要牺牲更多的士兵，实在是一筹莫展。这与前文提到的他向及川海相感慨的内容一样。可以说，东条在这个时候仍然相当犹豫是否应该

与美国开战。

但是，岛田海相在几天的会议最后，对泽本赖雄海军次官、冈敬纯军务局局长等海军省幕僚说，综合几天的气氛看，难以改变大势；因此，此时有必要决心战争，今后继续进行外交，以便为战争寻找正当理由，引导一般国民接受这是一场正义之战。这表示了他战争的决心。岛田在会议之前曾经说，希望务必推行外交，尽量避免战争。泽本次官也在海军高层内部明确表示，日美战争最后将发展成长期战争，依靠国力决定胜负，因此，作为海军并无必胜的信心。泽本反对岛田决心开战，认为在大局上可以避免战争。但是，岛田不顾泽本等人的反对。他认为，此时因海相（自己）一人反对战争而错失机会，将对不起其他人。这样，一直对开战持慎重态度的海军省也转变为同意开战。而永野修身军令部总长为首的海军军令部已经决心开战。

1941年11月2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根据重新研究的结果，再次通过《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其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打开当下危局，实现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并采取以下措施：

- 一、动武时间定在12月初，陆海军完成备战；
- 二、对美谈判按照附件《要领》进行；

三、谋求与德意加强合作。

如果12月1日0时之前，对美谈判取得成功，将中止动武。

而且，附件《对美谈判要领》同时记载了甲方案和乙方案。11月5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批准了《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包括甲方案、乙方案）。

1941年10月下旬，陆海军制定了对美、英、荷作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11月5日向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下达了《大本营海军令》（简称《大海令》），11月6日向陆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发出了《大本营陆军令》（简称《大陆令》）。

在御前会议通过前的11月4日，日本政府通过电报把对美谈判的甲方案和乙方案发给了野村驻美大使。野村首先于11月7日向美方提交了甲方案，但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又向美方提交了乙方案。

美国政府仍然希望拖延与日本的战争，争取时间增强菲律宾及其他地区的兵力，因而对日方的乙方案表示了关注。作为其对应，美国国务院制定了暂定协议方案。内容为：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日本兵力减少到2.5万人以下，两国的经济关系恢复到冻结资产以前的状态。而且，赫尔国务卿口头向野村大使暗示，针对乙方案，美方可解除三个月石油禁运等经济制裁，进而制定设有延期条款的暂定协议方案。然后说，美国将在征

求英、荷、中等国的同意后，向日方正式提出该方案。

不久，美国国务院把暂定协议方案秘密交给了英国、荷兰和中国（蒋介石政权）。荷兰对日本南进感到威胁，对方案表示赞成，但蒋介石政权强硬地表示反对，认为这将打击中国的抗战积极性。英国则从确保亚洲英属殖民地的战略物资的观点，强烈希望美国尽快对日开战，因而赞同中国的态度。最后，美国放弃了暂定协议方案。丘吉尔首相后来回忆，如果美国不参战，我们将无法防卫荷属东印度，也无法保护在亚洲的英国领土。英国希望尽可能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同时希望美国对德宣战，但是面临日本南进，美国对日宣战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样，美国最终放弃了暂定协议方案。1941年11月26日，作为对乙方案的答复，赫尔国务卿向日本发出了所谓的“赫尔通牒”。它的内容是，要求日本无条件承认赫尔四原则；从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无条件全面撤军；否认南京汪兆铭政权；脱离三国同盟义务。

东条首相知悉赫尔通牒后，对它的内容格外吃惊。东乡外相也感到了强烈的失望。二人都判断，已经没有谈判的余地，只得开战。

武藤章也把赫尔通牒理解为停止谈判的通告。他认为，事已至此，只有决心开战。日本已经做出重大的让步，而美国却停止了谈判，所有人必然会愤然决定对美开战。在他看来，已经不可能提出反对意见了。关于驻

兵问题，武藤也曾经考虑，视谈判的进展情况而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但是赫尔通牒退回到了没有妥协余地的原则性主张，可以说，已经难以继续谈判了。

田中新一认为，赫尔通牒来得正是时候。对于日本来说，这反而是如有“天助”。这样，东乡等人就不得不决心开战了，而且国民舆论也将一致支持对美开战。总之，他认识到，该来的来了。对于贯彻既定的开战方针来说，形势一下子有了转机。

对于田中来说，赫尔通牒是企图强迫日本恢复到华盛顿体系和《九国公约》体系，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东亚新秩序”政策完全冲突。据他理解，美国不仅要求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而且要求日本从包括满洲在内的整个中国全面撤军，同时消解汪兆铭政权和“满洲国”。这意味着，他们满洲事变以来的全部努力和工作完全化为泡影。关于否认“满洲国”，虽然美国在字面上没有明确表示，但是，从日美的角力来看，事实上最终将会如此。

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也判断，赫尔通牒的目的在于重新确认《九国公约》。1941年11月27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接到赫尔通牒的要点和对美谈判破裂的消息后，决定在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开战。事实上，已经决定了对美开战。另外，会上决定开战的第二天正式宣战（后改为开战当日宣战）。此外，11月27日下午收到赫尔通牒全文的电报后，11月28日下发了

各方。

11月29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通过了御前会议开战决议方案：“对美谈判最终破裂，帝国决定对美、英、荷开战。”

12月1日，在御前会议上正式决定对美、英、荷开战。这个方案在御前会议之前，没有事先在内阁会议上通过，而是全部内阁成员出席御前会议，直接把御前会议决定作为内阁会议决定。这完全没有先例。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夏威夷珍珠港，同时开始在英属马来半岛登陆，由此，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3. 武藤和田中的世界战略与 战争指导方针

那么，领导当时陆军的武藤章军务局局长和田中新一作战部部长有着什么样的世界战略呢？下面我们再梳理一遍。

前面已经提到，武藤主张，为了应对下一次世界大战，应该按照“广义国防”的观念，建设“国防国家”。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已经变成国家总体战。武藤认为，只有建设面向战争、统制国家全部“综合国力”、举国一致的“国防国家”，才能达

到国防目的。

在他看来，为了建设这样的国防国家，需要扩充军备，同时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为此，日本必须获得南方的资源。由此，日本需要形成一个以“日满华”为核心的“大东亚生存圈”（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生存圈”不仅包括中国等东亚地区，而且包括南方，即东南亚。这里的自给自足经济体制，对于武藤来说，不仅意味着资源的自给自足，而且意味着摆脱经济上对美英的依赖。

实际上，从军需资源的自给自足这个观点来看，仅仅依靠东亚，还缺少石油、锡、生橡胶、镍、磷、铝土矿、钨等重要军需物资，而这些可以从东南亚获取。但是，东南亚作为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的殖民地，处于欧美列强的统治之下。因此，把东南亚纳入日本的自给自足范围将与欧美列强的利益发生正面冲突，依靠通常的外交手段难以实现。但是，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荷兰、法国被德国占领后，它们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被卷入国际上的不稳定形势。日本乘机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同时加强了对泰国的影响力。

接着，欧洲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德国开始进攻英国。

在这样的形势下，武藤考虑，如果德国攻下英国本土，日本就向南方扩张，占领英属马来半岛、英属西婆

罗洲等地。另外，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获得石油等资源，则进攻荷属东印度，占领这些地区。

此时，武藤企图只对英属和荷属殖民地行使武力。这是因为，他认为应该尽量避免与国力强大的美国发生战争，否则有可能“一步走错，危及社稷”。

武藤把英国视为妨碍日本对华政策和南方政策的顽敌，认为需要把英国赶出中国和东南亚。他设想，为了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在某种意义上，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发生战争。这种强烈的反英意识，与封锁天津英法租界问题等他在中国的经历也有关系。但是，对英关系有可能影响到对美关系，他一直警惕美国军事介入会发展为日本与美国的战争。

但是，德国进攻英国的计划受挫，英国本土登陆作战推迟到了下一年。

同一时期，在松冈外相的主导下结成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武藤章考虑，日本向南方扩张时，从英属、荷属殖民地的处理来看，需要与德意两国缔结军事同盟。另外，他考虑，为了在日本向南方扩张时确保北面（背后）的安全，有必要调整与苏联的关系，甚至与苏联合作，因此，他也赞同松冈外相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这是因为，他设想德国会再次发动对英国的进攻。进而，武藤判断，三国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对通过日、德、意、苏的合作防止美国军事介入，阻止美国参战也是必要的举措。

田中新一也认为，为了“确立国防的自主独立性”，日本需要实现军需资源的自给自足。为此，日本必须建设一个包括东亚、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另外，与武藤一样，他考虑，乘德国进攻英国之机，通过武力把东南亚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下。

德国推迟攻打英国本土以后，二人都制定了当前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的方针，将其视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阶梯。

但是，随着德国军事进攻苏联，二人围绕德苏战争的评价和应对产生了分歧。然后，这种分歧又凸显了对三国同盟意义的理解和对美认识上的差异。

田中预料，德苏战争将以德国短期内取得胜利告终，而且他认为，如果战争长期化，日本应当与德国从东西夹击苏联，尽快将其击垮，因而主张进攻苏联。这是因为，为了挫败英国对德国的抵抗意志，必须让苏联屈服，这样还能够消除来自北面的威胁。

但是，武藤反对在德国与英国战争的过程中，对苏联发动进攻。从苏联的国力和辽阔的领土来看，德苏战争是一场国家总体战，势必会陷入长期化。因此，他估计，希特勒公开宣称的新一轮英国本土登陆作战将会推迟，英国在不远的将来崩溃的可能性也很小。另外，即使日本进攻苏联，苏联也不会轻易崩溃。他考虑，现在日本在日中战争上分配了大量的战力，如果再正式对苏开战，那么，事实上将不可能实行作为日本基本国策的

南进政策。因此，他的态度是，只有静观事态，注视形势的发展。

当日本驻德武官向国内传来可能发生德苏战争的情报时，武藤考虑，德国正在与英国进行战争，除非希特勒疯了，他才会对苏联发动战争。但是，实际上希特勒发动了与苏联的战争。在此之后，武藤章便开始对纳粹德国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

本来，武藤设想，三国同盟是针对英国的同盟，是为了打倒英国而建立的同盟。另外，他想利用三国同盟，推进调整与苏联的关系，阻止各国对重庆政府的援助。因此，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与美国战争，而是为了与《日苏中立条约》一起，共同阻止日美战争。苏联是日本用来牵制美国的合作国之一，但是，德国却对苏联发动了进攻。在武藤看来，德苏战争是德国的战略错误。因为，至少德国因此推迟了对英国的进攻，而且阻止美国参战变得愈加困难。

但是，田中新一认为，日本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三国同盟也是为此而缔结的。这是因为，日本要与美国战争，绝对需要与德国结成同盟。当然，田中也想尽可能避免与国力强大的美国发生战争。但是，在他看来，为了确保国防的自主独立性，日本必须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这必然与美国的太平洋政策——以《九国公约》体系为核心的门户开放政策发生冲突。另外，从美国的安全来看，美国极其重视英国的生存，肯定会

介入德英战争。因此，他判断，美国对德宣战是必然趋势。而如果日本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将不得不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发生冲突。而且，如果日本进攻南方的英国殖民地，美国为了阻止英国崩溃，将会介入日本的军事行动。因此，田中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避免与美国的战争。

如果对美战争不可避免，如后所述，为了应对这场战争，日本绝对需要与德国结成同盟。因此，日本必须彻底坚持三国同盟。这正是他在日美谈判中强烈反对朝着削弱三国同盟的方向做出让步的理由。

对此，武藤认为，日本应该尽量避免对美战争，而且是可以避免的。这是因为，即使日美之间产生一些摩擦，美国在亚洲并不拥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日美两国在亚洲不会有不可妥协的分歧。因此，他认为，通过缔结三国同盟和签订《日苏中立条约》阻止美国军事介入，同时向南方扩张，构建“大东亚共荣圈”是可能的。

但是，德苏战争的爆发打乱了武藤的战略构想。这是因为，德苏两国的战争不仅削弱了阻止美国参战的力量，而且随着德苏战争的长期化，德国对英国本土的进攻将变得遥遥无期。这意味着，日本将难以向南方扩张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因为他预料，美英两国将会合作，进行顽强的军事抵抗。那样，日本将会陷入武藤最为担心的对美开战的局面。

此后，武藤开始与纳粹德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对美谈判的处理上，当三国同盟成为阻碍调整与美国关系的因素之一时，采取了不太注重三国同盟的态度。

与此相对，即使德苏开战以后，田中也没有动摇对纳粹德国的信任，依然重视三国同盟。他认为，日本与德国的军事同盟对于防备美国参战是绝对需要的，德苏战争反而为消除日本北面的威胁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二人对德态度的这种差异，不仅与他们对德国的战略定位有关，而且与他们驻德的时期也不无关系。武藤被派驻德国的时间是1923年以后的三年。这个时期，魏玛共和国正在走向稳定。他抵达德国之前，希特勒等纳粹党发动了慕尼黑政变，即日便被镇压。他听到有人评价说“希特勒是个疯子”。可以说，这是对希特勒和纳粹评价最差的时期。

而田中新一1933年底被派驻柏林大约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正是纳粹掌握政权、德国通过《授权法案》并退出国际联盟之后。纳粹政权改善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希特勒就任国家元首。通过国民投票，希特勒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德国正处于赞美希特勒和纳粹的狂热气氛中。

也许两人无意识中受到了各自驻德期间当地气氛的影响。此外，武藤在从德国回国途中，视察了美国大约两个月，似乎对最新的文明及其活力有了强烈的印象。

德苏战争开始以后，武藤并没有固执于与德国的军事同盟，而是竭力通过日美谈判避免与美国的战争。他认为，应该与美国调整关系，同时由此解决日中战争，而避免对美开战，为将来做好准备。因此，可以说，在目前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向南方扩张、全面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

当然，为了建设国防国家，武藤也一直坚持“大东亚共荣圈”。在德苏开战时，他曾经反对进攻苏联，但当时他也同意，如果苏联出乎意料地迅速崩溃，则对苏联发动进攻。另外，如果德国让苏联屈服以后攻下英国本土，他也打算向南方扩张。这种情况下，与德国的同盟也就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他估计基本上不会发展成这样的局面。因此，为了防备将来的战争，至少要维持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影响力，确保获取该地区的资源。

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心对德宣战。为了避免日本参战，美国要求日本事实上把三国同盟变成一纸空文，并且，美国在决定对日实施全面禁运后，又要求日本从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撤军。美国从它的世界战略和安全上考虑，非常重视英国，可以说，存在生死攸关的利益。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日军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将威胁马来、西婆罗洲等英属殖民地，如果日军切断了亚洲的英属殖民地的物资补给，英国将难以继续与德国的战争。另外，美国本身也需要东南亚的天然橡胶、锡

等资源，从稳定确保这些资源的观点来看，也不能允许日本在这里驻兵。

进而，美国又要求对中国适用通商非歧视待遇原则、日本从中国撤军。武藤认为，为了避免爆发日美战争，日本不仅要在三国同盟问题上让步、承认通商非歧视待遇原则、从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撤军，而且不得不从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撤军。武藤按照这条路线说服了东条首相，并得到了他的同意。另外，关于外务省的乙方案，他说服反对它的参谋本部接受了这个方案。这是因为，对于与德国产生了距离感的武藤来说，在国际战略上，避免日美战争比以往具有更加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他考虑，在日美谈判中，最后在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做出比甲方案的驻兵条件更大的让步。

但是，赫尔通牒已经切断了继续谈判的道路，武藤最终只能决心对美开战。

然而，如果武藤最重视避免与美国的战争，为什么不在更早的时候决定从中国全面撤军呢？另外，为什么不按这个路线说服东条英机和田中新一呢？从他自称“傲慢不逊”的性格来看，如果武藤确信无疑，即使发生全面冲突遭到免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武藤也深知，美国已经决心对德宣战，同时在明知有可能对日开战的情况下，在日美谈判中一直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

但对于武藤来说，甲方案中包含的确保华北、内蒙古资源和驻兵，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来，对武藤有过重要影响的永田铁山非常重视华北、内蒙古的资源。永田铁山认为，为了防备下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有必要确保获取中国的资源，因此，在满洲事变后，他开始进行华北分裂活动。永田被暗杀以后，石原莞尔中止了华北分裂活动。但是，武藤继承永田的遗志，为了确保中国的资源，有力地推动了在中国的势力扩张。这就是日中战争。

从中国全面撤军和放弃在中国的特殊权益（资源开发权等）意味着自永田铁山以来日本的一切经营归于徒劳，而且自一夕会成立以来日本陆军的长期努力将变得毫无意义。

可以说，虽然武藤竭力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但他也不会轻易走出这一步。另外，也许武藤自己也没有下定决心说服东条英机和田中新一。尽管如此，可以说，由此给国内外带来了巨大的牺牲。

东条英机也预料到，国家总体战将产生各种重大的影响，一直到最后对是否对美开战仍然犹豫不决。但由于与武藤同样的理由，他不能接受从中国全面撤军。在坚持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兵这一点上，他远比武藤态度强硬。

另外，武藤继承了永田铁山对美国的认识，认为美国在亚洲不存在生死攸关的利益，日美两国之间不会有

不可妥协的分歧。也就是说，即使日美两国之间在亚洲发生了利益冲突，也可以通过政治妥协来解决。

如果仅限于东亚，即日中关系，这样的看法未必没有抓住要害。连美国国务院的对日强硬派、国务卿特别顾问霍恩贝克（原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也主张，美国不应该为了中国市场而与日本发动战争，采取避免日美战争的态度。

但是，德国席卷欧洲大陆并引发德英战争以后，美国在亚洲有了攸关生死的利益。英国的生存对于美国在安全上有攸关生死的重要性。而对于英国的生存来说，亚洲的英属殖民地必不可少。因此，美国政府害怕日本基于三国同盟对英宣战，企图阻止日本对英开战。这是因为，如果日本参战，日本海军有可能切断从亚洲、澳大利亚等地运往英国的物资补给。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在顽强抵抗德国进攻的英国将会彻底崩溃。

由欧洲大战，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与美国的世界战略开始发生正面冲突。可以说，其节点就是英国。

那么，一直认为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田中新一又有什么样的对美军事战略呢？

田中判断，日本没有办法渡过太平洋让美国屈服，即使依靠日德同盟，也不可能在军事上让美国屈服。但是，在他看来，美国对德宣战将不可避免。

美国已经进驻格陵兰岛、冰岛，而且正在计划预防

性占领西非的佛得角群岛、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另外，1941年6月，美国冻结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在美资产。9月，罗斯福总统声明，如果在去往英国的运输船队护送水域发现德意两国的舰艇，美国将会开火，公开表示决心对德宣战。

田中新一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决心对德宣战，因此美国的对日政策基本上就是拖延政策。也就是说，美国的方针是，当前避免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发生战争，而在大西洋方面介入德英战争，俟打败德国后，再让日本屈服。可以说，美国企图对德国和日本各个击破。他判断，为了粉碎美国的这种战略，应该在美国对德宣战后，不失时机地对美开战。

不过，针对美国的挑衅，德国试图避免美国参战，因此禁止德国舰艇主动攻击，同时禁止在美国控制的海域攻击英国的驱逐舰。所以，实际上在日美开战之前，美国还没有对德宣战。

那么，田中新一具体的对美军事战略是什么样的呢？

田中认为，与美国的战争将势必成为长期战争。为了应对这场战争，要通过先发制人的偷袭，在首战中给予美国太平洋舰队彻底的打击，以后两年确保制空制海权，从而确立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占领英属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美属菲律宾。与此同时，促进南方资源的开发和获取，确立日本的自给自足体制，从而建立

能够进行持久战的态势。

1941年底的日美舰艇比例为0.75:1。但是,由于美国已经开始实行大规模扩张军备政策,1942年底这个比例将下降到0.65:1,1943年下降到0.5:1,1944年则下降到大约0.3:1。所以,到1942年底,日本舰艇将少于美国舰艇的70%。而保持这个比例(70%)是海军计划通过“渐减邀击作战”^①与美国决战所绝对需要的。飞机方面,1942年到1944年美国的拥用量将达到日本的5倍左右,仅从海军飞机来看,则要达到10倍。

从日美两国的国力差距和生产能力差距来看,日本只有通过尽早在海上决战,打破两国的战力比例,使日本几年后的战力不会处于绝对劣势。也就是说,在初期的作战中,日本要给美国舰队以沉重的打击。只有这样,日本才有望在与美国的持久战中取得胜利。

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日本的主要战力是海军,对美开战应该在两国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对日本比较有利的时期实施,所以,开战时机只有1941年底。如果到了来年春天,北方的苏军开始能够自由行动,在南方发动战争就会变得危险。而如果在可以确保北方安全的冬季

^① 即引诱美国舰队进抵日本,在美军从军港到战场的路上利用潜艇、水雷战队、航母部队对其进行打击,使美军实力削弱到敌不过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的程度,然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舰负责将美军残余彻底消灭。

即 1942 年底开战，从与美国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石油储备量等条件来看，日本已经没有胜算。因此，1942 年底以后，实际上日本将不可能与美国进行战争，日本在军事上将沦为三流国家。

如果日本能够通过首战胜利，确立了持久战的态势，使与美国的战争持续下去，那么，在此期间便可以通过日德意的军事合作使英国屈服。这样，就会让美国失去在欧洲的立脚点，把美国赶出欧洲大陆。另外，在亚洲，通过在首战中给予美国沉重打击，也将让它失去在亚洲的立脚点。这样，就迫使美国不得不撤出欧洲和亚洲，使其被两个大陆孤立，从而丧失斗志。然后，引导战争走向结束。

田中的对美军事战略最关键的要点在于取得与美国首次海战的胜利，同时使英国屈服。可以说，英国的存亡对于美、德、日三国来说，都已经成为战略的焦点。

田中为了使英国屈服，考虑了如下方法。

占领英属香港、英属马来、英属西婆罗洲以后，对澳大利亚、印度，通过破坏通商等手段，切断它们与英国本土的合作。另外，为了把澳大利亚与美国本土切断，攻占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为了从海空压制澳大利亚，应该攻入新几内亚东部，占领该地的要冲莫尔兹比港。进而，促进英属缅甸独立，从而刺激英属印度独立。另外，要求

德意向近东、北非、苏伊士发动进攻，而日本与之呼应，在西印度方面切断敌方增援部队和消灭敌方舰船。进而，要求德意加强对英封锁。如果形势可能，则要求实施英国本土登陆作战。

此外，他认为，为了使英国屈服，需要进攻英国本土。但前提是，德国在德苏战争中战胜苏联。因此，田中再次企图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日本确保了南方必要资源、建立起持久战态势的阶段，对苏联发动进攻。这是因为，起初投入南方作战的陆军兵力相当于全部兵力的1/5，为11个师团，大约35万人，日本保存了大部分的陆军兵力。他希望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让苏联崩溃，从而消除日本的北方威胁，同时让德国转向进攻英国本土。

但是，如后所述，由于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失败，田中的企图没有能够实现。另外，德国在日美开战后，也在冬季的莫斯科近郊以西遭到了苏军的猛烈反攻，东部战线被迫后退。

另一方面，武藤章虽然考虑应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但无法避免时，也并没有放弃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武藤为首的军务局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和海军的配合下，也研究了与美国发生战争时的军事战略（《对美英荷战争指导要纲》）。其内容如下。

对美、英、荷的战争将是长期战争。应通过先

发制人的偷袭，在战略上确立优势，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和主要交通网，从而建立长期自给自足的体制。通过武力占领地区的范围包括：缅甸、马来、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关岛、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在占领地区，确保重要国防资源，采取作战部队在当地自食其力的方针。

关于结束战争，采取的方针是：在军事上无法使美国屈服，应与德意两国合作使英国屈服，让美国失去在欧洲的落脚点；另外，通过日本的海军力量，消除美国在亚洲的势力。这样，把美国从亚洲和欧洲分离并孤立，使其丧失继续战争的意志，从而谋求结束战争。

这些内容与田中的方针大同小异，让英国屈服的方法也基本一样。不过，它反对进攻苏联，考虑尽可能促进德苏媾和，使苏联接近轴心国一方。另外，武藤对日德两国的前景更加悲观，并主张即使条件不利，也要尽可能尽快媾和。

通常有人认为，对美开战时，日本陆军完全没有想到如何结束战争，但田中和武藤等人大致考虑了这样的结束战争的方针。另外，东条也同意了《对美英荷战争指导要纲》。

在对美开战前的 1941 年 11 月 15 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基本沿袭《对美英荷战争指导要纲》，制定了

《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战争的腹案》。虽然以田中新一为首的作战部对于对苏政策持不同意见，但是作为当前的方针，同意了这个方案。因此，田中等人并未放弃进攻苏联。

不过，以武藤章为首的军务局的战略，前提与田中新一的一样，通过先发制人的偷袭重创美国舰队，然后对反击的美国海军进行各个击破，使战争持久下去——是这样的军事作战。

但是，随着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这个前提本身没有成立，从而导致了和美战略的完全崩溃。

尾声

太平洋战争

——日暮西山的昭和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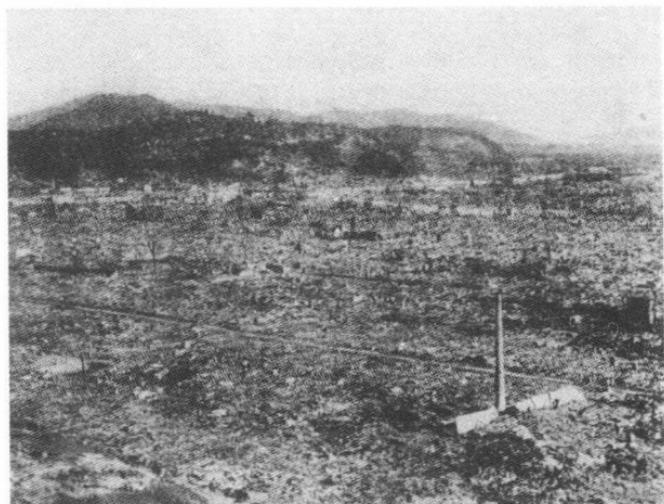


图 20 美国投下原子弹。广岛市遭到毁灭性打击，只留下一根烟囱（读卖新闻社供图）

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美国和英国宣战，突然间开始了与美英两国的全面战争。

在袭击珍珠港的一小时之前，日军偷袭英属马来半岛的哥打巴鲁并登陆，正式开始向南方发动进攻，1942年1月底，基本上控制了马来半岛、英属西婆罗洲，2月15日占领了英国在东南亚最大的根据地——新加坡。另外，在开战后的12月10日，英国的新锐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马来海域被日本海军航空战队击沉，英国的远东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

在美属菲律宾，1942年1月初旬马尼拉陷落，后退到巴丹半岛继续抵抗的驻菲美军也于4月上旬投降。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巡洋舰遭到沉重打击，即使在西太平洋也几乎无法实施真正的作战行动。

对于荷属东印度，起初日本政府担心石油设施会遭到破坏，希望通过谈判实现进驻。但是，荷属东印度方面拒绝了日方的要求，1月11日日军开始进攻。2月中旬，日军通过空降部队偷袭，占领了荷属东印度屈指可

数的巨港油田。石油设施没有遭到荷属东印度方面的重大破坏，便被置于日方的控制之下。3月1日，进攻荷属东印度的部队主力开始攻向爪哇岛，5日占领首都巴达维亚^①，7日荷属东印度军队投降。对美英开战以后，日本开始对缅甸发动进攻，3月8日占领首都仰光，到5月底，基本上控制了整个缅甸。

在此期间，从1942年2月开始，日本政府研究了今后领导战争的基本方向。陆军的想法是，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的阶段，应该转为战略防御，努力加强南方的防备，同时致力于资源开发和增强国力，建立持久战的态势。但是，由于在珍珠港获得大胜，海军倾向于尽早与美决战，试图继续进攻，给美国海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尽早实现媾和。

但是，田中新一等人判断，美国的国力处于优势，即使暂时处于不利，也不会答应尽早媾和，而是会重整战备，继续战争，直至总体战局转变为对美国有利。也就是说，即使日本海军挑起短期内决战，也不可能让美国屈服，而是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持久战。如果没让英国屈服，就不能使美国丧失继续战争的意志，不可能与美国媾和。武藤章为首的军务局也持同样的看法。此外，田中新一针对海军的短期内决战的意见，主张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而对于对进攻苏联持慎重态度、认为与

^① 今雅加达。

美国的战争是长期战争的军务局，则主张短期内决战，以便进攻苏联。因此，他对海军和军务局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基本的看法是，与美国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

这样，陆军和海军的想法一直有分歧。3月7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通过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大纲规定，除了开发占领地区的必需资源、确保海上运输线以外，要建立“长期不可战胜的政治、战争体制”，伺机采取“积极的方法”。这份大纲采纳了陆军的建立持久战态势和海军的积极进攻两种主张。

1942年4月8日，武藤章突然被解除军务局局长职务，调往苏门答腊岛，就任近卫师团长。与东条英机关系密切的佐藤贤了军务课课长就任军务局局长。

武藤一直主张，为了进行长期的国家总体战，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而内阁必须具有国民基础。也就是说，要进行与美国的国家总体战，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全民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总动员。为此，必须由以国民性的组织为基础的内阁进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武藤曾向周围的人透露过这样的意见：东条内阁是开战内阁，而开战后进行战争，应该由在更广泛的国民层有基础的其他内阁完成。另外，他拜访了原首相冈田启介，私下里要求他提供合作，以建立这样的新内阁体制。

武藤的这种活动被宪兵队察觉，并传到了东条英机

的耳中。东条从在满洲担任关东宪兵司令官开始，就与宪兵拥有深厚的关系。在担任首相期间，他把手下的四方谅二任命为东京宪兵队的队长，在政治上也利用宪兵为他服务。因为这件事，武藤触怒了东条，被解除军务局局长的职务，降职调至南方战线。此后，武藤章一直没能回到陆军中央。

另外，1942年6月5日，在中途岛海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幸存的三架美国航空母舰舰载机击沉了日本最精锐的四艘主力航空母舰。在这次按照短期决战方针实施的海战中，日军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惨败。由此，日本海军不可能再发动进攻，而维持陆军所主张的持久战态势，也越来越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12月6日，田中新一作战部部长因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与东条首相兼陆相发生了冲突，并在激烈的争论中出言不逊，次日，被罢免作战部部长职务，调到新加坡的南方军总司令部。第一方面军参谋长绫部橘树就任作战部部长。

在此之前，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日军投入了第七师团一木支队、第十八师团川口支队、第二师团、第三十八师团等大约3万士兵，但均损失惨重，日军败退。另外，日军在丧失了制空权的情况下，损失了大量的运输船，在太平洋上的运输船运输也产生了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田中主张，应该在瓜达尔卡纳尔

岛一举投入重兵，夺回该岛。

田中认为，美军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后，将转入正式反攻。如果日本失去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将以此为立脚点继续西进，动摇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制海、制空权。这样，不仅南方占领地区与日本本土的运输路线将被切断，而且将难以保住这些南方要地，从而威胁持久战争态势的经济基础。如果发展成这样的局面，日本将陷入无法继续作战的状况。因此，无论如何必须保住瓜达尔卡纳尔岛。

许多日本陆海军的首脑都设想美国在太平洋方面的反攻将在1943年以后。这是因为，美国要重造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中损失的战列舰、巡洋舰大约需要两年时间，转入反攻则在此以后。但是，田中判断，美军已经开始转入正式反攻。因此，田中认为，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将是日本能否维持持久战态势的转折点，乃是日美战争的一个决战之地。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田中为首的作战部拟定了如下作战设想，提交给陆海军中央和政府：为了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再派遣第五十一师团、第六师团，从关东军调动新锐师团（因关东军准备不足，田中在同年3月已经放弃进攻苏联）。把该岛周边的东南太平洋战区方面的第十七军、第十八军等全部部队重新合并为第八方面军，进行集中的部队整编。在该岛周边重新建设航空基地，加上从满洲派遣的200架陆军飞机等，在陆海军配

合下确保瓜达尔卡纳尔岛周边的制空权。在此基础上，从满洲运送 20 门重炮、60 门高射炮及炮弹和人员，集中投入军事力量。通过全面的进攻，消灭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美军，夺回该岛。总攻定在来年 1 月，并且要求加征 55 万吨位的运输船参战。

但是，东条英机虽然认可需要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但他认为，如果加征如此庞大的船舶用于作战，将难以确保从南方运输物资的运输船，从而导致维持战争经济的物资动员计划完全崩溃，因而反对作战部的计划。这是因为，如果维持战争经济的物资动员计划崩溃，那么将意味着整个战争领导的失败。对于东条英机来说，首相必须考虑维持总体的战争体系，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作战部的要求。

此外，田中也考虑到，如果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总攻仍然不能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日本将难以长期维持与美国的战争，只能走向停战或者尽早媾和。但是，在罢免田中新一之后的 1942 年 12 月 31 日，大本营决定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没有对该岛发动总攻。此后，美军正式转入反攻，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事实上成为太平洋战争最大的转折点。

另一方面，在欧洲的德苏战线，苏联在日美开战以后，在莫斯科西面开始发起反攻。在 1942 年 6 月开始的斯大林格勒攻防战中，德军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此后，德军节节败退，德国已经不可能战胜苏联。同年

11月，在北非的阿拉曼战役中，德意军队惨败给盟军，轴心国方面进攻埃及、控制苏伊士的企图宣告失败，从而使得轴心国方面不可能通过对英封锁苏伊士运河从而切断亚洲与英国之间的物资补给通道。

德国在苏德战争中的失败，对于日本和德国来说，意味着使英国屈服的前提（打败苏联）已经变得不可能实现。另外，由于德意军队控制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失败，通过切断亚洲的物资补给通道削弱英国的企图也遭到挫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对美国来说，还是对日本和德国来说，都是一场围绕英国的战争，但是，由于这些失败，日本和德国已经不可能使英国屈服。这样，日本和德国企图通过使英国屈服而使美国丧失斗志的战略也宣告破产，可以说，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结束战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再出现能够取代武藤、田中，制定新的政治军事策略的、有影响的幕僚。因此，东条英机只有按照以往的构想，通过一些权宜之计，应付各种事态。

在太平洋战局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日本为了让德国把矛头指向英国，向德国和苏联提出和平调停的建议，但是，遭到了两国拒绝，德苏之间和平调停的工作以失败告终。

翌年7月，日本所谓“绝对国防圈”的要地塞班岛

陷落，日本本土进入了美国远程轰炸机的空袭范围，美国开始正式对日本本土的主要城市进行空袭。以此为机会，重臣^①和宫中亲信逼迫东条内阁总辞职。不过，东条下台以后，陆军内部仍然是统制派幕僚掌握主导权。

在这个阶段，无论从太平洋的战局来看，还是从国际形势来看，日本都败局已定。当然，日本可以选择立即停战，然后进行媾和谈判。但是，在陆军内部，非统制派的战争指导班（后为战争指导课）和参谋本部情报部的一部分人开始寻求通过苏联尽早媾和时，统制派的主流派仍坚持继续战争的方针。太平洋战争中，230万日本阵亡士兵和80万死亡平民大部分是在塞班岛陷落之后成为牺牲品的。

此后，经过冲绳战役、德国投降、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1945年8月14日，在御前会议上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次日，二战结束。与此同时，日本陆军被解体，昭和陆军就此灭亡。

① 重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元老共同负责评选继任首相的人，不属于官职上的职位名称。

主要参考文献

1. 关于永田铁山

永田鉄山刊行会編『秘録永田鉄山』芙蓉書房、1972。

臨時軍事調査委員（永田鉄山執筆）『国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陸軍省、1920。

永田鉄山「国防に関する欧州戦の教訓」『中等学校地理歴史科教員協議会議事及講演速記録』第4回、1920。

永田鉄山「国家総動員の概説」『大日本国防義会会報』第93号、1926。

永田鉄山「国家総動員準備施設と青少年訓練」沢本孟虎編『国家総動員の意義』青山書院、1926。

永田鉄山「現代国防概論」遠藤二雄編「公民教育概論」義済会、1927。

永田鉄山『国家総動員』大阪毎日新聞社、1928。

永田鉄山『新軍事講本』青。教育普及会、1932。

永田鉄山「満蒙問題感懐の一端」『外交時報』第668号、1932。

陸軍省新聞班編『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陸軍省新聞班、1934。

陸軍省「対北支政策に関する件」『満受大日記（密）昭和十。』11冊ノ内其9、国立公文書館所蔵。

船木繁『岡村寧次大将』河出書房新社、1984。

森靖夫『永田鉄山』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

川田稔『浜口雄幸と永田鉄山』講談社選書メチエ、2009。

川田稔『満州事変と政党政治』講談社選書メチエ、2010。

2. 关于石原莞尔

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国防論策篇』（増補版）原書房、1994。

今岡豊『石原莞爾の悲劇』芙蓉書房出版、1999。

「河辺虎四郎少将回想応答録」『現代史資料』第12巻「日中戦争」4、1965。

3. 关于武藤章

武藤章『比島から巢鴨へ』実業之日本社、1952。

上法快男編『軍務局長武藤章回想録』芙蓉書房、1981。

武藤章「協議条約と日本の立場」『外交時報』第 684 号、1933。

武藤章「国際情勢と日本」『信濃教育』第 562 号、1933。

武藤章「世界現下の情勢と国民の覚悟」『錦旗・新日本建設の最高指標』昭和 9 年 3 月号、1934。

武藤章「時局の展望と国防国家確立の急務に就いて」『支那』31 卷、東亜同文会調査編集部、1940。

武藤章「国防国家完成の急務」『東亜食糧政策』第 4・5 卷、週刊産業社、1941。

金原節三「金原節三業務日誌摘録」前後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石井秋穂『石井秋穂大佐回想録』厚生省引揚援護局、1954。

石井秋穂「開戦に至るまでの政略指導」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石井秋穂「石井秋穂大佐『覚』」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4. 关于田中新一

田中新一『大戦突入の真相』元々社、1955。

松下芳男編『田中作戦部長の証言』芙蓉書

房、1978。

「参謀本部第1部長田中新一中将業務日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田中新一宣誓供述書」A級極東国際軍事裁判記録。

「田中新一中将回想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国立公文書館所蔵。

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記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田中新一「大東亜戦争作戦記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田中新一「大東亜戦争への道程」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田中新一「日華事变拡大か不拡大か」『別冊知性』第5号、河出書房、1956。

田中新一「作戦構想はいかに樹てられたか」『丸』11号、潮書房、1958。

田中新一「北守南進の大陣痛」『日本週報』437号、1958。

田中新一「戦争に決したもの」『偕行』昭和31年10月号、1956。

田中新一「石原莞爾の世界観」『文藝春秋』昭和40年2月号、1965。

田中新一「石原莞爾と東条英機」『文藝春秋』昭

和 41 年新年特別号、1966。

5. 关于昭和陆军（除论文、 外语文献、未公开文件）

A. 同时代的记录

陸軍省『大日記』昭和 17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国立公文書館所蔵。

参謀本部第二課『滿州事变作戰指導關係綴』全 3
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参謀本部第二課『滿州事变作戰指導關係綴別冊』
全 3 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参謀本部編「滿州事变作戰經過ノ概要」偕行
社、1935。

参謀本部庶務課『参謀本部歴史』昭和元年—昭
和 12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全 2 卷、原書房、1967。

本庄繁『本庄日記』原書房、1967。

伊藤隆、佐々木隆、季武嘉也、照沼康孝編『真崎
甚三郎日記』全 6 卷、山川出版社、1981—1987。

軍事史学会編『大本營陸軍部戦争指導班機密戦争
日誌』全 2 卷、錦正社、1998。

波多野澄雄、黒沢文貴、波多野勝編『侍従武官長

奈良武次日記・回顧録』全4巻、柏書房、2000。

『現代史資料』7巻「満州事変」みすず書房、1964。

『現代史資料』11巻「統・満州事変」みすず書房、1965。

『現代史資料』8・9・10・12・13巻「日中戦争」、1964—1966。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全9巻、岩波書店、1950—1956。

木戸日記研究会編『木戸幸一日記』全2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

伊藤隆、広瀬順昭編『牧野伸顕日記』中央公論社、1990。

高橋紘、粟屋憲太郎、小田部雄次編『昭和初期の天皇と宮中一侍従次長河井弥八日記』全6巻、岩波書店、1993—1994。

小川平吉文書研究会編『小川平吉関係文書』みすず書房、1973。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研究会編『上原勇作関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

宇垣一成文書研究会編『宇垣一成関係文書』芙蓉書房出版、1995。

B. 回忆类

『稲田正純氏談話速記録』日本近代史料研究

会、1969。

『岩畔豪雄氏談話速記録』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1977。

『片倉衷氏談話速記録』上・下、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1982—1983。

『鈴木貞一氏談話速記録』上・下、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1971、1974。

『西浦進氏談話速記録』上・下、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1968。

『牧達夫氏談話速記録』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1979。

『今村均政治談話録音速記録』1995、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蔵。

『男爵若槻礼次郎談話速記』ゆまに書房、1999。

有末精三『有末精三回顧録』芙蓉書房、1974。

有末精三『政治と軍事と人事』芙蓉書房、1982。

池田純久『日本の曲がり角』千城出版、1968。

今井武夫『支那事変の回想』みすず書房、1980

今村均『今村均回顧録』芙蓉書房出版、1993。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芙蓉書房、1978。

遠藤三郎『日中十五年戦争と私』日中書林、1974。

大蔵栄一『二・二六事件への挽歌』読売新聞

社、1971。

片倉衷『戦陣随録』経済往来社、1972。

片倉衷『片倉参謀の証言叛乱と鎮圧』芙蓉書房、1981。

河辺虎四郎『市ヶ谷台から市ヶ谷台へ』時事通信社、1962。

小磯国昭『葛山鴻爪』小磯国昭自叙伝刊行会、1963。

近衛文麿『失はれし政治』朝日新聞社、1946。

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読売新聞社、1951。

佐藤賢了『軍務局長の賭け・佐藤賢了の証言』芙蓉書房、1985。

末松太平「私の昭和史」みすず書房、1963。

種村佐孝「大本営機密日誌」芙蓉書房、1979。

土橋勇逸「軍服生活四十年の想出」勁草出版センター、1985。

東郷茂徳『時代の一面』中公文庫、1989。

西浦進『昭和戦争史の証言』原書房、1980。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時事通信社、1962。

守島康彦編『昭和の動乱と守島伍郎の生涯』葦書房、1985。

森松俊夫編『参謀次長沢田茂回想録』芙蓉書房、1982。

若槻渡次郎『明治・大正・昭和政界秘史』講談社文庫、1983。

C. 研究专著、大众图书

赤木須留喜『近衛新体制と大政翼賛会』岩波書店、1984。

伊藤隆『昭和十年代史断章』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

伊藤隆『近衛新体制』中公新書、1983。

伊藤之雄『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の崩壊』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

伊藤之雄『昭和天皇伝』文藝春秋、2011。

井口武夫『開戦神話』中央公論新社、2008。

井上寿一『危機のなかの協調外交』山川出版社、1994。

井上寿一『日中戦争下の日本』講談社選書メチエ、2007。

入江昭『太平洋戦争の起源』篠原初枝訳、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

入江昭『米中関係のイメージ』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2002。

白井勝美『満州事变』中公新書、1974。

白井勝美『日中戦争』中公新書、2000。

内田尚孝『華北事变の研究』汲古書院、2006。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の開幕』小学館、1988。

緒方貞子『満州事変と政策の形成過程』原書房、1966。

奥健太郎『昭和戦前期立憲政友会の研究』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4。

E・H・カー『独ソ関係史』富永幸生訳、サイマル出版会、1972。

加藤陽子『模索する一九三十年代』山川出版社、1993。

加藤陽子『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岩波新書、2007。

刈田徹『昭和初期政治・外交史研究』人間の科学社、1978。

北岡伸一『政党から軍部へ』中央公論新社、1999。

橘川学『嵐と闘ふ哲将荒木』荒木貞夫將軍伝記編集刊行会、1955。

木畑洋一、イアン・ニッシュ、細谷千博、田中孝彦編『日英交流史 1600 - 2000』全5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 - 2001。

近代日本研究会編『昭和期の軍部』山川出版社、1979。

工藤章・田嶋信雄編『日独関係史一八九〇—一九四五』全3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

栗原優『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勃発』名古屋大学出

版会、1994。

黒沢文貴『大戦間期の日本陸軍』みすず書房、2000。

黒野耐『帝国国防方針の研究』総和社、2000。

小池聖一『満州事変と対中国政策』吉川弘文館、2003。

小林道彦『政党内閣の崩壊と満州事変』ミネルヴァ書房、2010。

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体制の崩壊」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

酒井哲哉「近代日本の国際秩序論」岩波書店、2007。

塩崎弘明『日英米戦争の岐路』山川出版社、1984。

ウィリアム・シャイラー『第三帝国の興亡』全5巻、松浦伶訳、東京創元社、2008。

須崎慎一『二・二六事件』吉川弘文館、2003。

クリストファー・ソーン『満州事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全2巻、市川洋一訳、草思社、1994。

高橋正衛『昭和の軍閥』中公新書、1969。

高橋正衛『二・二六事件』中公新書、1994。

高光佳絵『アメリカと戦間期の東アジア』青弓社、2008。

高宮太平『順逆の昭和史』原書房、1971。

高山信武『昭和名将録』芙蓉書房、1979。

竹山護夫『昭和陸軍の将校運動と政治抗争』、名著刊行会、2008。

田嶋信雄『ナチズム極東戦略』講談社選書メチエ、1997。

筒井清忠『昭和期日本の構造』有斐閣、1984。

時任英人『犬養毅』論創社、1991。

戸部良一『逆説の軍隊』中央公論社、1998。

戸部良一『日本陸軍と中国』講談社選書メチエ、1999。

富田武『戦間期の日ソ関係』岩波書店、2010。

永井和『青年君主昭和天皇と元老西園寺』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3。

永井和『日中戦争から世界戦争へ』思文閣出版、2007。

中野雅夫『橋本大佐の手記』みすず書房、1963。

中村勝範編『満州事変の衝撃』勁草書房、1996。

中村菊男『昭和陸軍秘史』番長書房、1968。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全8巻、朝日新聞社、1962—1963。

野村実『太平洋戦争と日本軍部』山川出版社、1983。

秦郁彦『日中戦争史』河出書房新社、1961。

秦郁彦『軍ファシズム運動史』原書房、1980。

秦郁彦『慮溝橋事件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波多野澄雄『「大東亜戦争」の時代』朝日出版社、1988。

波多野澄雄「幕僚たちの真珠湾」朝日新聞社、1991。

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

ハーバート・フェイス『真珠湾への道』大窪愿二訳、みすず書房、1956。

廣部泉『グルー』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

藤原彰『日中全面戦争』小学館ライブラリー、198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営陸軍部』全10巻、朝雲新聞社、1967—197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関東軍』全11巻、朝雲新聞社、1969—197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变陸軍作戦』全3巻、朝雲新聞社、1975—197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営陸軍部大東亜戦争開戦経緯』全5巻、朝雲新聞社、1973—197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営海軍部大東亜戦争開戦経緯』全2巻、朝雲新聞社、1979。

保阪正康『昭和陸軍の研究』全2巻、朝日新聞

社、1999。

保阪正康『東條英機と天皇の時代』ちくま文庫、2005。

細谷千博編「日英関係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

細谷千博、齋藤真、今井清一、蠟山道雄編『日米関係史・開戦に至る一〇年』全4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1972。

細谷千博、本間長世、入江昭、波多野澄雄編『太平洋戦争』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

堀真清『西田税と日本ファシズム運動』岩波書店、2007。

松浦正孝『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経済と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

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

三宅正樹『日独伊三国同盟の研究』南窓社、1975。

三宅正樹、秦郁彦、藤村道生、義井博編『昭和史の軍部と政治』全6冊、第一法規出版、1983。

森克己『満州事変の裏面史』国書刊行会、1976。

森靖夫『日本陸軍と日中戦争への道』ミネルヴァ書房、2010。

森山優『日米開戦の政治過程』吉川弘文

館、1998。

安井三吉『柳条湖事件から慮溝橋事件へ』研文出版、2003。

矢次一夫『昭和動乱私史』全3巻、経済往来社、1971—1973。

矢次一夫『この人々』光書房、1958。

矢部貞治『近衛文麿』読売新聞社、1976。

山本智之『日本陸軍戦争終結過程の研究』芙蓉書房出版、2010。

吉田裕『アジア・太平洋戦争』岩波新書、2007。

后 记

昭和陆军以满洲事变为契机，打倒了一直推行国际和平协调外交、在国内也比较稳定的政党政治。它是怎样逐步走向日中战争，然后对美开战，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领导这个时期日本陆军的永田铁山、石原莞尔、武藤章、田中新一等人持有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策略构想？本书的焦点就在于此。

今年，2011年12月8日，将迎来日美开战70周年。至今，仍有许多人关心，日本为什么，又怎样开始了那场给国内外带来悲惨结果的战争？

当时，主导日本政治、军事的是陆军。日美开战时，领导陆军的是首相兼陆相东条英机、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这三人。本书也想通过追寻昭和陆军的轨迹，研究他们是如何决心对美开战的。

本书以永田铁山的构想为起点，中间插入石原莞尔的构想，最后分析了武藤章和田中新一的构想，从而能够从与以往不同的新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东条英机的战略是由武藤章和田中新一的构想支撑的。

以往，人们一直认为，关于昭和时期战争前期的历

史，昭和初期的政党政治实质上非常脆弱，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面临种种困难，轻而易举地自我崩溃了。因此，此后，军部在没有明确的国家构想下，通过恐怖行动和恫吓掌握了权力，结果发动了一场鲁莽的战争。这是一种比较有力的看法。

但是，近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政党政治的体制非常稳固，包括国内外关系在内，有着相当的稳定性。如果是这样，那么，以陆军为核心的反对势力如何能够推翻它的呢？

一般认为，取代比较稳固而且稳定的体制，必须有能够与之相对抗的独自の构想及周密的准备。

满洲事变以后，实质上领导日本陆军的是陆军中央的中坚幕僚层，而它的核心则是以永田铁山为中心的一夕会。虽然在满洲事变中，关东军在当地的活动本身是按照石原莞尔的计划实施的，但是包括国内的陆军中央在内的整个事态的展开，基本上都是通过一夕会周密准备完成的，其中，包括事先掌控陆军省的主要职位。而它的基础便是永田铁山的构想。他的构想，也可以说就是对抗政党政治方向的构想，它成为主导满洲事变以后日本陆军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虽然五一五事件后永田铁山遭到暗杀，但是，之后日本又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日中战争，在此过程中，日本陆军实质上逐渐掌握了政治权力。领导此后日本陆军的是石原莞尔、武藤章、田中新一，是他们的政治军事

策略构想。日美开战前后的东条英机依靠的是武藤和田中的构想。

通常有人认为，日本对美开战时，陆军完全没有想到战争的后果，但是如本书中阐述的那样，田中和武藤等人当时基本上考虑了结束战争的方针。东条英机也同意了他们的方针。

另外，人们往往认为，日美战争是围绕争夺中国市场而发生的战争，但如本书显示的那样，这种看法并不准确。

进而，还有一种见解认为，陆军难以解决日中战争，为了打开这种局面，谋求南进，最终发展到了与美英两国的战争。但是，如本书所述，对美开战的主要起因未必是解决日中战争，而是另有原因。

本书就昭和陆军的轨迹，一边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发展，一边重点分析永田铁山、石原莞尔、武藤章、田中新一等人的构想，从而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与以往一般印象不同的新视点。如能得到各位读者的意见和批评，本人将不胜荣幸。

此外，为了便于阅读，引用文字中的旧字^①全部改为现行文字。

最后，从当时任新书部部长的松室彻先生（现为中

① 旧字，对1949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字体表》之前的作为标准的字体的通称。如“旧”的旧字为“舊”。

央公论新社制作本部长)约稿到写完本书,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松室先生一直耐心等待,并给本书提出了各种建议。另外,接替松室先生负责编辑工作的佐佐木久夫先生也在各个方面给我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向二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川田稔

2011年晚秋

日本陆军的轨迹

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支脉

(1931-1945)

昭和陆军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打倒了一直推行国际和平协调外交、在国内也比较稳定的政党政治。它是怎样逐步走向侵华战争，然后对美开战，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领导这个时期日本陆军的永田铁山、石原莞尔、武藤章、田中新一等人，持有什么样的政治军事构想？本书的焦点就在于此。

ISBN 978-7-5097-7834-0



9 787509 778340 >